目　录

亲历记

1 我与萧光琰的苦涩友谊……白介夫
16 耀邦与我的两次谈心……王仲方
19 我了解的赫鲁晓夫权力斗争……阎明复　朱瑞真

怀人篇

25 秦川在老中宣部……马懋如
28 刘伯承检讨前后的掌声……金　凤
32 忆先师冯友兰……何炳棣
35 我的老师林同济……朱世达

一家言

38 党史研究中的反思……何　方
40 陆定一谈文革经历……纪希晨
41 为胡适辩诬——对“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和“问题与主义”的再认识……杜　光

春秋笔

44 中国的生态危机……应克复
50 竹入义胜假扮田中特使内幕……刘建平

往事录

53《大公报》在抗日战争中的迁移……郑连根
55 活人靶赵培宪：日寇集中营真实故事……张耀杰
57 书生司令马耀南……徐明远
61 我在新四军教导总队的学习生活……吕　炯

海外事

63 韩国光州518事件25周年祭……詹小洪
66 纳粹德国：崛起如何成为灾难……黄　钟

古今谈

71“秦家店”的奠基者商鞅……尹振环
76 李鸿章驾驭洋兵的手段……雷　颐

顾　　问：
　　费孝通　程思远　杜润生　任仲夷
特邀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光远　王俊义　王景山　冯　征
　　冯　健　冯其庸　曲润海　朱厚泽
　　李　庄　李　普　李　锐　李一氓
　　李学勤　李维民　杨天石　吴　象
　　宋木文　苏双碧　张　锲　张岂之
　　张文彬　张荣华　何　方　范敬宜
　　金冲及　钟沛璋　凌　云　龚育之
　　曾彦修　戴　逸　魏久明
社　　长（法人代表）：杜导正
副 社 长：方　实　徐　孔（常务）
　　　　　杨继绳　吴　思
执行主编：李　晨　徐庆全
社长助理兼编辑室主任：赵友慈
社长助理兼办公室主任：胡竞成
理 事 长：杜导正
副理事长：莊其環　李　琼
理　　事：白建钢
秘 书 长：徐　孔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管
本刊常年法律顾问：
　张思之（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　010-68083211）
　步凌云（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　010-85271606）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K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ISSN1003-1170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　　编：100045
电　　话：(010)68522852（办公室）
　　　　　(010)68534879（编辑室）
　　　　　(010)68523512（编辑室）
　　　　　(010)68532048（发行部）
传　　真：(010)68532569
印　　刷：唐山市润丰印务有限公司
国内总发行：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订 购 处：全国各地邮局（所）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399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1274M
网络电子版全球总代理：龙源期刊网
网　　址：www.dragonsource.com
　　　　　www.qikan.com
本刊电子信箱（E-mail）地址：
　　　　　Yanhcq@sina.com
出版日期：每月4日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西工商广字0296号
定　　价：4.80元

我与萧光琰的苦涩友谊

● 白介夫

我走过了八十多个春夏秋冬，好多事情渐渐淡忘。对有些人与事的记忆，却是越久远越清晰。我想告诉人们，告诉下一代，中国一段不应该被忘记的历史，中国科学界一个不应被遗忘的科学家——萧光琰。

“外行”领导“内行”

1937 年卢沟桥事变，我刚好从师范毕业，便跑到西安，想考进国民党办的炮兵学校，又能挣钱，又能抗日。可是我付不起两块大洋的报名费，这时想起学校里曹孟朴老师告诉我们共产党也抗日救国，于是我就转身去了延安。这个偶然选择，决定了我的一生。

到延安时我才十几岁，此后一直接受共产党的教育，从没有怀疑过党的政策，没有怀疑过毛主席。在抗日和土改的队伍里，解放后在政府机关里，我都算是个小知识分子。1957 年，在一片“外行”要领导“内行”的呼声中，我被从辽宁省委高教处调到科学院大连石油研究所（后改名为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简称“大化所”）任党委书记，同时兼副所长。这对我来讲，是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领域。

在一大群学富五车的高级知识分子的包围中，我近乎文盲。“我行吗？”虽然当时只有三十六岁，是以天下为己任，又无所畏惧的年龄，可这种落差还是使我觉得自己很难胜任这个工作。

我没有专业知识，但是有常识。知道要搞好一个研究所，关键就是学术带头人。张大煜当时担任所长，主管科研，我觉得张大煜是一个很好的学术带头人，从心里尊重他，明确业务上的事情由张大煜来管，我只是尽量配合他做好科研工作，解决一些思想问题和人事纠纷。我给自己的这种定位虽然部分偏离了党要领导一切的航向，却大大缩小了我和科技人员的距离。

那时候党政人员也常常参加一些决定学术方向的讨论会。例如搞哪种类型的催化剂，怎样寻找新的燃料？由于一些“外行”在场，科学家们常常要用非常通俗的语言解释他们的工作，当然从我们的表情也能判断“外行们”的理解水平。这种尴尬的局面让我很不舒服，试图改变。

我能不能也学学化学？那时候我不知道有个门捷列夫发现了元素周期表，不知道什么是有机化学，什么是无机化学。我找了研究员楼南权来给我补化学课。楼南权现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想想那时候他花那么多时间给一个小学生补课，也真是“大炮打蚊子”了。他用最通俗的语言，为我扫化学盲。我很难理解金刚钻和煤炭是由同种元素组成，而碳，氢，氧这三个基本元素，既可以组成糖、面粉、木头，也可以形成油。这些不懂让我感到自然科学的神奇和巨大的吸引力。

我学得越认真、吃力，就越佩服这些科技人员，也由此知道了自己这辈子甚至连化学的皮毛都搞不清楚。这种学习有限地为我增加了一些自然科学的常识，却让我常常想到，一个人能忘我地、充满兴趣地在显微镜下，在枯燥难解的数字间去追求一般人看不见、想不到的真理，不仅需要特殊的智慧，而且需要献身精神。所以那些无论如何搞不明白的理论没有让我觉得丢面子，倒是让我知道培养一个专业人才真不容易，我对科学家们肃然起敬，很希望尽己所能，为他们创造安定的工作环境。

我对科学家十分尊重的态度使我和他们建立了很好的关系，那时候的人没有什么强烈的物

质愿望，最需要的也就是被尊重了。我交了不少知识分子朋友，萧光琰是其中之一。我们年龄相仿，经历完全不同。

萧光琰的过去

萧光琰 1920 年生于日本，后移居美国，读完大学，在芝加哥大学取得化学博士学位。

五十多年前美国处在麦卡锡主义笼罩下，围追堵截共产主义思想。知识分子追求的就是思想和信仰的自由，所以越是压制，越有很多年轻人偏偏向往自己也不很明白的共产主义。美国不希望自己培养的技术人才为新中国服务，据说移民局官员常常坐到博士生毕业典礼的现场，动员你留下。

萧光琰当时在美国美孚石油公司工作，1949 年此公司建成了世界上第一套固定床单铂催化重整装置，应用这种装置可生产芳烃和高辛烷值汽油。萧光琰参与此工作，掌握了一些当时很先进的技术知识，正是英雄想找用武之地的时候。建国初期，中国政府广招人才。成立了"留美科技工作者协会"，动员留美人才回国参加建设。"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精神振奋，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这种形势下，很多中国留学生，心急如火地想回国报效。热情浪漫的萧光琰想到为新中国服务。

那时候萧光琰刚刚与甄素辉结婚。萧光琰曾和我说他父亲是汪精卫政府的一个部长，甄素辉的父亲给孙中山当过秘书。两人结婚后感情非常好，问题是甄素辉并没有回中国的打算。

萧光琰曾和夫人对此有过很多争论。甄素辉说：我连中文也不会讲，回中国干什么呢？现在是共产党当政，我们没有为共产党做过贡献，谁欢迎我们回去？萧光琰认为自己并不参与政治，能把美国最先进的技术带回国，就是贡献。至于在中国工作能否如愿，生活能否习惯，各种爱好如何满足，他没有细想。决心已定，谁也改变不了。

萧光琰说，如果你实在不想回中国，我就自己回去。有人说"好的婚姻是男人找到崇拜自己的女人，女人找到自己崇拜的男人"。萧光琰和甄素辉大概就是这种关系吧。在我的记忆中，甄素辉对萧光琰是崇拜的。甄素辉让步了。

1950 年 12 月，这对夫妇满怀年轻人的激情，带着对中国的石油发展事业有用的资料和大批图书，回到了没有朋友，没有亲人的祖国。

来到天安门广场，他们看到巨大的毛泽东像悬挂在天安门城楼正中间，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的标语口号到处都是。美国是个强调个体和尊重个体的社会，各持各的观点，中国则是强调集体观念，全民一致，努力表达对共产党，对毛主席的感激和崇拜。对贫穷，对落后，他还有些思想准备，而这种政治气氛，对萧光琰来说有些生疏，有些隔膜，感到要尽快适应这个他了解甚少的社会。

他被分配到石油部(那时叫燃料部)。当时石油部还没有能力成立自己的研究所，就招聘一些科技人才，又送到有研究基础的地方代培。萧光琰是其中之一。他在北京做了短暂的停留，就到了东北科学研究所大连分所（现在的"大化所"）。石油部鉴定了他带回来的资料，认为对发展当时中国还很落后的石油工业有重大价值，他甚感欣慰。

当萧光琰和甄素辉翻开了在中国生活的第一页时，发现他们面对着一个全然陌生的世界。

萧光琰离开学校不久，还很留恋大学的文化生活，刚回国各方面的条件都不是太好。在优越的环境中长大的他，觉得人的生活中少了音乐、绘画、体育活动，岂不太枯燥了！甄素辉花了很多时间布置他们的小家，想买幅装饰画挂在墙上，可到处都在卖领袖像，她不明白政治人物怎么能挂在家里呢，美国没人把总统作为装饰挂在家里。

作为一个技术人员，萧光琰在中国受到在美国不曾有过的重视，生活待遇也相当不错。他曾对我说：在美国他是一个一般的技术人员，有工作的时候生活会非常好，房子、汽车随之而来，如果失业，马上会一无所有。在中国生活比较稳定，还可以参与一些技术决策。

当时对石油炼制采用什么催化剂有很多争论，有人主张用钼做催化剂，钼要比铂便宜，不用进口。从最终效果看，铂虽然贵，但催化效率高，收率高。最后还是按着萧光琰的方案，采用了铂重整技术。北京石油炼制所成立后，接着进行铂重整中间放大试验，也很成功，到六十年代，用这

个技术建成了大型的工业生产装置，成为当时工业战线上“五朵金花”的新技术之一。我国的石油工业发展到今天，不应该忘记萧光琰的巨大贡献。

就在他刚刚回国九个月，认为自己会大有作为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1951年开始了大规模的思想改造运动，主要是针对“美国文化帝国主义”培养的高级知识分子，批判他们崇美、恐美的思想。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很多知识分子起到了社会良心的作用，很有声望。为了夺取政权，共产党注意保护和争取人才，在党的周围团结了一大批各类优秀的知识分子。夺取政权以后，他们有比较优厚的生活待遇，以便发挥他们的一技之长。但是不能让思想自由、爱提异议的知识分子翘尾巴，仗着自己懂点儿业务，就忽视党的领导。结果是大批德高望重的知识精英，科学家、艺术家、文学家站出来“脱裤子割尾巴”，当着全国人民的面集体自辱。对这一点，很多知识分子都没有思想准备，萧光琰刚刚回国九个月，对此就更是始料不及。

他迎来了人生的第一次打击

那时抗美援朝已经开始，人们怀疑从美国回来的人成为很自然的事。运动初期，萧光琰隐约感到有些人不敢和他说话，无言中拒他于千里之外。运动深入以后，有人开始在会上质疑他回国的动机。人们当时最不理解的就是“你在美国生活条件那么好，为什么选择回中国？”他平时偶尔谈到自己在美国的工作或者生活情况，被当作崇洋媚外加以批判。

当时萧光琰刚三十出头，从小学到取得博士学位，血气方刚，没有韧性。有人记得有一次在会上，他听着根本听不懂的批判内容，面对着他根本无法理解的革命群众，产生了难以忍耐的愤怒，气得把眼镜都摔了，他这种对抗运动的态度，也让群众对他更有看法。他认为很多批判实在太无理，盼望有人出来澄清事实，可是没有。当时大家都在争先恐后地表达对党、对毛主席的热爱。萧光琰想这也许是下面的人臆想出来的不实之词。遇到不合理的事，要据理力争，不能沉默。他要向上面讲清楚，于是人们经常看到他给领导写信，凡事都要求“有个说法”。他自己说话有理有据，也要求别人有科学态度。

当时的领导碰到这种情况经常是不了了之，不想明确回答，也无法明确回答。运动是他们领导的，他们的责任是激发群众的革命热情，当然向萧光琰没办法解释。

得不到“说法”，萧光琰无法忍受。在美国，得不到回应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罢工或换地方。换工作不容易，于是他就自行“罢工”。有时候好几天都不去上班，在家闹情绪。那时候，人们对美国回来的博士还是两重态度，既觉得政治上比他高一截，心理上又有些敬畏。所以也没人管他，这又引起周围一些人对他更大的不满。

回国时他充满幻想，忽然间一切都破灭了。刚刚三十多岁，下半生就要在这种怀疑中度过。

萧光琰在博士论文答辩会上

在这种气氛下，科研工作还能出任何成果吗？甄素辉能受得了吗？他变得忧心忡忡，焦躁不安，彻夜难眠。后来的运动中，没人阻止对萧光琰无中生有的批判和怀疑，而这种批判又让他没有任何退路。自己这样千辛万苦回到中国，得到的竟然是怀疑，这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

萧光琰失去了做研究工作的心态，脑子也闪不出智慧的火花。常常书放在那里，看不进去。有人看到他经常呆坐的样子，就说：萧先生这样下去，可能会自杀。他有科研能力，但现实不要他出力；他有头脑，但必须按特定的方式思考。他只好努力让自己的穿戴、言行都符合大众口味。

有人说那时他曾有过自虐的行为，用自己的头撞暖气片，他用这样的方法惩罚自己，发泄自己极端抑郁的愤怒。为了安静下来，有时他吃很多安眠药。他情绪的波动，给甄素辉很大的压力。可她是一个极其贤惠的夫人，不管萧光琰怎样，她都理解。这对夫妻，回国以后真是相濡以沫。

运动过去，生活恢复了平静。一道深深的伤痕已经在这对夫妇心中留下。本来就没什么朋友，此时变得更加身孤影单，实验室里，萧光琰也更少言寡语了。

运动过去以后，所里的领导认识到思想改造运动对萧光琰的猜测是毫无根据的，使他受伤害不小，向他表示歉意。当时还专门派人做他的思想工作。萧光琰是个非常天真的人，马上不计前嫌，重振情绪，又开始努力工作。不久，他们的生活有了新的生机，女儿出生了，给她起名叫萧洛莲，小名就叫洛洛。

1956年初，北京石油炼制研究所正式成立，希望在大连代培了几年的萧光琰到北京工作。萧光琰感到很矛盾，他虽然在大连受到伤害，但仍然热爱那里。后来他去北京工作了一段时间，想体会一下那里的工作环境，最后觉得还是大连石油所搞基础科研比较多，更适合他，就决定留在大连。在美国，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工作，是再正常也没有的事了，如果有两个地方都要你，当然要反复进行比较。可当时人们要达到的思想境界是"我是革命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安，放到天安门城楼上不骄傲，放到厕所里不悲观。"大家都在表示坚决服从分配，即使不服从也都找个说得出口的理由。萧光琰的做法显得很个别，他的犹豫被看成是患得患失，个人主义。而他自己则浑然不知周围人对他的看法，他认为选择到哪里工作，完全是个人行为，自己有选择的权利。

几经周折，他的人事关系正式转到大化所。

我和萧光琰成为朋友

大概萧光琰看到我不爱喊大口号，比较有人情味，认定我会成为他的朋友。看到我听学术讨论时满头雾水的样子，他没有瞧不起，反而主动用一些通俗语言给我讲解，让我了解什么是催化剂，为什么在各种化学反应中它那么重要。

我们比较熟悉了以后，萧光琰问我是否会打网球。我说我连网球拍子都没有摸过。萧光琰酷爱打网球，说起打网球都兴奋得很，他立刻鼓动我学网球。他说你一定会上瘾，我可以教你。我那时年轻，活跃，这既是消遣娱乐，又是一个和科学家交往的机会，就一口答应了。

受他感染，我也爱上了网球。网球场上龙腾虎跃，没有烦恼，没有伪饰造作，没有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只有输赢。出一身汗，头脑特别清楚。当时大连市正好有个得天独厚的网球场，离萧光琰家非常近，我们便经常相约周末打网球。网球这个媒介，促进了我们两个人及两家人的频繁来往。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不以利害相交，无拘无束，热爱生活。

应接不暇的新运动

1957年毛主席发表了"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篇文章，大鸣大放开始了。人们开始给各级领导提意见。

萧光琰已经有了思想改造运动的教训，言行越来越谨慎。但是当他读了毛主席的文章，还是觉得大大地给自己增长了底气，把这篇文章拿去给支部书记看，要证明一下过去人们对他的态度是不对的，没按毛主席说的办，没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忽然间形势大变，《人民日报》发表《工人阶级说话了》。我们研究所相邻的大连工学院（如今的大连理工大学）和大连海运学院等高等院校，频频向市委报捷，今天抓出几个右派，明天

抓出几个右派,唯独我们所无声无息。我觉得研究人员提几条意见，根本不是什么恶意攻击,更没有要推翻共产党,怎么会是右派呢？周围的好心人不断警告我要赶紧跟上形势,我自己也能清楚地嗅到火药味。逼人的形势让我感到再不开始抓右派,自己就要成右派了。无奈之中,我召集党委会,讨论抓右派的问题。那时我到所里刚刚几个月,什么情况都不了解,经过几次党委会讨论,就决定了右派名单,有研究员彭绍逸等,我知道他们是被冤枉的,这是我一生做过的最大的违心事。以后在形势允许时,我尽自己所能尽快帮他们摘掉右派帽子,诚恳地向他们道歉。

右派的名单中没有萧光琰,他暗自庆幸自己没乱说话。当时抓右派是杀鸡给猴看,以一儆百。结果它也确实起到了这样的作用。

大跃进开始了

到处都是“为生产 1070 万吨钢而奋斗”的口号。当时我家院子和大连工学院化工楼的后院相通。大学生们用耐火砖在院子里盖了个小高炉，所谓的小高炉比农村的灶台大不了多少,连把铁化掉都不可能,更别说炼制成什么有用的东西了。

萧光琰来我家，看着前院的小高炉就问我：炼铁、炼钢不是工厂的事吗?要有专业知识,要有预算,要建厂,炼钢的温度很高,要有特殊设备,怎么能挖个坑就搞全民炼钢?还说:有一天回家,他发现院子门上的门闩没有了，进了家门问保姆,门闩怎么没有了？保姆说,来了一群学生,要找铁锅、铁铲子去炼铁,保姆说锅还要用来做饭呢,学生们就把门闩拆走了。

更可笑的是他家阿姨买了新枕头套,他累了一天,想放松一下,刚要躺下,一看枕头套上印着醒目的大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他说:这是枕头啊,是让人休息睡觉的,要是躺在枕头上都要鼓足干劲,那人也太紧张了!能不失眠吗?我听了也乐了,觉得往枕头上印口号固然可笑,可萧光琰也太认真了,你视而不见不就行了。

很快,大跃进的浪潮也波及到科学界。原来计划三年完成的任务,现在开始用一年、三个月、甚至几个星期来完成。于是接二连三地出“成果”,一有“成果”就敲锣打鼓,连夜到党委报喜。不过以我“外行”的水平,也真是判断不出什么属于真正的“科研成果”,可凭常识就知道三天两头出成果是违反科学规律的,又不能说你们让专家评论评论是不是成果再来报喜。多年“革命经验”告诉我,要维护党的政策,不能打击群众热情,那样就会犯政治错误。

不能直截了当地阻止,无形中就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群众争先恐后地报喜。有一个苏联专家找到我说“:白先生，我真不知道你们要把中国的科学事业引向何处去。”

萧光琰忍不住对我说:科研工作怎么能这么个搞法?这简直是儿戏嘛,什么叫成果?合成一个化合物的中间体也是成果?科研怎么可能三天两头出成果？科研工作是一个长期的探索过程,要在一个题目上长期下功夫，才有可能有真正成果。

反右运动以后,做事情根据政治需要,不讲科学成了我们的特点。有人是真不懂科学,有人懂,却不敢讲反面意见。每场运动,都有一些知识分子紧跟形势,推波助澜。好多著名科学家出来论证,为什么亩产可以万斤,为什么要消灭麻雀,为什么在毛笔帽上刻个洞,接上自来水,就发出能洗碗的自制超声波。组织上要掌握每个人说过什么,想过什么,行为如何,是否忠于共产党。每个人的政治待遇,工作中的升迁,都赖于这种评价,于是千人一腔,万人一面,趋炎附势成为潮流。

在中国生长的人,顺应潮流比较容易,可对萧光琰来讲真是很困难!他常常找我讲他的不理解。不过萧光琰还是在努力跟上形势。他带着石油所的年轻人,到大连石油七厂,找到当时的总工程师张迁芳，了解工厂对科研工作的需求,想找到既有理论意义又有使用价值的题目。

与众不同

在那样一个大讲艰苦朴素的年代,萧光琰总是衣冠整洁,头发吹得一丝不乱,戴着金丝眼镜,英气焕发。这使他与众不同。他把美国的工作习惯也搬到中国,工作时要高效严谨,但不认为每天八小时都要高度紧张,必须劳逸结合。他的休

息不是悄悄抽只烟，躲到哪里待一会儿，暗自偷点儿懒，而是认真地订出咖啡休息时间，饮茶休息时间。他觉得这是为了养精蓄锐，或在轻松的环境里进行业务交流。可当时的中国，萧光琰的这些做法被认为是典型的资产阶级作风，让很多人看不惯。

萧光琰那时生活水准远远高于一般人。他夫妇俩待人真诚热情，家里招待客人，常常是一般人享受不到的橙汁、巧克力。当时对大多数人来讲能吃上水果已经是很奢侈了，萧光琰不仅经常吃水果，而且保留了一些他自己的习惯，有时还用酒精擦水果的皮进行消毒。这些事一经传开，群众中再加以渲染、夸张，就成了典型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那时所里偏重应用科学。萧光琰觉得有些题目水平不高，便说有些题目根本就不是搞科研，是测试工作。他对别人工作这种过于直率的评价，也让一些科技人员感到不舒服。萧光琰说话有时充满书生气，有时非常幽默。在那个火药味很浓，大家都认真背口号的年代里，他常常被人误解。

他家阿姨老是蒸不好馒头，他就当成个科学问题来分析：有两个因素决定馒头是否能发好，一是温度，二是压力。都是用开水蒸馒头，可能温度没问题，那问题就出在压力上。于是他的解决办法是：在笼屉里放一个压力表，控制好压力，馒头肯定能蒸好。这其实是一个书生的玩笑，他从来也没让阿姨真在蒸笼里放压力表。但他说的这些话变成很多人的笑料。

那时都是半夜做豆腐，为了新鲜，一大清早卖豆腐的就开始敲梆子叫卖。萧光琰习惯晚上看书，常常睡得很晚，又经常失眠。每天一大早老是被敲梆子声吵醒，很懊恼，就开玩笑说，我真想把所有的豆腐都买下来，这样就不用再敲梆子了。他是用这种方法表示对大清早叫卖的不满，他绝对不可能真去买豆腐，可话一传出来，又成了批判他的把柄。

萧光琰喜欢跳舞。他大概觉得我这个年轻的“老干部”太土了，就不仅教我打网球，还希望我在其他方面也有所提高。他说：你应该好好学跳舞，跳舞时既可以听到优美的音乐，又可以活动身体。我那时很活跃，他一提到学跳舞，我也感兴趣。那时到周末，大连市的一些党政领导干部、民主人士都会集中在中苏友谊宾馆，那里可以看电影，可以打乒乓球，跳舞，小小的礼堂里还有文艺节目。

萧光琰和他的夫人是一对绝妙的舞伴，每次到了舞厅，当他们夫妇一下场跳，很多人就会停下来看。那时候不管干部当中，还是归国知识分子中都有一些很会跳舞的，但是像萧光琰夫妇跳得这么好的却很少。据说当时高层的干部中，跳舞已经很风行，但在中层干部中还刚刚开始。好多人都在追求着新的生活方式。萧光琰看到我跃跃欲试的样子，就说：你可以和我夫人学跳舞，没关系，她可以教你，只有女的才能教男的跳舞。因为男女的步伐不同。

萧光琰还说：你见面时或者告别时可以吻她，或者拥抱她。现在见多了，知道那不过是西方的礼节，可当时我认为很不可思议，从心里知道他和我们有着完全不同的文化。

他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不过是增加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话内容，而他急切地把美国规范的实验室管理方法引入自己的实验室，则直接影响到他和周围一些科技人员的关系。他对下面的科技人员要求十分严格。

他曾说：有人做反应，连温度都不记录，这种试验将来不要说别人，就是自己都重复不了。如果不能把实验记录写好，就根本不要浪费这时间和试剂！失败了，找不出原因，成功了，重复不了，这不是完全在作无用功吗？

他要求任何试验必须有可重复性，有明确的误差范围。有个人处理试验结果时，在不同的坐标系里把一个数据的位置画错了，萧光琰马上发现，并立即指出，不讲情面。他说科研工作一定要严谨，有时很小的错误就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

他和我说，有些人做实验像炒菜一样，大概地加点酸加点碱，没有严格的定量概念。他在实验室建立了很多“清规戒律”，常常在给每个人挑毛病。这个瓶子要用蒸馏水冲洗，那个反应加试剂后要充分搅拌。结果组里有的人看到他，有些紧张，因为他几乎是永远能发现操作不严格的问题。中国人讲情面，他的做法让很多人不适应。

萧光琰打算回中国时，曾在美国收集了很多

他认为有用的工具书。他一直认为一个好的科技人员就是会利用图书馆的人。他经常去所里的图书馆，发现图书馆里的书虽然不少，但多已过时，而他带回来的书相对讲更新更有价值，所以他决定把这些书交给图书馆，也可以让更多的人享用到这些前沿知识。图书馆的人很高兴，就说你把书拿来吧，我们会折价给你一些钱。这完全是客气话，人家并没有认为接受图书还要给钱，当时有“中国特色”的表现应该是毅然决然地拒绝收钱，并表示贡献给国家是最大的快乐。可他径直说：你们看着办吧，象征性地给点就行。美国书非常贵，他当之无愧地接受了他认为是象征性的回报。

因为萧光琰捐献的书和资料很多，结果用他捐的书又建立了一个小小的图书馆。人们可以更经常、更容易地去翻阅那些图书资料，看到那么多人去翻阅他带来的书，萧光琰由衷地感到欣慰。他根本不知道别人对此事另有看法。

1958年，萧光琰所在的“催化过程研究室”要迁到兰州，那里的条件当然远不如大连。萧光琰根本不认为要“哪里艰苦哪安家”，而是“哪里科研条件好，哪里能搞我的催化剂，哪安家”，他要求留在大连。所里研究以后同意萧光琰留在大连。别人认为这是对他的照顾，他认为这是理所应当的。

有些科学家比较容易被公众接受，被社会认同。也有好多科学家有些特定的素质和癖好，他们对化学结构的识别迅速、敏锐，但对人事关系却迟钝、木讷。萧光琰属于后者。他拒绝所有的空话和大话，也不想和不喜欢的人一起假笑。搞政治越中庸越好，越能符合大多数人的想法越好，可搞科学是越能标新立异，越能超逾常人的想法越可能有突破。很多有成就的科学家都是科学怪人。

当时著名数学家陈景润也在我们大化所。有人回忆：“与陈景润同住在一个房间的转业干部，有一次大大咧咧拿他的一盒香烟抽。这件事把陈景润吓坏了，第二天他马上向团总支书记刘宗海汇报，并指出怎么可以不经本人同意，随便拿别人的香烟抽呢？这是一种不道德和偷窃行为，请求组织上对此事严肃处理。”可以想象，陈景润是不善于和人打交道的。问题是一个社会不能只让中规中矩的人发挥作用，社会和大众越宽容，越有包容性，越能造就更多的有特长的优秀人才，包括科学家。

再受伤害

反右斗争、大跃进之后，新的一轮政治运动又开始了。叫“拔白旗，插红旗”。

反右斗争中萧光琰没被打成右派，这次运动中他成了靶子，因为他从没被信任过的回国动机，因为他严肃的工作态度，因为他无法改变的“资产阶级”生活习惯。他这些有懈可击的特点给每一个热爱党的人一个表现自己的机会。

大字报铺天盖地：批判他学阀作风，在研究工作中不能平等待人，主奴关系，要求苛刻，经常训斥助理人员；批判他养尊处优的生活方式，爱跳舞，喜欢音乐，醉心于贵族运动——网球。有的大字报写：你拿着高额工资，几年来没有任何成果，你执行的是挂羊头卖狗肉、唯有理论高的白旗路线。他接受捐书的钱是资产阶级思想的集中体现，很多人认为他是小气鬼，说这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的贪婪，甚至说他是奸商。

萧光琰气坏了，他找到我说：我哪里知道中国的规矩，不是等价，更不是盈利，而是象征性的收点钱，怎么就成了奸商？在美国好朋友之间，甚至父子一同去吃饭，都经常自己付自己的款……中国人卖破烂不是也收钱吗？怎么我给图书馆真正有价值的书都不可以收钱？你想我在美国买了书，运到中国，送到图书馆，而且都是工作急需的，这完全是象征性的收钱，比我真正应该得的少多了。再说，当时我也没说要钱，我怎么知道他们一方面要给我钱，一方面希望我说不要钱呢？他们觉得我不该拿钱就不要问我。要给我钱，我同意了，怎么就是资产阶级思想？于情于理都不通啊。

我很理解萧光琰的心情，只能劝慰他想开些。我已经忘了和他具体的讲些什么，现在想来一定是些十分苍白无力的话。因为群众也没什么不对的，按当时党的教育，从来没有让不同思想行为的人互相宽容。

萧光琰迎来了新的一年。新年晚会上有一个节目是活报剧，使用侮辱性语言和动作，把萧光

琰搞成小丑模样，把他说过的一些话，做过的一些事儿夸大并加以嘲笑。这种嘲弄和侮辱是任何人都难以承受的。他忍无可忍地说：我这样的人，如果人格被伤了，改造就慢了。可人们认为对资产阶级的侮辱和嘲笑是革命行动。

他有一个幸福的家

虽然各种运动不停，我和萧光琰仍然一起打球，两家仍然经常来往。各种批判和人身侮辱使他越来越无所适从，刚回国时的热情和自信渐渐消退。他和我讲他的委屈，有时甚至流下眼泪。可贵的是他仍然念念不忘他的催化剂，不厌其烦地给我讲他在科研上的思路，想让我共享他对催化剂开发和应用的设想。我从心里理解和同情他，可我只能谨慎地用我自己的方式尊重和保护他。

真正给萧光琰生活的力量和勇气的是他的家。他有一个和睦家庭。他自己爱好广泛，对夫人非常体贴。夫人甄素辉不仅长得漂亮，而且气质高雅，文静宽厚。他们的女儿小洛洛胖乎乎的，一头卷发，聪明天真，又极有教养。那时候萧光琰到我家，每次来都带着他的夫人和宝贝女儿洛洛。我的孩子比洛洛大几岁，他们在一起总是玩儿得很高兴。

他的夫人当时天天挤公共汽车到大连海运学院去教英文，可是她从不抱怨，完全是一副随遇而安的态度。在我家里，我和萧光琰谈话时，他夫人从来不插嘴，如果我有事情问甄素辉，她总是就事论事地回答（不太流利的中文），从不多说。她非常爱丈夫，坦然地接受着现实。回国十年了，萧光琰知道妻子承受委屈的能力远远超过自己，每次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夫人都静静地让他倾吐，然后用女人的柔顺和坚韧来安慰解脱。

她对萧光琰照顾得无微不至。当天气骤然变冷时，她会变出一件毛衣，而萧光琰就像听话的孩子，把毛衣穿上。你觉得他们之间非常和谐温馨。萧光琰对夫人的关爱无处不在。他会先走一步去给夫人开门，进了门如果夫人要脱外衣，他马上从后面把衣服拿好，出门前他会先一步把夫人的外衣撑开，帮夫人穿上。有西方“妇女先行”的君子风度。他和夫人说话也非常客气，从来没有中国男人对待“屋里的”那种命令式。我看到这些，觉得很新鲜，也很欣赏。

萧光琰和洛洛讨论功课，做游戏。洛洛很争气，从上学就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那时候我家里养了一盆君子兰，正值盛开之际，洛洛的可爱激起了我的艺术灵感。我叫她坐在君子兰前面，要给她照相。萧光琰竟然认真地问六七岁的女儿，你说坐在花的旁边好还是坐在花的后面好？洛洛有自己的主意，坐在花的旁边，眼睛看着花，我给她照了一张我自己很满意的艺术照，可惜在动乱中丢失了。前几天，女儿打电话高兴地说，无意中，她发现了一张一寸的小照片，是我家三个小孩与洛洛的合影。洛洛举着小手，乐呵呵地招呼人。

我家的三个孩子和快乐的小洛洛（前）（摄于大连工学院化工系的后院，时间约在 1960 年，后面的房子是我家。这个院子曾盖起小高炉炼铁。）

有了这个给萧光琰安慰和幸福的家，不管外界的形势如何，他都努力保持积极的生活态度。不仅永远注重自己的

仪表，家里也布置得极具艺术感。当外界的压力越来越大时，萧光琰所有的欢乐越来越寄托在自己温暖的小家里，寄托在孩子身上。接触过他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好丈夫，是一个好父亲。他说有这么可爱的女儿，有这么漂亮温顺的妻子，还图什么呢？

两极对话

我和萧光琰的经历、背景完全不同，很多观点也不同，进行的常常是两极对话。其实这些不同，开阔了我的眼界，向他学了很多东西。

他常说：工作和娱乐之间要有个平衡，只会工作，不讲究一点娱乐和享受，也是人生的遗憾。人追求的不是工作的完美，而是人生的完美。他对别人批判他爱打球、爱跳舞大惑不解，他问我人如果不会休息和娱乐，工作有什么意义呢？工作不就是为了人们更好的休息和娱乐吗？

那个年代，很多科技人员都想入团、入党，一些研究人员非常注意搞好群众关系，争着做收拾卫生、打热水之类的事，群众的反映不错。可萧光琰不仅从来不做扫地清洁这些事，还说这应该是清洁工的事。

我对他说：为了给自己创造一个好的工作环境，你得入乡随俗，随大流，不能轻易得罪周围的人，对下属的科技人员的要求不能太高，更不能为了工作上的事发脾气。脾气倔强的人常常质地脆弱，愿望达不到还毁了自己。要有点儿遇水则柔，遇铁则钢的韧性。有人觉得你有博士架子，那你以后做事就注意点群众影响，比如多和工人打招呼，帮助清理卫生，和工人打成一片。他会很奇怪地问：为什么？

萧光琰的动手能力很强，为了试验，他能自己吹出各种试验用的精密玻璃仪器，还经常教工人一些吹玻璃的特殊技巧，老玻璃工都很佩服他。他说那是工作需要，我可以做。可我的工资比一般工人高很多，让我总和工人打成一片，去干工人的活，那不是浪费吗？人是有分工的。

虽然他知道自己得到了不少物质上的照顾，可这些并不能改变一个有责任心的优秀知识分子心灵中的某些遗憾，他一直认为中国人的思想方法应该改变，最近看到有文章提到他曾写信给妹妹说："我曾经为党对领导科学缺乏经验而造成的一些缺点和损失而痛惜过，但是，我相信党的领导会从经验中逐渐懂得领导科学工作的规律。缺点是暂时的。一个科学工作者的责任，就是尽力帮助党了解科学工作的特点和规律。"从这些话里可以看到他的一片真诚。我想他当时与我的很多谈话，是希望我这个难得的知己能冲破思想束缚，更好地理解科研工作规律。

中国文化叫人隐讳的保护自己："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冤家宜解不易结"；"好汉不吃眼前亏"；"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些道理却很难让从小生长在美国的萧光琰明白或接受。而他的很多观念，对我来讲也很生疏，很难解，有些我也是经过很长时间才理解。

成年累月，在强烈的政治氛围中，萧光琰已经逐渐失去了自我，他也认为自己应该接受改造了。那么多人都说党是对的，在这巨大的多数面前，他感到必须怀疑自己，否定自己，可他又觉得，怎么可能所有的人都一样，让一个人完全变成另一个人？如果没有能独立思考的个人，社会能发展吗？科学家即使已经尽量感受和运用自由的力量，思维也还是在种种习惯的束缚中，如果每天接受各种框框，必须往东想或往西想，能有突破吗？

"拔白旗"运动更拉开了他和周围人的距离。他不再轻易发表不同意见，改变了刚回国时，一有想不通的问题，就要打报告，要说清楚的态度。

现在想来，他经常对我诉说他对现实的不解和无奈，有些是很有道理的，他也希望从我这里得到更多的理解和支持。作为一个基层领导，我已经习惯了和党步调一致，对他的想法，不敢做深入思考，只是想让环境尽量减少对他的伤害，让他学会保护自己。可我们的私人友情无法改变大环境。我在承担一个基层领导的责任，要对自己的行为后果负责，从不敢和他说得太深。这种有所保留的交往虽然温热过他因不断的运动而灰冷的心，但却无法解除他的痛苦和迷茫，无法改变他的命运。有些时候，理解一个人就是创造一个人，可惜在那个时代自己也怕犯政治错误，有些事情即使知道他说得对，也不敢给予大胆支持，潜意识当中，也在适应环境保护自己。所以直

到现在，作为一个被萧光琰真诚信任的朋友，我一直觉得很对不起他。

我被停职反省

即使我很谨慎，也没保住自己，更没保护好很多需要保护的知识分子。不久我自己也成了在党内被批判的对象。因为我的很多想法与那个时代不一致，同时也有很多非常个人化的因素。

大跃进运动之后，从轻工业部调来了大连市委新书记。他的夫人原来是国家石油局的副局长，调到石油研究所任党委副书记。我那时老是觉得自己水平不够，心想从石油局来的人，水平一定比我高，正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来石油所，我就主动提出让她担任党委书记，我担任党委副书记。科学院党委经过研究，同意了我的要求。

新书记工作努力，但正襟危坐，常用独得天下真理的样子去教训别人。知识分子不太吃这一套，所里的很多人有事不去找她汇报，而老是来找我谈。群众对她的不满，在她那里就转化成对我的不满。她给我的工作设置障碍，甚至不让我到北京去参加我应该出席的科学院的会议。

开始我还是很想迁就她，但是有太多的观点不一致，我对知识分子的爱护被认为立场站在“没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一边。她是一个坚定的左派。

我们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市委只好派统战部的人来调查。统战部的人在石油所召集了会议，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奇怪的是竟然所有的人异口同声，认为责任在她，不在我，所有的人都为我说话。她继续呆在石油所已经毫无意义，只好把她调走。我又恢复了正书记的职务。后来她连续换了几次工作，都搞不好关系。我那时还不知道，她的走，其实已经为我自己种下了未来挨整的种子。

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被批判以后，党内开始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运动”，我成了在劫难逃的被批判对象。大跃进之后，市场物品紧缺，货架上往往是空的。我家阿姨到市场买不到菜，回家说：外面到处是标语，搞除四害，搞六无六净（已经不记得其定义），搞什么六无六净，大连市场的货架子上才是六无六净，什么都没有。我觉得阿姨形容得很形象，就在党内的会上说了。

综观我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斗争不力，妥协退让，加上“六无六净”的“右倾言论”，市委领导就把我定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大连市委让我停职反省，每天在家写检查。当时整我的势头很大，我心里清楚这里的内在起因：得罪了市委书记夫人。虽然心中无愧，失去工作，停职在家写检查，也还是有很大精神压力。

在自己对党的事业充满热情的不惑之年，无端挨整，使我对于“右派”、“白旗”被整的心态滋味，对萧光琰和其他在运动中挨整的人有了更多的理解。更加了解了在由上而下的政治漩涡里，人们对自己的命运是何等地无能为力！表面上每个人的批判都是从革命事业，党的利益出发，其实政治清算背后，掺杂了数不清的个人恩怨，好多人是利用把自己装扮得大公无私来悄悄地获得私利。

我被停职这段时间里，没再去打网球，和萧光琰在一段时间里就没有了多少联系。

又见光明

当我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报到省委以后，省里派人下来调查，发现实在是没有什么事实，下面的人都替我说话，所以就决定不给我戴帽子，只算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大约在家里呆了半年以后，恢复了我的职务。这次停职反省，使本来个性不强的我变得更加谨慎。

我恢复工作以后，很珍惜工作机会，和张大煜所长的配合也愈加默契，一心想把研究所搞好。

张大煜长在中国，到德国留学四年，基本上接受的是中国文化。他工资很高，可十分节约。工作中他个性随和，能变通顺应，迂回解决问题，逆境也在他身上留下印记，却不会留下难以弥合的创伤。张大煜勤奋刻苦，对化学领域里的科学前沿非常熟悉，在研究方向和选题上很有前瞻性，广招人才，尊重人才，知人善任。除了研究学问以外，他没有很多其它的个人爱好，全部身心都投入到科研工作中。是个典型的中国式的优秀知识分子。大化所至今能在很多领域里保持领先的学

术地位，张大煜功不可没，是一个经得起时代考验的科学奠基人。

当时张大煜有很多想法，他曾提出把“大连石油研究所”的名字改成“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从名字上就不再是完全搞实用科学，科学家们可以更放心大胆地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题目，我给与全力支持。这在当时对科学家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那时我受科学家们的熏陶，产生了一个基本思想，就是科研工作一方面要有明确的学科方向，这样在基础理论上才能有突破，真正推动科学事业；另一方面，必须有结合实际的题目和项目，这样科技人员才会更直接地看到自己社会价值，产生更大的科研热情。

我和张大煜交流了这些想法，决定和一些技术骨干进行更深入的讨论。于是1962年大连化物所在青岛开了一次会议，解决大化所科学研究的大方向问题。这就是对大化所的未来有重大影响的“青岛会议”。这次会上，我们还明确提出要培养年轻人。在科学领域里，很多重大发现都出自年轻人。当时选了10个年轻科学家作为技术骨干和重点培养对象（他们中有六个后来当了科学院院士），提供了必要的人员和设备，让青年科学家放手干。同时确定了党政工作人员要为科研人员服务的指导思想。

那时从上到下还是提倡自我批评。所里进行了“解疙瘩”等拨乱反正的活动，对反右派，拔白旗，反右倾中的一些过火做法进行纠偏，运动中有些有过激言行的人还诚心诚意地向萧光琰赔礼道歉。我也很真诚地向在过去的运动中挨整的人道歉，当然包括萧光琰，希望他们不计较运动中的过火行动。萧光琰很兴奋。

萧光琰是个不掩饰自己情绪的人。当他感到作为一个人受到应有的尊重后，心情十分愉快。他又开始常常邀请一些年轻人到他的家里，用水果、点心和糖款待他们，和他们谈工作，谈学习。

他请年轻人教他夫人学中文，让他夫人教年轻人学英文。看到有的年轻人的英文不好，买来英文小字典送给他们，让他们多背多记一些单词。他认为做科研前提是掌握信息，要掌握信息必须学好英文。他努力用实际行动改变和周围的关系，有时是有意识的，有时则是无意识的。人总是会被潮流裹挟的，萧光琰在慢慢地改变自己，试着融入这个社会。

在这段时间里没有什么运动，萧光琰的失眠也奇迹般地好了。心情的舒畅使他恢复了科研热情，产生了很多创造性的思维，又开始专注地搞他的催化剂。当他读到很多生物酶的催化作用时，立即联想到化学催化剂，想到是否可以把一些生物酶用于体外的生物或化学反应。这个想法，使他很激动。当时在大化所没有搞生物催化剂的条件，当他知道青岛海洋生物研究所有可能进行这方面的工作时，就要求兼任那里的研究员，以满足他对催化剂事业的追求。

最近几十年，新的生物催化剂——各种酶——不断被发现，成为现代生物化学的重要领域。在日常生活中，酶也有了愈来愈广泛的应用，例如用蛋白酶或脂肪酶清理下水管道，大量的工业污水处理，等等。这证明萧光琰在六十年代初对未来的学科方向看得非常准，相当有预见性。

在这种宽松的环境中，萧光琰焕发出极大的

本文作者近照

科研热情和聪明才智,他努力工作,这期间完成了很多论文。1964 年大化所承担国家急需的"大庆中油加氢裂化制取航空煤油和低凝柴油"的课题攻关任务,萧光琰为催化剂最后研制成功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的工作成绩很快得到了肯定。不久他当了侨联的副主席。1964 年大化所成立了三室,他当了室主任。

那时他曾经找到我,说他想见一见已经十年没见面的哥哥,如果他哥哥不能来中国见面,是否可以到香港见面?他希望他的哥哥也能来中国工作(他哥哥当时在美国的保密单位任职)。我当时听了,很感动。在历尽人世沧桑的今天,我觉得他在多次挨整之后,还想让他的哥哥也来中国工作,太天真了。

1964 年末,我离开大化所到北京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工作。那时候的通讯条件和现在没法比,此后,和萧光琰的直接来往就很少了,只是从到北京开会、办事的人那里听到些零星的情况。

文化大革命开始

1966 年,文化大革命时中国人和人之间的相互伤害,走向极点。我很快就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每天挨斗。

我经常被拉出去游街。一次造反派把我拉到街上时,给我挂个大牌子,我们手里还拿着盆,拿着棍,一边敲一边跟着喊打倒自己。人群中的女儿看到了我,我心中嘀咕着回家怎么向他们解释。回家后夫人、孩子像迎接"英雄凯旋"一样,准备了好饭好菜,想用这种办法安慰我,我知道瞒也瞒不住干脆直话直说:"今天我被游街了,给我挂个大牌子,写着'打倒铁杆保皇派白介夫',不过我一看,旁边那人挂的牌子上写的是'打倒钢杆保皇派×××',心里想,还有比我硬的呢!"全家大笑起来。

另一次斗争会上,造反派给我带了顶常见的很高很尖的纸帽子。不知谁想出来新花样,给我旁边那个挨斗的人戴了顶老戏里县官戴的帽子。两边有两个大耳朵,斗他时一按他的头,两个大耳朵就跟着一煽一煽的,我看着觉得很可笑,虽然在挨斗,心情并不坏。这时候,突然有个造反派党委副书记,年纪比我还大,上台狠狠煽了我两巴掌,以表现他的革命精神。那时有很多这样的人。

人有群胆没有孤胆。那时候被打倒的人很多,心里不太紧张。在挨斗时,周围很多人,特别是所里的工人对我仍然特别好。一次斗争会上,造反派把我按到地上跪下。这时一个外号叫唐二愣的工人,对着造反派大叫了一声:"别让他跪着,他跪着也比你们站着高。"我当时心里真是感动。唐二愣马上也进了专政队,他出身好,什么也不怕,造反派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

不久,造反派让我收拾东西,我知道以后就不许我回家了。那时候周围已经有不少人自杀,包括我的好朋友王志华(科学院的副秘书长)。我曾参加抗日,有跟着共产党打天下的历史背景,记得当群众敲锣打鼓开除我党籍的时候,我很自信地对家人说,如果我被开除,那百分之九十的人都得被开除。我长期做人的工作,知道怎样在尽量不伤害别人的情况下保护自己,本身性格也比较平和,不很激烈,总是相信这种情况会改变。这些因素都使我对文化大革命的猛烈冲击有较强的耐受力,即使这样,有时候我也觉得很难熬,很理解人为什么会想到自杀。

我被关在专政队时,常常会想到过去在一起的同事都怎么样了?我常常想到萧光琰,很为他担心。萧光琰的历史背景不能给他任何保护,他的思想行为和当时的社会有如此之多的格格不入,他性情急躁,有人说他像个玻璃制品,透明,坚硬,很容易破碎。他夫人中国话都讲不流利,他们一家怎么度过这场灾难?他们挺得住吗?

我被放出来不久,就听说了萧光琰的遭遇。我这么不爱激动的人,却久久地,久久地不能平静下来。

走向深渊

根据我对萧光琰的了解,和他周围人陆陆续续的述说,他生活的最后片断,在我面前一幕一幕地闪现。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萧光琰像当时中国无数的臭老九一样,成了被打倒的对象。他家也像我家一样,挤进其他几家人。住进来的人要共用厨房、厕所。这对很习惯保护隐私的萧光琰来讲,是太不习惯了,突然,你的一举一动都在别人的

监视之下。

他和他夫人本来就不太会做饭，这时候几家人挤在一个厨房，常常没有空间轮上他们做饭。在外面挨了批斗回家，只能喝口水，吃几块饼干。周围的人都有高度的革命警惕性和自我保护意识，对他们一家人都唯恐避之不及，谁也不敢理他们，冷眼和歧视包围着他们。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以及过去那些对他生活作风、工作作风的批判已经太不够分量了。文化大革命形成了一个最专制同时也是最自由的空间，只要你出身好，或暂时属于“革命群众”，那你就可以发挥自己最丰富的想像力去臆测别人的心理，去给别人扣帽子。所里的大字报又再次推断萧光琰回中国是想当特务。

尽管萧光琰想努力适应中国的环境，到头来还只能当个反面教员。他回中国以后除了给哥哥写写信，从没和其他在国外的人来往过，他心里清楚自己不是特务。至于其它问题，其实大多是学术问题，因为接受了一套美国实验室和公司的管理方法，在中国不适用，因此得罪了一些人。自己原本不参与政治，与人无争，与世无争，哪里有能力去反党。

文革开始时，萧光琰还能承受。起码他每天还能回家。洛洛生在中国，文革开始时她只有十四岁，当时学校里开始把同学分成“黑五类，红五类”，她当然属于“黑五类”，压力很大。因此也清楚地感到爸爸的心理压力，

萧光琰一家一直在互相安慰，互相支持，盼望情况起变化。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他们全家都挺住了。可形势愈加恶化。工宣队又进驻了大化所。萧光琰意识到，自己遇到比以往更大的危机。

工宣队有个人老是戴着八角帽，大家都叫他“八角帽”，是大连电磁场的工人。态度很凶狠，动辄就动手打人。1968年10月5日，工宣队派人把萧光琰抓进“牛棚”，与其他牛鬼蛇神集中在一起。同时，抄了萧光琰的家。抄走了他家一切值钱的财物，其中包括甄素辉父亲给她留下的家传的戒指（有人说是孙中山送给她家的）。

在中国这个环境中，萧光琰特殊的经历，使他比一般人更依赖他的家，突然进了专政队，离开了夫人，离开了女儿，他感到失去了一切。前面一片黑暗。

人们在努力证明他是特务，不管有没有根据。工宣队希望工作有成绩，能抓出美国特务，在当时多荣耀啊。于是萧光琰被搞成有背景、有组织的特务机构的成员。人们不去追究这特务是真是假。当时所谓“打击一小撮，保护一大片。”其实是“打击一小撮，吓倒一大片。”大多数群众是顺应潮流的，也形成一种可怕的力量。

“八角帽”的功劳越来越大。在他眼里，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怎么“教育”都不过分，他们没有什么功劳，却过着比工人好得多的生活。他们用当地人发“博士”的谐音给萧光琰起了个外号叫“白屎”。从萧光琰的交代里得不到更多的特务活动信息，为了扩大战果，有人开始动武，特别是“八角帽”，认为这样才可能让他彻底交待问题。每天拳打脚踢，甚至用“三角带”这种特制的刑具来鞭打。严厉的、无休止的“审讯”周而复始：你在美国挣那么多钱，生活那么好，为什么回到中国？你能把美国的资料弄到中国来，一定也能把中国的资料弄到美国去，你为美帝国主义搞了多少情报？

萧光琰不断地写检查，写揭发材料，回答他永远找不到答案的问题。他写出来的东西不能让工宣队满意，他们需要的是有轰动效果的揭发材料。他们逼他一遍遍地写。

四顾无援，遍体鳞伤的他，在经历了世道人心，生死荣辱之后，心如死灰。刚归国的时候受到怀疑，五年，十年还在怀疑，回国服务快二十年了，还在怀疑。他面对着一个他无法理解、也无法理解他的世界。

1968年12月6日，工宣队的“八角帽”又对萧光琰进行体罚。他精神特别坏，喃喃自语：“共产党的政策是给出路的……”在这段时间里，他一定反复想过自己的出路，寻找过生存下去的理由。可是，他看不到出路。他不想连累家人，不想辜负甄素辉的感情，更不想对不起孩子。最好的办法就是什么也不留下，让他们更容易划清界限。这几乎是文革中自杀的人的共同特点，要么不留遗嘱，要么留遗嘱把自己大骂一顿，为的是不牵连家人。

12月11日晨，当专政队员喝令“牛鬼蛇神”起床时，萧光琰终于不必再爬起来，面对这

个丑恶的世界了。验尸结果 :服过量安眠药——巴比妥自杀。他走了,带着满身的伤痕。他刚刚四十八岁。

儿时的萧洛莲

这是‘ 八角帽 ”没有想到的,也是工宣队的头头没有想到的。他们不知道灵魂高贵的人往往脆弱。据说工宣队也感到紧张,他们加紧搜查了每个被专政的人,防止再有‘ 畏罪自杀 ”的。可见他们知道把人逼上绝路是错误的。但工宣队同时宣布这是阶级敌人走投无路时的选择,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胜利。工宣队的人贴出了‘ 特大喜讯 ”晓喻全科学院,决定‘ 乘胜前进,深挖一切阶级敌人 ”。

他们确实取得了伟大成果。由大连化学物理所,大连海运学院,大连运输公司、大连妇产医院组成了联合专案组,并命名编号,把以萧光琰为中心的(三○一)特务集团案列为重点大案,进行紧张的内查外调,株连所及达十一个单位二十六人，其中包括和萧光琰交换过热带鱼的老理发员,以至给萧博士打过针的护士。当然,他们说这是“ 清队的重大收获 ”;“ 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但可惜的是,任你怎样政策攻心,棍棒启口，硬是搞不到一点像样的证据。所以;“ 三○一 ”一案实质上毫无结果,以至不了了之。可恶的是;“ 专政队 ” 的暴徒及其幕后指使人的功劳却不减。大连化学物理所已经得到上级的重视,不久,他们就成为毛远新亲自抓的典型,作为“ 工人阶级占领科研部门 ”的活样板,把他们的‘ 经验 ’赫然发表在《 人民日报》上。

九泉相会

在萧光琰已经长眠不醒时,甄素辉正在营城子农场劳动改造。当天下午大化所工宣队的人把她叫到大化所。严肃地宣布“: 反革命特务分子萧光琰畏罪自杀,他的问题是敌我性质的。你要继续交待。 ”

甄素辉异常安静。她甚至失去了女人痛哭的本能。她看着丈夫的遗体，提出了任何人都没法拒绝的要求：准许她请两天假，回家照料多日不见的孩子，她的请求被批准。她当天就回家了。自从他们夫妇俩被关起来，十四岁的洛洛就开始孤身一人,无人照料。

甄素辉天性柔弱,却善解人意,在萧光琰心情恶劣时,她总是轻声细语地给他安慰。她外圆内方,有自己生活的原则,做人的原则。萧光琰多次挨批判,甄素辉永远站在他身边。可是萧光琰悄悄地走了,没留下一句话。出于母亲的本能,甄素辉不能不想,如果她随萧光琰走,洛洛怎么办？洛洛没有成熟到能像成人一样为自己负责,又不是幼稚的不懂事的小孩子,我想甄素辉一定和女儿进行过一场世界上最艰难的谈话,进行了外人无法判断的生死抉择。洛洛曾把自己的一张照片留给了同学,小小的孩子在照片背面工工整整地写着 :永久的纪念。看来她对一切是有准备的。

甄素辉和洛洛一起包了饺子，一起吃了饺子。几天后,当人们发现她们的尸体时,母女俩紧紧地相拥,凄然地告别了这个世界。

多少年来洛洛可爱的样子一直在我面前晃动,无法忘却的可爱、弱小与无辜！刚刚十六岁,正值对未来充满美好幻想的花样年华。我也一直想为什么甄素辉能作出这样的选择 ?唯一的解释是她心中充满太深切的爱与太彻底的绝望！

据说周总理知道了这件事，而且亲自过问,追究责任。当年毒打萧光琰的‘ 八角帽 ”和工宣队的头头都受到了处罚。

我不能说萧光琰是一个没有弱点的人,但我可以说,我自己,我周围的很多人,愧对萧光琰的赤子之心,愧对萧光琰对我们党、我们国家、和对我们的信任。他曾怀着怎样的热情踏上这片土

地，又怀着怎样的绝望无声离去？历尽凄风苦雨之后，他的一家竟选择了这样的方法驶进人生避风的港湾，这成为我心中永远的痛。

愧对萧光琰的亲人

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萧光琰的哥哥萧光灏从美国回到中国，他要求和我见面。我当时很奇怪，他为什么要见我呢？萧光琰去世时，我离开大化所已经三年多了。我的印象中，他的哥哥应该比我大几岁，但看上去挺年轻。他一下失去几个亲人，却仍不失其温和善良。见到他，我除了寒暄，竟一句话也讲不出来，心中涌起的全部是难过和惭愧。

萧光灏话还没开始，已是老泪纵横。

他说他很后悔，那时候萧光琰多次写信想见见他，来中国也可以，到香港见面也可以，他对中国的一些情况也有所闻，但自己的工作放不下，一直没回来。总以为都还年轻，将来见面的机会很多。实在没想到此生不能再见。每当想到这里，他就觉得没有尽到当哥哥的责任，萧光琰一定是有难处才多次写信想见他。可萧光琰在信里从没讲过他的真实处境。他怪罪自己为什么就没早一点儿想到呢。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美国也有报道，那时能设想萧光琰的处境，可已经无法联系，现在来了，可是太晚了！什么也不能为他做了。

萧光灏说他很早以前就从光琰的信中知道，我和萧光琰关系很好，给了他很多关照和帮助，他这次来一个是想看看弟弟、妹妹生活过的环境，看看他们走过的街道，他们工作过的地方，做点生者还能为他们做的事；另外就是想来看看萧光琰的朋友，也表示一点谢意。他说萧光琰在回中国这段时间里，除了家庭之外，总还尝到了一些人间温暖。

不是指责，不是声讨和愤怒，而是感谢，这是我万万没想到的。作为一个基层领导，其实很多批判打击萧光琰的运动都是我领导的。虽然有很多都是不得已而为之，但这毕竟有一份我的责任。听到这里我实在有些听不下去了。我很想说“对不起”。

我不记得当时我都对他说了些什么，可我记得自己历经劫难，刚刚在走上坡路，还心有余悸。当时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心中有再多的不满也不敢否定文化大革命，不敢否定任何一次政治运动。我不想去说空话大话，也不敢说出自己真正想说的话，那种惶惑和尴尬的心境至今记忆犹新。听说他来中国还有一件事，就是想找到当时孙中山送的那个戒指，对他来讲，这个戒指有太多的纪念意义。后来调查，这个戒指被当时抄萧光琰家的人卖了，最后也没有找到。

现在的中国我以为可以讲真话了，可是与萧光灏天各一方，也许我们永远失去了交谈的机会。我已经八十多岁，一直坚持打网球，挥拍之间，我常常想到萧光琰，想到他说要练好基本功，想到我们曾经的友谊。到现在我也打听不到萧光琰一家的骨灰在哪里。这样一个和睦的家，以这样惨烈的形式写下了这样的悲剧，是我们民族的不幸。那个荒诞的岁月的形成，应该反省的不仅仅是上层领导，也包括我们基层领导。每一层人，包括我自己，都有一份责任。萧光灏也快九十岁了，我希望他能知道，我们没有忘记萧光琰，没有忘记这个充满爱国热情的科学家的毅然选择，没有忘记他对中国石油工业的贡献，没有忘记我们给他造成的致命伤害。

历史常常会以不同的形式重演。我期盼“萧光琰”式的家庭悲剧不以任何方式再现。我们急需建立起有效的监督机制，不靠英雄人物来扭转乾坤，使这个国家即使有错误，也行而不远。我们也要完善我们的文化，增强其包容性，容纳不同的习俗及思维方式。

不能从苦难中汲取教训的民族，一定是没有前途的民族。

注：我年事已高，记忆会有很多的不准确和疏漏，可自己已经没有精力去找人核实。若有当事人了解更详细、准确的情况，我希望本文有机会得到补充和修改。文章大概成稿后，让女儿去大连，找当年与萧光琰共事的人核实和补充了一些情况，他们是陈庆道、李文钊、刘宗海、陈怡萱。另外关力、刘秋荣、杨海平对本文进行了一些文字修改，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作者系北京市前副市长、北京市政协第六届、第七届主席）　　（责任编辑　吴　思）

耀邦与我的两次谈心

● 王仲方

我的日记里记录了与胡耀邦同志的两次谈心，现整理出来以纪念耀邦同志九十诞辰。

当选总书记后的一次谈心

1980年3月1日，报纸发表了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公报。3月2日发表召开十二大的决议，成立中央书记处的决议，公布了书记处成员十一人的简历。这一天是星期日，上午我去看耀邦同志，他正在家里独自一人读《东华录》。我们做了一次长谈，将近两小时。谈兴未尽，我告辞了。这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交心之谈，当然主要是他谈的。

我首先谈到五中全会开得好，公报也写得好。耀邦说，这个公报是下了功夫的，在写法上不按议程一项一项地写，而是集中起来写。突出了五中全会的主题，加强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公报中，为少奇同志平反占了两大段，篇幅最多。但是并不影响主题，并不使人认为五中全会就是解决少奇同志平反问题。其实五中全会上议论最多的是汪东兴等四位同志的问题，但公报上对四个人的问题就是几句话。本来对汪还可以说得好一些，但他在政治局检查时，总想把总理拉下水，这就不好了。他不听我的意见。总理当时的处境，大家是理解的。

公报定稿时，已是2月29日下午七时四十二分，离广播只有18分钟。有人建议推迟发表，这怎么能行呢？已经事先打过招呼，国内外都在等着，不能按时广播，人家会发生各种猜测，说五中全会有分歧啦！公报意见不一致啦！等等。必须按时广播，这是一个战略眼光问题。

公报一公布，国内外反应非常强烈。总的反应是好的，都认为中国政治局面更稳定了，保证了政策和领导的连续性、稳定性。

公报一些重要的论点，可以开出若干题目，写一批文章，如不搞终身制等等。宣传部要抓好五中全会的宣传。

耀邦接着说：小平同志的战略眼光是很高的。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五中全会，提前召开十二大。这些重大战略部署都是他提的，抓得很紧。按照小平同志的战略部署，再有三年，即使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有什么三长两短，也不致出什么大问题，政策和领导的连续性就有保证了。三年，经济工作大的发展，也在三年以后。1983年，马克思逝世100周年，我们的情况会比现在更好。我们大家一定要发奋图强，好好干。

耀邦语重心长地说：我们不论在哪里工作，做什么工作，都要力求有所建树。政治上的建树，思想上的建树，理论上的建树，改革上的建树，工作上的建树，总之要有所建树。你在某件事情上提出一个好的意见，做了一件工作，写了一篇文章，起了好的作用，也是一种建树。比如北京市，首都所在，搞好市容的美化，种树、种花、种草，把服务行业搞好，既可美化首都面貌，又可解决就业问题。抓住这一条，带动各方面，也是一种建树。不抓这一条，老是想搞重工业，搞钢铁，搞石油化工，搞得首都污染越来越严重，街道市容越来越脏，社会秩序很乱，就看不到有什么建树。

耀邦接着说：要有建树，就要敢闯。我个人有什么？就是敢闯。小平同志是了解我的。这次要我出来工作，我看至少有三条：第一，我虽然没有他那样高的战略眼光，但是他提出的主张，我能理解，能够跟得上；第二，我能够进行各项组织工作，实现他的战略布局；第三，他知道我这个人是正派的，不搞歪门邪道。

耀邦同志回忆起过去，说毛主席他老人家也是了解我的，后来对我不满意，生我的气。我在解

放后团中央那一段工作，抓的面太宽，经常发急，没有搞出什么特殊的建树，是我自己不争气。罗（瑞卿）最了解我，他很早就说我是有希望的，贺老总也了解我，甚至林彪也还是看重我的。比较起来，总理不大了解我，先念也不大了解我。谈到罗瑞卿，耀邦激动地说，罗是水平很高的，能力很强的。如果罗不死，这次很可能是政治局常委。有罗、赵，我们三个人合作，事情更好做。

接着我们两人评论起耀邦去年一年的几次讲话。耀邦说，去年一年，从全国宣传工作会议这一篇算起，再有理论务虚会的两篇，新闻工作会议一篇，上访工作会议上一篇，农村宣传工作会议一篇，再加上中纪委会上一篇，大块文章，大概有九篇，小的讲话不算。中纪委那一篇我讲了中纪委的任务首先要抓政治路线，看你是执行还是违反党的政治路线，这一点是很重要的。生产目的那一篇，讲平衡，还是讲得好的，那是帮助修改加上的。这九篇总有十几万字，其他不算。今年恐怕也要有四、五篇，当了总书记，免不了要讲几篇的。

耀邦说，我的东西，总要讲一点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方法论。要抓住现实存在的问题，把它集中起来，讲点方法论，才能讲得深。

耀邦认为当年多少篇讲话，比较起来，剧本创作座谈会这一篇水平最高。耀邦说，这一篇我是用了功夫的，不仅是对文艺，对其他方面也是有影响的，可以发得宽一些，文艺工作者可以人手一篇。这篇东西讲了怎样看待自己，怎样看待阴暗面，也讲了马克思基本观点，方法论。比如讲了思想认识的规律由统一到不统一，又到统一；一致到不一致，又到一致。可以就这些观点写点文章。耀邦说，这篇东西文风也是好的，一气呵成，没有老套。讲起文风，还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好。你看《论持久战》、《实践论》写得多么好呀！又深刻，又生动，简直增减一个字都不行。可惜，到晚年就差了，包括《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著作，文风也比不上过去，真有些"江郎才尽"了。鲁迅的文风也好，每一个字都是用了功夫的。

这次五中全会公报，包括去年邓、叶几篇讲话，政治性、思想性、科学性都是好的，但是不够生动。乔木同志现在搞的东西，文风也不如过去，他很注意科学性、逻辑性，但生动性不够。

社会科学院出那么多刊物，我很少看，或者不看，没有讲出什么东西。我看，说理论，还是数《理论动态》。抓住当前重要问题，理论联系实际。

现在看，19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篇文章，水平并不高。真正有分量的是第二篇《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是罗瑞卿亲自抓的，是吴江他们起草的，罗改了几遍，给我打过三次电话。当时我的处境有困难，罗挺身而出，这篇文章的影响大。可是吴江他们后来的文章也差了。

耀邦同志说，过去公安部的东西写的比较好，上中。特点是比较稳定，有些部门也有好东西，但不稳定，有时好，有时又下去了。公安部东西比较稳定，当然也是一分为二，也有些神秘主义。接着又联系到我说，罗同我说过多次，说你是能写东西的，为什么现在不写了？我看你是有思想水平的，有能力的，但是没有搞出应有的成果来，我看你的闯劲不够。

最后，我们的话题又转到五中全会。我说五中全会是得人心的，中央书记处人选是符合众望的，大家对这个领导班子寄以很大希望。要密切联系群众，要树立新的一代领袖的新风。耀邦说，说不上什么领袖。我说这个领袖是复数的。耀邦说，我

人民日报
RENMIN RIBAO

十一届五中全会号召全党同志、同全国人民在一起，紧密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万众一心，紧张努力，在各条战线上创造出优异的成绩，来迎接党的十二大的召开。

坚持党的领导　改善党的领导　提高党的战斗力

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胜利闭幕

们就是搞集体领导，不搞划圈圈，有事大家商量，就地解决。

我告诉他，有人议论，胡耀邦当了政治局委员，不搬房子，不搞特殊。这次当了总书记，会不会搬房子，搞特殊呢？耀邦说，我一辈子不搬房子，不搞那些庸俗的东西。我说，不搬房子，当然好，一辈子恐怕难。耀邦说，至少五年不搬家。我说，安全还是要注意。他说，极个别的坏人要打黑枪当然是可能的，但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脱离大多数群众，不为广大人民群众办好事。

耀邦最后说，今年工作十分紧张，要分秒必争，还要讲究工作艺术，才能把事情办好。

去世前的一次谈心

1989 年 3 月 18 日晚上，李昭同志来电话，说耀邦同志已回到北京。第二天上午，我和史洛明去胡寓。李昭同志接待我们，谈他们去年 12 月去广西、湖南，逗留了四个月。两人休息都有成绩，胡得过一次肺炎，也康复了。正谈着，胡耀邦进来，畅谈了一个小时，还照了相。

耀邦同志谈到广西缺粮，人民生活很困难。王恩茂同志也到了广西，谈到他去了一趟河南宣化店，这里是 1947 年 359 旅的驻地。旧地重游，四十二年，一点未变。耀邦对一点未变不大相信。四十多年了，总有一点变化吧。恩茂同志肯定地说，确实一点都没有变。要谈变，只是过去他住过的一家院子，如今已挤进好几户人家。过去的鄂豫皖老根据地，群众温饱问题没有解决，人民生活仍然贫困。当然，湖北有的地区，如荆州地区，比较富裕。谈起这种情况，耀邦同志的心情比较沉重，虽然很着急，又没有办法。

谈着谈着，耀邦的情绪开朗了。他说，有两个没有想到，一个是 1980 年，想不到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自己走上了党主席（后来是总书记）的职位。当时就表示，虽然担任了党的最高职位，但是胡耀邦还是胡耀邦，并没有因为职位高了，本事就大了。第二个意想不到是，1987 年初，下台以后，反而威信未减，影响更大了。要重视这两个意想不到，度好晚年。不过问工作，到下面，不要省的领导汇报工作，作为同志，谈谈也就很好了。

我对耀邦说，你当总书记时，也不是没有缺点和失误，党内外对你也不是没有意见。但是，让你下台的方式很不正常，反而使党内外，以至国外，对你的同情和支持更高了。我认为 1987 年你下台，最大的损失不是你胡耀邦本人，而是损害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树立起来的党的形象，党并不如领导人再三表示的，在“文革”之后，党的生活，特别是领导层的政治生活已经正常了，倒是使党内外沉重地看到，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的阴影似乎又重现了。耀邦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心境一直是振奋的。多次谈到 1958 年毛主席提出的党内那种良好的政治局面，终于可以实现了。他谈得多么真诚、多么深信不疑。可是严酷的历史，再次教训了他。正如杨西光同志说的，耀邦太天真了。

交谈中，我深为耀邦的心境担忧。他这个人是把全部生命都奉献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他时刻关心着国家的发展和人民的福利。他看到的问题，特别是关系群众疾苦的事，不让他表示态度，无动于衷，是绝对不可能的。他是一个有感即发的人，如今他却有感不能说，有话不便说，闷在心里。这对于耀邦，再也没有什么让他更难受的了。我看到他的神情之忧，知道他的心境之苦，又无言以对。只好劝他放宽些，保重身体。过去再忙，也不放松读书，今后可以更安静地读书了。我以前给他送过他喜欢看的书，以后会继续给他送去。耀邦笑着点点头。也许是长途旅行归来，神情显得有些困乏。在告辞之前，我忽然想起，同耀邦照了一张像。万万想不到这竟是一张“绝照”，是我同耀邦的最后一张照片，距耀邦逝世仅 28 天。

1989 年 4 月 15 日，耀邦去世。据说是由于心脏血管破裂致死，真可谓是心碎了。耀邦逝世前四天，我去医院探望。李昭同志悄悄告诉我，耀邦刚睡着了。我没有进病房见他一面，真是又后悔，又悲痛。继罗瑞卿同志去世之后，我又失去了一位相知很深，从心里感到极其亲近，最为敬爱的良师、益友。耀邦不是完人，但却实实在在是一位好人，一个极其真实、极其善良、心地透亮、大公无私的人。他没有死，他活在我的心里。

后来知道耀邦的墓修建在共青城，这可能不是耀邦生前所交待的，但应该是耀邦所能同意的。我认为这是最佳的安排。

（作者系罗瑞卿秘书，原中国法学会会长）

（责任编辑　赵友慈）

我了解的赫鲁晓夫权力斗争

● 阎明复 朱瑞真

1957 年 6 月，原苏共中央主席团里的元老派发起了一场反对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的突然袭击，要求撤销赫氏的一切领导职务。在旷日持久的激烈的争论中，主席团不少成员站到元老派一边，形成了多数。但赫氏和支持赫氏的主席团成员坚决反抗，力主主席团无权罢免第一书记，要求立即召开中央全会。元老派极力抵制召开全会。在由国防部和克格勃连夜派飞机接到莫斯科的中央委员的强烈要求下，元老派被迫同意召开了中央全会，赫氏化险为夷，转败为胜，打败了元老派，宣布他们是反党集团。为了取得毛主席和中共中央的支持，赫氏特别派了米高扬来华，面见主席，通报整个事件的经过。毛主席支持赫氏并表示要去苏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纪念活动、出席国际共运会议。

我担任了翻译，目睹了会见的全过程，现据回忆写出，以飨读者。

一、苏共领导层的矛盾和分歧

斯大林逝世后，在苏共中央主席团内部，长期存在着以赫鲁晓夫、布尔加宁、米高扬为一方，和以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为另一方的矛盾和斗争。前一派倾向于改革，后一派比较保守。他们之间分歧的领域很广泛，诸如在揭发和批判斯大林的个人迷信问题上，在开垦荒地、工业和建筑业的改革、轻重工业在国民经济中比重问题上，在签订《奥地利国家条约》、改善同南斯拉夫的关系、缓和同西方国家关系问题上都有严重的分歧。

到 1957 年上半年，这两派有些分化，布尔加宁逐步转移到马林科夫一派方面，伏罗希洛夫、别尔乌辛、萨布罗夫也支持马林科夫这一派的观点。这样，在苏共中央主席团内部逐渐形成了一个反赫鲁晓夫的联盟，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人一直在寻找机会发动突然袭击，利用主席团内的多数优势把赫鲁晓夫赶下台。1957 年 6 月机会来了，他们在赫鲁晓夫 6 月 5 日出国访问芬兰期间，制定了撤销赫鲁晓夫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计划。

赫鲁晓夫于 6 月 14 日从芬兰返回莫斯科，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等人照常去车站迎接，并告诉赫鲁晓夫，拟于 18 日召开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讨论关于举行列宁格勒建城 250 周年庆典的问题。赫鲁晓夫对此没有产生任何怀疑。

二、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的激烈斗争

6 月 18 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在克里姆林宫开始举行。会议由布尔加宁主持，但并没有按他们原来所说的议程进行，而是一开始就对赫鲁晓夫的内外政策进行批判。马林科夫第一个发言，他指责赫鲁晓夫推行的农业政策破坏国家工业化，大肆推行对他本人的个人迷信，破坏集体领导原则，等等。接着，马林科夫提议审查 赫鲁晓夫的行为”，从而把中央主席团会议引向了专门讨论赫鲁晓夫的问题。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等先后都作了长篇发言，他们抨击赫鲁晓夫实行的政策是“ 托洛茨基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是 唯意志论”和一意孤行，还说赫鲁晓夫对斯大林错误的揭露，动摇了党的地位，等等。

在 6 月 19 日的会议上又是马林科夫第一个

1957 年 11 月莫斯科会议期间毛泽东同代表团工作人员合影。前排左二 毛泽东，左一为保健护士，左三为波兰文翻译，左四为赵仲元 ;后排左起 :陈道生、朱瑞真、阎明复、医生

发言，他明确提出撤销赫鲁晓夫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职务的问题。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别尔乌辛、布尔加宁、萨布罗夫等六名主席团委员都发言支持马林科夫的意见。赫鲁晓夫断然拒绝马林科夫等人的指责，顽强地为自己辩护。主席团委员苏斯洛夫、基里琴科和米高扬明确表示支持赫鲁晓夫。主席团候补委员朱可夫、什维尔尼克，勃列日涅夫、福尔采娃对马林科夫等人的发言进行了反击，但他们没有表决权。

在 6 月 20 日的会议上，马林科夫等决定依仗多数优势强迫赫鲁晓夫就范，强行表决。赫鲁晓夫及其支持者坚决反对，他们的理由是 :第一书记是由中央委员会，而不是由主席团选举的，因此主席团无权撤换第一书记，此事必需通过中央全会讨论决定。

马林科夫一派的计划是撤掉赫鲁晓夫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由莫洛托夫取而代之，马林科夫重新出任部长会议主席，撤掉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谢罗夫，由布尔加宁担任国防部长兼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此外，还打算将苏斯洛夫调离党中央机关，出任政府的文化部长。

在 6 月 20 日的会议上，马林科夫等人原本打算通过表决来撤销赫鲁晓夫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但现在已不可能。他们当即改变了策略手法，即不再提撤销赫鲁晓夫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职务，而改提取消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职务的设置，如同 1953 年 3 月斯大林逝世至 8 月期间那样。也有人建议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工作由主席团委员轮流主持，或者设立第一书记，让他只负责苏共中央的日常工作。

在苏共中央主席团内激烈争论的三天过程中，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福尔采娃、勃列日涅夫同国防部长朱可夫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谢罗夫相配合，联络了在莫斯科的以及全国各地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并用军队和安全部门的飞机把他们接到了莫斯科。这些人大部分都是支持赫鲁晓夫的。

6 月 21 日，主席团会议继续开会。在双方激烈争吵的同时，集中到莫斯科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们纷纷向中央主席团致电或写信，强烈要求立即召开中央全会，讨论事关重大的中央领导问题。接着，他们派出第一批 53 名中央委员来到中央主席团开会会场，聚集在会议室门外，要求接见，但遭拒绝。之后，他们便选出由 20 人组成的代表团，伊格纳托夫、谢罗夫等率领他们闯入主席团会议室。代表们表示 :我们也知道你们在讨论关于中央委员会的领导和书记处的领导问题。对我们全党来说这样重要的问题，是不能撇开中央委员会的成员的。为此，我们作为苏共中央委员，请求立即召开中央全会，并把主席团讨论的问题拿到中央全会上来讨论。我们，中央委员们，不能对决定我党领导人选的问题袖手旁观。这时主席团指派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出来接见中央委员的代表，表示不能开中央全会。但中央委员的代表谢罗夫等坚持一定要开中央全会。此时，伏罗希洛夫大骂谢罗夫，而谢罗夫也对骂起来，并威胁说，如果主席团反对召开中央全会，他们将撇开主席团自行召开中央全会。这时，又有第二批 87 名中央委员来到会场声援。由于聚集的中央委员越来越多，他们施加的压力也越来越大，马林科

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人不得不做出让步，同意举行中央全会。

三、全会上形势突变，赫派大获全胜

6 月 22 日下午，苏共中央六月全会由赫鲁晓夫主持开幕。全会自 6 月 22 日至 29 日历时 8 天，共举行 12 次全体会议。

全会开幕后，首先听取苏斯洛夫代表中央主席团向全会作关于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情况通报。接着开始大会发言。朱可夫元帅第一个发言，对马林科夫等人进行揭发批判。在揭发批判过程中，穿插安排"反党"集团成员和那些不同程度陷入"反党"集团而犯了错误的人逐个发言作检查。

全会上的发言，内容涉及方方面面，十分广泛。其中，不仅涉及斯大林逝世后苏联的重大国内外政策和领导人之间在这些政策上的分歧，而且也反映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苏联农业生产严重滞后和城乡人民生活困难的一些真实侧面；在全会上披露了三十年代、四十年代直至五十年代初斯大林逝世前苏联历次肃反扩大化所造成的党政军以及知识界多起重大冤假错案的真情和实际受害人数；列举了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对此应负的个人责任，以及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前后对这些冤假错案的平反处理情况。此外，中央委员们的发言还涉及到苏联同西方国家的关系，同某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苏共同某些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关系，以及苏共领导人之间的关系，等等。

"反党"集团的三名主要成员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都先后两次发言，检讨自己的错误。大会发言结束后，会议主持人苏斯洛夫一一宣读了他们三人向党中央委员会递交的申明书。他们都表示承认党的政策是正确的，都承认犯了宗派主义错误。马林科夫和卡冈诺维奇二人承认了反党，请求给他们以继续工作的赎过机会。被定性为"反党集团"幕后思想家的莫洛托夫，只承认他"要求撤销赫鲁晓夫第一书记职务是个政治性错误"，但并不承认反党，认为他们的活动"并未超出主席团个别委员之间交谈的范围"，不是搞什么阴谋。当中央全会正式表决《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议》时，中央委员们一致通过，莫洛托夫一人弃权。中央全会的决议宣布将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从中央主席团和中央委员会中清除出去。在决议中，对属于陷入"反党集团"而犯了错误的布尔加宁、别尔乌辛、萨布罗夫，以及被定性为投靠"反党集团"、被怀疑为"反党集团"起草决议和提供理论根据的谢皮洛夫，则分别给予了党内处分：对布尔加宁给予严重警告处分，将别尔乌辛从中央主席团委员降为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将萨布罗夫从中央主席团中清除出去；将谢皮洛夫从中央主席团和中央委员会中清除出去。

全会一致赞同赫鲁晓夫留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并扩充和调整了中央主席团和中央书记处，增补了中央委员。全会于6 月 29 日闭幕。

这次中央全会以赫鲁晓夫的完全胜利而告结束。他不但摆脱了困境，转危为安，而且把反对自己的人从中央领导机构中清除了出去。赫鲁晓夫虽然把马林科夫等人打成了反党分子，但在对他们处理时，却没有沿袭斯大林时代的做法，将他们置于死地。全会结束后不久，莫洛托夫就被任命为苏联驻蒙古大使，马林科夫被任命为哈萨克一个水电站站长，而卡冈诺维奇则被派到乌拉尔一个著名的大企业当经理。

四、"老同志犯错误就算反党？"

7 月 2 日上午刚上班，我们中办翻译组接到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二秘顾大寿打来的电话，说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阿布拉希莫夫受苏共中央委托，要求紧急会见毛泽东，有重要事情转告。我们立即报告了中办主任杨尚昆办公室的值班秘书。不久，秘书通知我们说，毛主席不在北京，委托刘少奇会见他，地点在北京中南海刘少奇官邸。我们遵照尚昆主任的指示通知了苏联大使舘。

刘少奇会见苏联临时代办时，在座的有彭德怀、王稼祥、杨尚昆等，我担任翻译。阿布拉希莫夫说，赫鲁晓夫要他向毛泽东通报苏共中央全会《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议》。他介绍了马林科夫等人的"反党活动"。当时在座的中央领导人表示，对马林科夫、莫洛托夫这样的老同志反党难以理解，对他们的错误能否采取别的办法处理？他们说，中共有一个

王明，他犯的教条主义错误给我们党带来了极大的损失，但毛泽东在中共七大还是说服代表们选举他为中共中央委员。最后，刘少奇说，将把苏共中央的通报报告毛泽东同志。阿布拉希莫夫把六月全会《决议》（俄文本）交给了刘少奇。会见后我们连夜把《决议》译成中文，连同会见记录交给了尚昆办公室。尚昆审阅后批给中办机要室印发中央领导同志。

7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了苏共中央全会《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议》。7月5日，即苏共中央全会的决议正式公布之后的第三天，中共中央致电苏共中央说：感谢你们把苏共中央在6月22日至29日举行的全体会议所作出的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议通报我们。我们相信，苏共中央全会所一致通过的这一决议，将有助于苏联共产党的进一步团结和巩固。中国共产党将坚定不渝地和苏联共产党亲密地团结在一起，为继续加强中苏两国的伟大的兄弟同盟，为争取世界持久和平，为争取马克思列宁主义事业的胜利而共同奋斗。

五、米高扬秘密来华，面见毛泽东

7月2日在刘少奇接见苏联临时代办时，几位中共中央领导人对苏共中央全会《决议》的态度，显然引起了赫鲁晓夫的不安。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们当时站在一只脚上，中国的声音很重要。"于是，赫鲁晓夫紧急派遣正在黑海休假的米高扬赶赴中国，面见毛泽东，争取毛的理解和支持。7月3日下午，杨尚昆主任通知我，米高扬后天来华，去杭州见毛主席，要我明天同他一起去杭州，毛主席会见时要我担任翻译。次日清晨我到西郊机场，随尚昆主任乘专机赴杭州。7月5日晚7时，毛主席在杭州汪庄会见了米高扬和随行的阿布拉希莫夫一行。在座的有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王稼祥、杨尚昆、李维汉、胡乔木，由我担任翻译，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担任记录。

米高扬通报了苏共中央六月全会的情况，详细介绍了"反党集团"与赫鲁晓夫的分歧。他说，分歧主要分两类：一类是他们拒绝接受新措施。在内政方面，他们反对改变过去斯大林时期中央权力过于集中的状况，反对民主化；经济上反对改组工业和建筑业的管理，反对在各经济区建立经济委员会，坚持旧的管理方法；反对赫鲁晓夫提出的在牛奶、肉类的生产上超过美国人的口号，认为加速牛奶、肉类的生产将会把整个生产打乱，吃亏的是重工业；在对外政策方面，他们反对签订《奥地利国家条约》（即对奥和约），反对苏联从奥地利撤军，反对改善同芬兰、日本、西德等国的关系；在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中坚持搞大国沙文主义，反对改善同南斯拉夫的关系，反对援助匈牙利、东德，反对向波兰赔偿因向苏联提供的煤价格过低而蒙受的经济损失，等等。另一类分歧是对过去工作的估价问题。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等人在斯大林大批屠杀干部的事情上都负有很大的责任，对许多干部的枪杀命令是由他们直接签署的，因此他们坚持认为枪杀是需要的，对革命来说是必要的。

米高扬在谈到处理"反党集团"事件的过程时说："反党集团"在旧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中本来就占少数，他们反对赫鲁晓夫提出的扩大主席团成员的建议，反对吸收一些较年轻的人参加主席团；他们认为与其在新的17人主席团中充当少数派，不如在原来的11人主席团中充当少数派，他们利用赫鲁晓夫出国访问的机会，暗中策划要搞掉赫鲁晓夫，给赫鲁晓夫扣上"右派"、"托洛茨基派"等政治帽子。主席团会议很激烈地争论了四天，6月21日部分中央委员到克里姆林宫来要求召开中央全会。6月22日，苏共中央全会开始举行。在全会上，苏斯洛夫把主席团会议的情况向大家通报后，会议立即转入对"反党集团"的揭发批判。在全会上，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等人发言作了检讨，萨布罗夫在会上揭发了他们的宗派活动，马林科夫等人被击败，并且被从中央主席团和中央委员会中清除出去。

六、毛主席表示支持苏共中央全会的决议

毛泽东在听取米高扬的介绍时插话说，这几个人中间，莫洛托夫给我的印象不好，非常顽固。他说，对于苏联在内政、外交上的措施，我们是满意的。他还说，对莫洛托夫我们比较清楚，他是守

旧的。他们的小集团企图更换领导，这是不利的。这时候应该加强领导。这不只是苏联一个国家的问题。过去我们替你们担心，现在这样解决了很好。这一次，开头是他们进攻，你们防御，结果你们打了胜仗。毛泽东还说，你们已经建成社会主义，已经没有资产阶级了，但是也不是天下太平无事了。要准备有事。进步和落后的斗争，有时会很严重。你们巩固，我们就好了。

毛泽东接着说，我们党内原来也有些同志们想，是不是把他们留在中央委员会里更好一些？如果再闹事，再办。现在看来你们是不得不这样决定的。毛泽东最后说，这件事在我们党内有些震动。我们已经采取措施。昨天我们已决定支持你们的决议，今天我们中央发了一个电报给你们中央，已经广播了。人们不了解内情，许多人不相信他们是反党集团，还要说服。他们（指莫洛托夫等）是怕两条，一条是主席团增加人，一条是怕追究肃反责任。还有一个思想问题，旧的观点不愿有所改变，这是他们犯错误的基础。

会见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凌晨3点左右，最后，毛泽东再次对苏联客人说，中共中央政治局已决定，支持苏共中央这个《决议》。接着，他还让我把政治局的决定翻译给米高扬听。在告别时，毛泽东表示，他接受赫鲁晓夫的邀请，将于11月初去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活动和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米高扬听了这番话，十分满意，并表示感谢。从他表情上看得出有些激动，似乎心里的千斤重担一下子都卸了下来。

这次会见是在杭州汪庄毛泽东住地靠湖边的一间书房里进行的，书房不大，里面既没有空调，也没有电扇，狭小的空间热得使人透不过气来。大家一边听一边擦汗，一边扇扇子。离开北京的那天，我带了一把黑色的新扇子。我一边扇，一边翻译。米高扬讲话的时候，我集中精力记录，就把自己的扇子放在桌面上，翻译完就拿起扇子扇几下。毛泽东用的也是一把黑扇子。他扇几下，放下来停停，过会儿拿起来又扇，没在意把我的扇子拿去了。我也随手拿起一把，回家一看，是把旧扇子。在扇柄的内侧有“毛泽东”三个字，看上去是他身边工作人员从报纸上剪下来贴在上面的。这时我才知道是主席的扇子，这把扇子到现在还珍藏在家里。

离开汪庄，我陪米高扬回到西子湖畔的别墅。那时已是凌晨三点半了，我看他还是那样兴致勃勃，通宵的会谈并没有使他感到疲劳。根据安排，第二天我就要陪他返回北京。当时，为了保证米高扬专机的安全，空军司令刘亚楼亲自安排飞行计划。他通过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转告我们，徐州地区夏天多雷雨天气，飞机务必要在上午11点以前起飞。我把这一情况告诉了米高扬，请他早点休息，他同意了。

七、米高扬针灸，李志绥造谣

米高扬这次来中国之前，是在黑海边休假。为了争取毛泽东、中共中央的支持，赫鲁晓夫叫他中断休假专程来中国。米高扬在海边被海风吹得后背疼。他问我，在走之前能否请中医给他治治。我向叶子龙讲了，叶子龙建议请浙江人民医院的医生给他针灸。第二天，11时左右，我和李志绥医生、浙医的孙振环医生来到米高扬的住所，他还在睡觉。大家只好等着。

下午1点，米高扬起来，吃过饭后来到客厅。李志绥问了问米高扬背部疼痛情况，孙振环医生给他扎了针，我当的翻译，一共没谈几句话。这时快两点了，我陪米高扬急急忙忙去了机场。

这里还要提一提，二十多年后李志绥在他到美国后写的一本书里，竟把他陪杭州的孙大夫去给米高扬针灸的事描写成是毛主席派他去见米高扬，向米高扬阐述毛泽东的“核战争的战略思想”！读后我百感交集，没有想到李大夫居然坠落到无中生有的地步！我是当年在场的唯一的懂俄文的见证人，李志绥同米高扬之间一问一答，李问“您背部哪里疼？”，米高扬用手指着后背说“这里、这里”，都是我翻译的。一共没用一二分钟，如此而已，这样一件简单的事，在李志绥的笔下却变成了他受毛泽东之托向米高扬长篇大论地讲述毛泽东的“核战略”！

八、专机遇暴雨，有惊无险

米高扬的专机是伊尔—14，机舱里放了张长条躺椅，中间是小茶几，旁边有几张没有靠背的圆沙发。米高扬睡在躺椅上，我坐在小圆沙发上。起

飞不久，天气就变得很坏。乌云翻滚，扑面而来。飞机颠簸得很厉害，连茶几上的热水瓶和水杯都跳起来。中国的领航员来报告说，刘亚楼司令正在从北京的南苑机场和机组对话。刘亚楼曾在苏联留过学。当我走到驾驶舱时，就听见他流利的俄语大声责怪机组这么晚才起飞。他指挥机组向天边亮的方向飞行，绕过雷雨层。于是，我们的飞机先是向西安方向飞行，然后再往北京方向驶去。

任凭飞机怎样颠簸，米高扬却毫不在乎。他对我说，他完成了这个使命，即使是死，也满足了。当时，我心里想，这老同志有些缺德，你快70岁了，死了是没关系，我才20多岁，也得陪上。

飞机经过艰难的飞行，终于平安到达北京。原定降在南苑机场，因下起了大暴雨，临时改降在西郊机场。杨尚昆主任从南苑赶到西郊机场前来迎接。

米高扬这次访问中国属秘密访问，在顺利完成任务后，他立即返回莫斯科。

九、核援助换支持，废协定以反华

毛主席、中共中央在赫鲁晓夫同“反党集团”的斗争中对他的支持，毛主席明确表示要去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纪念活动、出席国际共运会议，对巩固在同党内重量级的元老派（其中卡冈诺维奇曾是赫氏在乌克兰的顶头上司，一手提拔了他）搏斗中元气大伤的赫鲁晓夫的地位无疑帮助极大。为了换取毛主席更多的持久的支持，赫鲁晓夫不顾军方的反对，决定满足1954年首次访华时毛泽东向他提出的“核援助”的要求，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技术，帮助建立核工厂，并要求苏联有关部门在毛泽东11月访苏前同中方签订正式协定。于是，9月上旬以聂荣臻为首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应邀访苏，同以别尔乌辛为首的苏联代表团举行谈判，历时35天，于10月15日在莫斯科签订了关于苏联在火箭、导弹、原子弹方面援助中国的《国际新技术协定》。1958、59年期间，该协定的一些条款得到落实。在此期间，中苏两党的分歧也日益加剧，赫鲁晓夫决定中止对中国的核援助。他在回忆录中写到：“当时原子弹样品已经装车准备启程运往中国，我经反复考虑决定停运。”1959年6月20日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安东诺夫向陈毅（届时中央领导同志大都上庐山参加会议，根据中央的安排陈毅留在北京处理日常工作）提交了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信，声称出于对国际形势的考虑，原子弹样品推迟两年再提供。我作为翻译见证了这一转折时刻。当时庐山上正在召开著名的中央会议。赫鲁晓夫停止提供原子弹样品的决定，后来被视为是“配合彭德怀等人反对毛主席而施加的压力”。当然，这一无稽之谈早已被历史唾弃。

十、赫鲁晓夫下台

七年后，1964年10月14日深夜，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紧急求见中共中央领导人，通报赫鲁晓夫下台的消息，也是我担任翻译的。当天深夜，11点钟左右，我已入睡。突然，电话响了，原来是苏联大使馆打来的电话，说大使受苏共中央的委托要求会见中共中央领导，有重要事情通报。我当即报告了杨尚昆主任办公室。不久，主任办公室秘书打电话给我，说已决定请中联部伍修权副部长接见，具体事情由我安排。于是，我马上给伍部长打电话报告此事。修权同志说，现在都半夜了，部里的会客室都锁门了，在哪里见他呢？我说，您住所的客厅很合适。伍部长同意了。接着，我又打电话给苏联大使馆，通知他们伍部长将会见大使，以及会见的地点和时间。随后我乘车赶赴中联部。伍部长会见时，契尔沃年科大使说，今天举行的苏共中央全会一致同意接受赫鲁晓夫同志的请求：因年老体弱辞去苏共中央委员、主席团委员、中央第一书记、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选举勃列日涅夫同志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并推荐柯西金同志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大使通报完后，伍部长问道，您还有什么补充吗？大使说，没有了。会见就结束了。据事后披露的消息，赫鲁晓夫被免职同他在苏联内政外交上一系列的重大失误有关，也同他专横粗暴的作风、培植对自己的个人迷信有关。结果落得“众叛亲离”，连他一手扶持的接班人勃列日涅夫、波德哥尔尼等人都成了这次“倒戈”的主要策划者。这次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对赫鲁晓夫的批评同七年前苏共元老派在主席团会议上对他的一些批评，何等的相似呀。

（责任编辑　吴　思）

秦川在老中宣部

·马懋如

秦川同志是我上世纪50年代在中央宣传部工作时的老领导，2003年1月29日去世了。他走得那样匆忙，没留下一句遗言，却给我们留下了很多怀念和崇敬。我想不起他对我有什么说教，在我心目中都是他的身教。

2002年10月13日我和秦川同志最后一次见面。“文革”前在中宣部工作的人，都称那个时期的中宣部为老中宣部。那天，老中宣部的一些同志和他们的子女，两代人相约在中宣部旧址沙滩大院聚会。很多人闻讯而来，有的老同志坐着轮椅，有的拄着拐棍，有的由子女搀扶，二百多人欢聚一处。秦川同志也来了，他已是83岁的高龄老人，还是那样的健谈、健步，很多人围上来和他握手、打招呼。他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受批判，被罢官后就离开了中宣部，40多年过去了，很多人的名字他还记得，很多人也没有忘记他。

如今的沙滩大院，小桥流水，风景如画，不懂过去的人还以为这里原本就是一处供休闲游乐的场地，昔日的“五·四民主广场”已不复存在。故地重游，我陪秦川同志走到老中宣部的办公大楼前，他兴致勃勃地指着楼前的两棵树告诉我，这是用他的稿费买的。1957年中宣部从中南海搬到沙滩办公，有一次秦川同志收到二百多元的稿酬，这是一笔数目不小的钱，当时基层干部月薪仅四五十元。为大院绿化，他把这笔钱交给了人称方老头的花匠处理。方老头购得花木若干种在院内，大楼前栽了两棵小树。如今小树已成大树，枝叶繁茂，郁郁葱葱，为大院增色不少。此事鲜为人知，我也是第一次听他说。秦川不重钱财，他热心公益事业，办好事从不张扬。我提议在树下合影，没有想到这张照片竟成了最后的纪念。

秦川同志这一走，引起我想起了很多的人和事，不仅想起了秦川本人，还想起了老中宣部，想起了上世纪的那个50年代。一位青年朋友帮我找到了秦川同志1998年在《炎黄春秋》上发表的《我眼中的“阎王殿”——回忆文革前的中宣部》一文。重读此文，老中宣部再现眼前，一位位老部长、老处长栩栩如生，秦川同志也在其中。我看到了他的为人，看到了他那宽广的胸怀。建议老中宣部的同志们读一读这篇好文。

1954年，各大行政区撤销，各地干部云集京城。这时，可以说是中宣部人丁兴旺的时期，有延安来的老红军、老八路，有北京解放后新参加工作的知识分子，有来自全国各地富有基层工作经验的同志……真是五湖四海。秦川同志1936年参加革命，他来自西北，原任中共西北局宣传部秘书长，是行政九级的高级干部，调中宣部后先任科学卫生处副处长，后任宣传处处长。

老中宣部除部、处两级领导人有职称外，其他同志均无职称和头衔，一律是“干事”。有“大干事”、“小干事”，有人干大事、有人干小事，有分工不同，无贵贱之差，大家一律平等，各尽所能为人民干事情。不少同志是抗日战争中的老革命，曾任过要职，在部里都是普通一兵，住在沙滩老北京大学七八平米一间的学生宿舍里，大

2002 年 10 月 13 日摄于中宣部旧址（沙滩）
右起：王里、戴临风、秦川、马懋如、杜惠、王敬之

他让人说话，同意的意见他倾听，不同意的他笑一笑，或扭头走人，他的身影如今还在记忆中。我这个小“干事”在他面前也可以没大没小，说三道四。他“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他不当面训人，更不“秋后算账”。他平易近人、平等对人、宽以待人。

秦川领导宣传处工作时，不多开会，不开长会，他不说官话，不说套话。我给处务会议记录，这工作很好做。开会之始，无冗长的开场白，会议结束，无重复的总结报告，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他经常有事就把有关同志叫到一起，碰碰头，磋商一下，大家分头去干。那时，同志之间、上下之间都很默契，画龙点睛，一说就明白。

家叫这种小屋“鸽子笼”。我们宣传处资历深、级别高、经验丰富的前辈，有二十来位，他们不重名位，工作兢兢业业。我是处里最小的“干事”，是解放战争时期在学生运动中入党的中学生，年龄小，资历浅，是革命队伍里的晚辈，大家叫我“小马”。“小马”已成我的别名，如今我也年过古稀，老同志还是叫我“小马”，倍感亲切。

部、处两级领导人虽有职称，却无人称他们“长”，上至部长陆定一，下至炊事员、清洁工，一律以“同志”相称。定一同志、周扬同志、立群同志……如今老中宣部的人相见，依然互称“同志”，党的老传统没变。对秦川同志无人称“长”，他也没有“长”的架子。记得有一次他带几个同志到外地调查，随行中有一位，年龄不大，已是一头银发，说话有板有眼，颇有首长之风，被当地干部误认为是带队人秦处长，当上宾相迎，真的秦处长被冷落一旁。秦川毫不在意，拎着一个小皮箱走在人们之中。我曾随他出差天津，无送往迎来，无接风洗尘，住市委机关招待所，在食堂吃饭。一经到达，立即着手工作，不游山玩水，不吃请受礼。工作结束，他请我们吃“狗不理”包子，逛了逛劝业场，坐火车回京，一路上谈笑风生。

在秦川同志手下工作，感到舒畅，没有顾虑。

秦川心里总是装着工农大众，他经常口不离“五亿”（指工农兵）。他极重调查研究，常带处内同志深入工厂、农村，了解民情，反映民意。记得他曾去四川、福建、江西、江苏、湖北、河北、陕西、内蒙、上海、天津等地调查。每到一地都直接下到基层，和工人、农民对话。和他同去的同志还记得，他在四川桂湖公社一呆就是 40 多天，整整劳动了二十多天，农民视他为知心朋友，同他无话不说，取得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他在上海江南造船厂和工人促膝谈心，一户户调查，了解到三十多个工人的家史。他很受工人爱戴，“文革”中不少老工人站出来保他。他给部里上送了不少有分量的调查报告，给领导及时提供了信息。

1958 年，“共产风”、“浮夸风”等“五风”很盛，难得听到基层真实的声音，为了解农村实情，秦川不仅亲自下乡调查，还派处里的同志到一些冒尖的地区或回自己家乡去调查。当时秦川同志和机关党委副书记袁靳同志等去了四川农村，发现“五风”严重，农民缺粮等问题，写了

《新都调查》和《四川来信》如实向部领导反映。他在《四川来信》中还提出立“公社法”的建议。20世纪50年代他就有了“依法治国”的思想，难能可贵。副处长张军带人去了安徽、湖北等地农村，行政十二级的大干事马子明同志奉命回河南老家探亲、访友。他们都汇报了农村的实情，反“右倾”时都受到批判。

秦川同志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他表里如一，实事求是。1959年6月，他参加内蒙古自治区宣传工作会议，会上，他从农村实际出发，直言批评“五风”，批评“大跃进”，反映了群众的意见。不料就此遭到灭顶之灾，在反“右倾”运动中，被重点批判。他的《内蒙讲话》、《四川来信》以及他和袁斬联合写的《新都调查》成了批判的靶子，上纲上线为“革命失败论”、“和彭德怀相呼应”……他被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受到撤职、下放劳动、调离中宣部等不公正的对待。当时受到批判的共九位同志，被称为“九条大鲨鱼”(这一提法出自批判会和大字报)。“鲨鱼”是要吃人的，顾名思义，好不吓人!秦川同志是为首的一条最大的“鲨鱼”，我们宣传处张军、马子明、戴临风也成了“大鲨鱼”。九位同志都是因为说了真话，反映了民意。(九位同志以后都得到了平反)

反“右倾”运动结束，1960年初，九位同志下放安徽来安县农村劳动。此去共28人，分赴两个公社，我也去了。秦川等13人到半塔公社，张军和我们共14人到雷官公社，王里带队，他在县里。我们青年人主要是劳动锻炼，与九位同志处境不同，他们是带“罪”之人，属惩罚性质。九位同志不怕苦，不怕累，毫无怨言，处处是我们的表率。不久，发现“五风”的恶果在雷官公社很突出，农民吃不饱、浮肿病、讨饭、外逃、饿死人等等；半塔是老区，比较好。在半塔的老同志听到消息，和雷官的老同志一样，对此极为关怀，秦川同志更是心直口快，态度鲜明。在老同志们的提议、指导和带领下，冲破重重封锁，挨户调查，取得了可靠的数据。当时反“右倾”刚过，人们心有余悸。秦川、张军等老同志心中全无自己，只有人民，他们不顾头上“右倾”帽子的重压，不考虑个人得失，坚决主张向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央如实汇报，张军同志激动地说，豁出去开除党籍也要上报。他们急农民之所急，提议立即和当地党政领导摊牌，要求开仓放粮，救济饥民。当时雷官公社有的村已断炊，形势逼人，救济粮尚未下达，为了应急，张军等同志大胆提议，并亲自参加说服当地干部杀了公有经济中集体喂养的鹅。农民扶老携幼、热泪盈眶领鹅肉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

我耳闻、目睹了老一辈的果断、无私、智慧，由衷地敬佩。他们是真共产党人，真马列主义者。

在“文革”的风口浪尖上，秦川同志不畏艰险。记得“八大”前有一年，中宣部代中央起草的国庆节宣传口号中，没有写进“毛主席万岁”这一口号(中央签发时加上了)，当时中央和部没有追究；“文革”中成了中宣部反毛主席的一大罪状。听外调来人说，追查时，秦川承认是他干的；批斗时，他向毛主席像鞠躬请“罪”，当时我为他捏了一把汗。

我认为，此事不应由秦川同志或其他任何个人承担，这件事的出现是有背景的，中央和部未追究是有原因的，毛主席对不要搞个人崇拜、不要突出个人有过明确批示。据我所知，历年国庆节口号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宣传处起草，经部领导审核，部长办公会议集体讨论通过后报送中央。处内此项工作由副处长王宗一同志主管，他派处内同志执笔初稿。宗一同志来部早，他办事严谨，很受部领导器重，他主管的工作秦川同志一般不大过问。“文革”初，几位部领导已蒙冤坐牢，宗一同志已被迫害致死。秦川同志高风亮节，他不上推下卸，一人承担，自己受难，在当时的形势下，这一大案未殃及他人。若干年后，我问他，为什么要一人承担？……他笑一笑说，这件事早已过去。一次一位熟人告诉我，秦川同志对她说，小马这个同志不“落井下石”。感谢老领导对我的了解和信任，实话实说，秦川同志是不“落井下石”的典范。

秦川同志晚年，不改初衷。他实事求是，不看风、不跟风、不人云亦云；他头脑清醒，远见卓识，无私无畏。一次，闲谈中他对我说，他这一生经历了“五不怕”(即不怕杀头、坐牢、开除、罢官、离婚)。我意识到，这是他对自己一生的总结，也是他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秦川同志永在，“五不怕”精神永存!

(责任编辑　赵友慈)

刘伯承检讨前后的掌声

● 金 凤

1949 年 9 月，北平召开各界代表参加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简称新政协），这是中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人民日报》抽调了大批记者、编辑，访问了几十位政协代表，在版面上作了大量报道。我有幸访问了第二野战军代表团团长刘伯承同志。我怀着紧张、惶恐的心情在中南海访问这位闻名中外的军事战略家，没有想到刘伯承同志慈祥宽厚地对待我这个刚出茅庐的青年记者，和我纵谈二野在整个解放战争时期的经历，竟谈了整整八个小时，真令我喜出望外。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忠实地记录了刘伯承同志的谈话，写了《四战之地、四战之军》的通讯。发表后不少部队干部以为作者定是一名资深军事记者。其实，当时的我刚刚 21 岁，是《人民日报》最年轻的记者。刘伯承同志认真审阅了这篇通讯，修改了若干地方，使文章更精炼。原稿最后他用毛笔写了"刘伯承阅"几个苍劲有力的字。我将原稿抄了一遍，将抄稿送排字房发排，原稿小心地保留起来。不幸，"文革"浩劫中我被抄家时抄没了。

"文革"后，我写了回忆 1949 年访问刘伯承同志的文章《难忘的一课》，收入《刘伯承纪念文集》。

1986 年 10 月，长年受疾病困扰的刘帅不幸逝世。"刘伯承同志治丧委员会"负责人约我写一篇反映刘帅解放后工作和贡献的文章。我立刻拜访了萧克将军等几十位刘帅的老部下、老将军，得到许多宝贵材料。我用心写了长篇通讯《巍巍功德照人间——记刘伯承同志建国后的卓越贡献和崇高品德》，发表于 1986 年 11 月 4 日《人民日报》。

见报前，文章照例送有关领导同志审查。送审文章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写刘帅创建南京军事学院，呕心沥血地为培养我军高级将领和开展军事科学研究做出的突出贡献。例如杨得志、杨勇、张震、秦基伟等高级将领都曾在军事学院深造，他们的考卷刘帅都亲自看过，有的还做了批语。第二部分的小标题是"中南海的掌声"，反映的是 1958 年 5 月召开的军事扩大会议，一些人精心策划了反对军队工作中所谓"教条主义"、"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展开所谓"两条军事路线斗争"，对病中的刘帅所进行的极不公正的批判。第三部分反映了 1959 年 9 月刘帅被任命为中央军委战略小组组长，刘帅有声有色地为军队现代化和国防建设写下宏丽的篇章。其中包括 1962 年刘帅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对中印自卫反击战，刘帅从战役、战术到后勤保障，深思熟虑地提出一系列宝贵意见，指导他的老部下秦基伟将军统帅部队十几天便打到距印度首都几百公里的地方，还俘虏了印军的一名少将。

送审稿送上去后，不料，第二部分"中南海的掌声"被全部删去。我和治丧委员会同志看到后都很气闷。大家认为刘帅功勋卓著，而又一贯谦逊。他主持军事学院教学，工作兢兢业业，成就也很显著。然而，1958 年他以抱病之身竟横遭批判。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同志、叶帅、徐帅等都为那次所谓"军事工作两条路线斗争"提出明确的反对意见。刘帅那段经历为什么不能公之于众？以便昭示后人，作为历史的经验教训。但服从命令是中国记者的天职，尽管想不通，还得把这一段删去。

文章见报后，刘帅夫人曾托人向笔者表示感谢。我内心感到十分惭愧，认为最重要的一段被删去了。但我小心地保留了没有被删的文章小

样，相信总有一天它会重见天日。

时间又过去将近 20 年。我们已踏进 21 世纪。我认为自己有责任将这被删去的一段史实公之于众。现将文章摘录如下：

中南海的掌声

1958 年春天，中国大地上开始了狂热的 大跃进”浪潮。5 月 25 日，中共八届五中全会补选解放后养病多年，此时忽显露峥嵘的林彪为党中央副主席。紧接着，北京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对军队工作中所谓“ 教条主义”“ 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展开所谓 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

林彪在大会上讲话。他含沙射影，毫无根据地不指名攻击主管军事教育、训练的刘帅和叶帅，说什么‘ 有人一提起学习就想到外国，专学外国的东西，以为只有外国的东西才是好的。这就是迷信，一定要打破迷信观点。”他还耸人听闻地说“：有的单位不把毛主席军事著作作为军事基本教材，只作为参考教材，是不对的。有的单位连参考也没有列上，就更不应该。”林彪指责的这些问题，事实上，解放军所有军事院校包括刘帅主持的南京军事学院都不存在。林彪道听途说，信口雌黄，有意煽动参加会议不明真相的一些高级将领对刘帅的不满。

当然，也有极少数了解刘帅的高层领导挺身而出，为无辜的刘帅辩护。在小组会上，多年和刘帅共事，当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同志为刘帅辩解“：伯承同志工作一贯积极认真，对组织是尊重的。”

陈毅元帅也发言想保护刘帅“：刘帅一向将自己的责任看得很重，组织性强。现在又病了，眼压高。他今年已六十六岁了，又有病，不要搞得太紧张嘛。”

虽然有这样两位重量级人物发言为刘帅缓颊，但绝对尊重和服从党中央命令的刘帅，虽在上海治病、疗养，一接到电话，立即进京。他根本不知道一场 大批判”正等着他。他连秘书也没有带。一下火车，才知道要他检讨‘ 在军事学院教学工作中不重视学习毛主席军事著作，而专门去学古今中外的军事著作和战史……”等等的“ 错误”。他不禁大吃一惊，血压马上升高，头昏眼花，眼压又过高，不得不住进北京医院。他一面治疗，一面打电话让他的主要秘书火速赶到北京。由他口述，让秘书帮他整理 检讨”材料。

虽然毛主席也表示‘ 刘年纪大了，又有病，可以不出席大会作检讨”。但在当时那种 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政治气氛中，组织纪律性很强的刘帅，怎能不抱病出席全体会议呢？

解放后经历过多次政治运动的中国许多党员、干部应该清楚，检讨有小组会、中层会和全体会几种规格。大会检讨是最高规格，说明当事人即被批判者的错误很严重。

试想，从‘ 八一起义”便担任参谋长的刘伯承同志，从 1927 年到 1949 年这 22 年革命战争中，许多高级将领包括林彪都曾是他的部下。刘帅以他军事战略家的杰出战功和崇高品德，赢得全党、全军对他的衷心爱戴。如今，刘帅却要抱着病弱之躯，在一千多位高级将领面前检讨自己犯了‘ 教条主义”和‘ 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 错误”。这样的屈辱，刘帅怎能经受得起？强压委屈的刘帅没有想到，当他颤巍巍地踏进中南海怀仁

刘伯承

堂时，十分奇怪，难以想象的一幕出现了。

1958 年 7 月 10 日，中南海怀仁堂座无虚席。一千多位将军出席大会，一千多双焦灼的眼睛盯着主席台。当执行主席宣布“大会开始”时，会场鸦雀无声，笼罩着肃穆沉重的气氛。

大家看到，全军爱戴的、六十多岁高龄的刘帅，由两名医护人员搀扶着，迈着艰难的步伐，出现在主席台上。猛然，全场一千多位将军（除极少数“打手”外），齐刷刷地起立，举手向刘帅行了军礼。他们向刘帅致敬，接着全场又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许多将军眼里噙着眼泪。刘帅被这样的场面感动了、感动了。他连忙举手回敬军礼，又连着摆手让大家坐下来。主持会议的人也被这场面惊呆了。试问，哪一次检讨会能出现这样的场面，被批判者受到批判者的致敬并热烈鼓掌？这简直太出人意料了。他不知所措，赶快喝令大家坐下来。这一千多位将军的起立和掌声，并非哪个人事先策划，而是大家情不自禁的爆发。这掌声和眼泪饱含着全军将领对功高德重的刘帅衷心的爱戴，也表示他们对刘帅无端遭受批判的无限同情和无奈。

年近古稀又重病在身的刘帅，凭着高度的党性，在大会上一句句念着他准备好的检讨。当他沉重地念完检讨，会场又一次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主持人怒不可遏，但他无法制止这热烈的掌声。在当时的条件下，全军绝大多数高级将领只能用这种奇特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对这种不公正批判的愤怒和对他们敬爱的刘帅的同情。

严于责己、宽以待人是刘帅一生的风格。他的这次检讨尽管是违心的，难免有过苛的自责。难能可贵的是，在当时那种政治高压下，他发言的前半部分，还是实事求是的，尽可能说明事实真相。他用大量事实说明，军事学院的教学以毛主席军事著作为主要的教材，古今中外的军事著作只作为辅助参考，军事学院着重讲的是我军丰富的，多年作战的经验，并非主要讲苏军二战时的“十次打击”。军事学院的教学工作绝不是如林彪所说的那样，不把毛主席著作作为基本教材，只作为参考材料。

当刘帅在两名医护人员搀扶下，迈着艰难的步伐离开主席台时，全场一千多位将军再次起立，再次鼓掌，目送他们敬爱的刘帅慢慢迈出批判的会场。

这次军委扩大会议大反“教条主义”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是一次错误的批判。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中央军委几位主要领导已做了正确的结论。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同志说：“那次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元帅则一针见血地指出林彪在这场风波中所起的恶劣作用。他捏造事实，目的是大树特树毛主席著作的绝对权威。另一位中央军委副主席徐向前元帅说：“建国以后办了许多军事学校，有很大成绩。但后来吃了两个大亏。一个是反正规化吃了亏，一个是反教条吃了亏。”几位老帅的讲话是以胡耀邦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一致的意见，是对那次错误批判所做的平反。

在那次错误批判中被错误处理的大批干部，基本上已平反昭雪。可是，我军建设特别是军事教育和军事训练工作所走的这段大弯路，损失之大，难以估量。

以上是我 1986 年写的悼念刘帅文章被删去的一段内容。如今看来，有什么不可以公之于众？其实，这次长达几个月对全军高级将领的批判，不止刘帅一人，还有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敬爱的朱总司令，有军事奇才之称、当时担任总参谋长的粟裕大将，有当时担任军训部长的萧克将军。

林彪曾在会上恶毒地攻击朱总司令“不是红司令而是黑司令！”粟裕、萧克遭到几十次批判和围攻，而且都被撤销职务，另行分配工作。

在批判刘帅的大会上，当刘帅退场后，一些事先准备好的所谓“积极分子”（即“打手”）站起来不分青红皂白对刘帅“大事讨伐”，南京军事学院一位部长实在听不下去，毅然决然挺身而出为刘帅辩护，说刘帅在军事学院教学工作中把毛主席军事著作列为教学工作的主导红旗，贯穿于全部教学工作之中。但培养我军高级将领理应视野广阔，有更丰富的学识，因此也把古今中外一些军事著作列为辅助教材……谁知他话未说完，竟有一名军级干部冲上去打了他两记耳光。摘下他的少将领章，当场宣布他是“现行反革命”。后来，竟被开除党籍、军籍，押送回乡，劳动改造！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平反。粟裕大将正式平反是 1992 年，而他 1984 年便去世，生时竟未看到正式平反。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军队工作中"反教条主义"的发起者不是别人，竟是大家十分敬重的彭德怀元帅。彭帅为人耿直，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被打成"军事俱乐部反党集团"和"右倾机会主义"的头头，这是极大的冤案。"文革"中更遭迫害致死。但"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彭帅会犯"反教条主义"的错误，说起来有其根源。

彭帅在担任国防部长期间，和总参谋长粟裕大将有矛盾。起因是当时毛主席很欣赏粟裕同志的军事才能，常召见粟裕同志，直接布置一些重要任务。彭总认为不应越过他这位国防部长。粟裕同志其实很无辜。他为人一向谦逊，对老帅们包括彭帅都很尊重。但毛主席要召见他，他难道能推托不去？毛主席布置的任务，他难道能不执行？彭帅却因此心存芥蒂。一次他访问苏联，曾问过是国防部长重要，还是总参谋长重要。对方回答，从指挥军队讲，总参谋长比国防部长更重要。论年龄和资历，彭总自然领先。但论战功和军事才能，全军公认粟裕高出一筹。但粟裕只授大将军衔，彭总授元帅军衔，可见毛主席还是很尊重彭总的。

彭总对粟裕同志有意见，而刘帅却很器重粟裕同志。笔者1949年先后访问刘帅、粟裕，他们两人同住一座平房。笔者曾听刘帅夸奖粟裕同志说："粟裕同志智深勇沉，是我军最优秀的将领之一。"更重要的是，刘帅和粟裕大将在军队建设包括培养我军高级将领的指导思想是一致的。朱总司令也同意他们的意见。他们都认为，培养高级将领应让他们广泛学习古今中外的军事名著，如《孙子兵法》、《尉缭子》、《司马法》等中国古代兵书和俄罗斯名将苏沃洛夫的《致胜科学》、德国军事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等外国著名军事著作，除研究我军丰富的战争经验，也要研究罗马战史、拿破仑战争史、日俄战史、欧洲大战史、二战时期苏联和英美等国的战史等等，不能局限于仅仅学习毛主席几篇军事著作。其实，这是各国军事教育的常识，但却触犯了最高领导的忌讳。

1957年，彭德怀去南京视察军事学院。本来，他并非军事教育专家，军事学院也非他主管的范围。但他不知出于什么考虑，回北京向中央军委、毛主席写了一个报告，说刘伯承主持的军事学院，不突出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军事著作。这帽子很大，立刻被1958年5月刚刚任党中央副主席的林彪接过去了。他想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著作的绝对权威，于是才有了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反对军队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斗争。在斗争中把一身正派、军事修养很高的军事家朱老总、刘帅、粟裕大将等全军最著名的高级将领整倒。从此，全军只有一种声音，那就是毛主席的声音，只学习毛主席著作。这就为接替彭老总担任国防部长的林彪60年代发起的大树、特树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的"左倾"错误路线扫清障碍，为个人迷信铺平道路。也为随后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扫清了军队的障碍，毛泽东在"文革"中便能得心应手地使用军队为他"护航"、"保驾"。这一点，1959年许多参加批判的当事人大概都始料不及。

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保密度很高，地方干部所知甚少。笔者只隐隐约约听到朱总司令、刘帅和粟裕等人受批判了，却不知具体内容。直到1986年访问刘帅的许多部下，许多将军，包括萧克上将，才知道这次不正常批判的情况。

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彭帅在1958年充当了"反对军事教条主义"的急先锋，不料一年后，1959年庐山会议上，便遭到灭顶之灾。难能可贵的是，当时有人动员粟裕同志"揭发"、"批判"彭德怀，粟裕同志一言不发，不肯随风逐浪，在彭总遭难时"落井下石"。保持了古人"以德报怨"的高风亮节。可惜，像他这样的君子实在太少了，大多数人盲目迷信、盲目追随，在风浪中一呼百应。这种恶劣风气的蔓延，也导致"文革"灾难席卷全国时，很少有人能公开抵制。这是一种最惨痛的历史教训。

当然，"文革"毕竟大大提高了人们的识辨能力。八十年代，我听彭真同志说过："文革"也不能说一无"收获"。最大的"收获"，是帮助中国人提高了辨别是非的能力。大多数人对"个人迷信"深恶痛绝。因此，后来，当个别人逆历史潮流而动，还企图搞"个人迷信"时，绝大多数人嗤之以鼻，自然很难"奏效"了。

（作者系人民日报社高级记者）

（责任编辑　吴　思）

忆先师冯友兰

● 何炳棣

冯友兰

编者按:黎勤、李凌《龙云与民主堡垒西南联大》(《炎黄春秋》2005年第四期)一文,曾提到两件文献,一是1940年4月在西南联大教务会议上,全体教授通过一封致教育部的公函;二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可惜无法详引全文。正巧,美国艺文科学院院士(同时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名誉院士、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士)何炳棣先生八十六岁撰就的《读史阅世六十年》一书中的《师友丛忆》有此两文。前文用何院士的话说,乃"措辞说理俱臻至妙"的公"函"。后文则是"文情并茂、事理明通、遣词叙事、融古烁今、铭文形韵、典雅铿锵的'至文'"。现将何院士有关对冯友兰先生之回忆转载于后,以飨读者。

计划撰写本章之初,我已决定请冯友兰(芝生)先师来唱"压轴"。因为本章所有忆及的师友全是联大社团的成员,而最能表彰联大社团精神及其特殊历史意义的莫过冯师所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文。为方便读者参考,我将征引冯师这篇不朽文章以结束本章和全书的"上编"。征引之前,我只讲述个人所独知涉及冯、胡(适)关系的一项轶事,并臆测冯师长期学术行政成功的主要因素,以求避免与大量研究纪念冯师的资料重复。

1947年盛夏,冯先生从宾州大学过访纽约,住在哥大附近一家旅馆。我晚上去看他,长谈中提及朋友见告,杨绍震夫人许亚芬(清华第六级1934年毕业)在斯密丝女校(Smith College)的硕士论文的题目是《1927年以前胡适对中国文化界的影响》。冯先生听了,急不能待、口吃地,以极纯极浓的河南腔说:"这……这……这个题目很……很……很好。因为过了1927,他也就没……没……没得影响啦!"文人相讥,自古已然,相形之下,冯之胡要比胡之冯温和多了。

不少清华内外人士对冯友兰之能长期居清华(战时兼联大)要津二十余年(1928—1952)之久甚为不解。冯系北大出身,与清华学堂毫无关系。北伐成功以后,新被任命为清华校长的罗家伦从燕京大学延揽冯友兰以为"班底"。冯初任秘书长,迅即为文学院长、校务委员会成员,兼

哲学系主任。虽然梅贻琦长校（1931年12月）以前清华屡有学潮，校长迭换，而冯能屹然不撼者，主要由于：一、头脑冷静、析理均衡、明辨是非、考虑周至。二、深通世故，处世和平中庸，而观点进步，学术上有高度安全感，故能与清华资深教授（如叶企孙、吴正之、陈岱孙等）合作无间，以延致第一流学者提高教研水准为共同鹄的。三、国学根底雄厚，文言表达能力特强，初则勇于起草，继则众望所归，经常被推执笔。但凡任何政治或学术会议，意见纷纭，发言者众，愿作综合报告者寡，凡执笔者往往被公认为最干练“得力”之人。冯友兰在清华及联大正一贯是 得力”之人。钱穆追忆联大文学院初设蒙自之际，北大师生开会谓清华事事 有偏”;“如文学院长常由冯芝生连任，何不轮及北大如汤锡予（用彤），岂不堪当上选”。这真书生门户之见，完全不懂三校事务之繁巨与槃槃干才之难得。冯友兰主持清华联大人文行政廿有余年决不是偶然的。

何炳棣

兹举一例以说明冯友兰对联大的重要。缘1939年秋至1940年春夏之交，陈立夫以教育部长的身份曾三度训令联大务须遵守教育部核定应设的课程，统一全国院校教材，举行统一考试等新规定。此项训令的目的当然是加强蒋政权对高等教育及高知的思想统治。联大教务会议以致函联大常委会的方式，抵抗驳斥陈立夫的三度训令。这封措词说理俱臻至妙的公“ 函”的执笔者非冯友兰莫属。由于此文在力争学术自由、反抗思想统制的联大光荣校史上意义的重要，全文征引如下：

西南联合大学教务会议
就教育部课程设置诸问题
呈常委会函

（1940年6月10日）

敬启者，屡承示教育部廿八年十月十二日第25038号、廿八年八月十二日高壹3字第18892号、廿九年五月四日高壹1字第13471号训令，敬悉部中对于大学应设课程以及考核学生成绩方法均有详细规定，其各课程亦须呈部核示。部中重视高等教育，故指示不厌其详，但准此以往则大学将直等于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中一科，同人不敏，窃有未喻。夫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要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岂可刻板文章，勒令从同。世界各著名大学之课程表，未有千篇一律者；即同一课程，各大学所授之内容亦未有一成不变者。唯其如是，所以能推陈出新，而学术乃日臻进步也。如牛津、剑桥即在同一大学之中，其各学院之内容亦大不相同，彼岂不能令其整齐划一，知其不可亦不必也。今教部对于各大学束缚驰骤，有见于齐而无见于畸，此同人所未喻者一也。教部为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大学为最高教育学术机关，教部可视大学研究教学之成绩，以为赏罚殿最。但如何研究教学，则宜予大学以回旋之自由。律以孙中山先生权、能分立之说，则教育部为有权者，大学为有能者，权、能分职，事乃以治。今教育部之设施，将使权能不分，责任不明，此同人所未喻者二也。教育部为政府机关，当局时有进退；大学百年树人，政策设施宜常不宜变。若大学内部甚至一课程之兴废亦须听命教部，则必将受部中当局进退之影响，朝令夕改，其何以策研究之进行，肃学生之视听，而坚其心志，此同人所未喻者三也。师严而后道尊，亦可谓道尊而后师严。今教授所授之课程，必经教部之指定，其课程之内容亦须经教部之核准，使教授在学生心目中为教育部一科员之不若，在教授固已不能自展其才；在学生尤启轻视教授之念，与部中提倡导师制之意适为相反，此同人所未喻者四也。教部今日之员司多为昨日之教授，在学校则一筹不准其自展，在部中则忽然智周于万物，人

非至圣，何能如此，此同人所未喻者五也。然全国公私立大学程度不齐，教部训令或系专为比较落后之大学而发，欲为之树一标准，以便策其上进，别有苦心，亦可共谅，若果如此，可否由校呈请将本校作为第……号等训令之例外。盖本校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之旧，一切设施均有成规，行之多年，纵不敢谓为极有成绩，亦可谓为当无流弊，似不必轻易更张。若何之处，仍祈卓裁。此致常务委员会。

教务会议谨启

廿九.六.十

结束本章，让我们细嚼回味冯友兰这篇文情并茂、事理明通、遣词叙事、融古灿今、铭文形韵、典雅铿锵的“至文”：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九月九日，我国家受日本之降于南京，上距二十六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之变，为时八年；再上距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沈阳之变，为时十四年；再上距清甲午之变，为时五十一年；举凡五十年间日本所鲸吞蚕食于我国家者，至是悉备，图籍献还，全胜之局秦汉以来所未有也。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原设北平，私立南开大学原设天津，自沈阳变起，我国家之威权逐渐南移，唯以文化力量与日本争持于平津，此三校实其中坚。二十六年平津失守，三校奉命迁于湖南，合组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以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为常务委员，主持校务，设法、理、工学院于长沙，文学院于南岳，于十一月一日开始上课。迨京沪失守，武汉震动，临时大学又奉命迁云南。师生徒步经贵州于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六日抵昆明，旋奉命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设理工学院于昆明，文法学院于蒙自，于五月四日开始上课。一学期后文法学院亦迁昆明，二十七年增设师范学院，二十九年设分校于四川叙永，一学年后并于本校。昆明本为后方名城，自日军入安南陷缅甸，乃成后方重镇，联合大学支持其间，先后毕业学生二千余人，从军旅者八百余人，河山既复，日月重光，联合大学之使命既成，奉命于三十五年五月四日结束，原有三校即将返故居，复旧业，缅维八年支持之苦辛，与夫三校合作之协和，可纪念者尽有四焉：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唯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旷代之伟业，八年之抗战，已开其规模，立其基础，今日之胜利，于我国家有旋转乾坤之功，而联合大学之使命，与抗战相终始，此可纪念者一也。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慨；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此其可纪念者二也。万物并育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斯虽先民之恒言，实为民主之真谛。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获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此其可纪念者三也。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于中原，偏安江表，称曰南渡；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晋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风景不殊，晋人之深悲；还我河山，宋人之虚愿；吾人为第四次之南渡，乃能于不十年间，收恢复之全功，庾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蓟北，此其可纪念者四也。联合大学初定校歌，其辞始叹南迁流离之苦辛，中颂师生不屈之壮志，终寄最后胜利之期望，校以今日之成功，历历不爽，若合符契，联合大学之终始，岂非一代之盛事，旷世而难遇者哉！爰就歌辞，勒为碑铭，铭曰：

痛南渡，辞宫阙，驻衡湘，又离别；
更长征，经峣嵲，望中原，遍洒血；
抵绝徼，继讲说，诗书器，犹有舌，
尽笳吹，情弥切，千秋耻，终已雪，
见仇寇，如烟灭，起朔北，迄南越，
视金瓯，已无缺，大一统，无倾折，
中兴业，继往烈，维三校，弟兄列，
为一体，如胶结，同艰难，共欢悦，
联合竟，使命辙，神京复，还燕碣；
以此石，象坚节，纪嘉庆，告来哲。

此碑树立之时，我已在大洋彼岸进修西史；此碑永存，而它所代表的学术自由精神未数载即开始消逝了。（责任编辑　吴　思）

我的老师林同济

● 朱世达

林同济先生 1980 年 11 月在美国加利福尼亚访学时谢世，距今已近 25 年了。他是对我影响最深远的老师之一。他激起了我一生对精美英语散文的热爱，对莎士比亚的热爱，对国际政治的兴趣。虽然我没有他的照片，在我们 1965 年毕业的照片中，也找不到他的影子。他似乎是一个被历史遗忘的人了。但他的音容笑貌却时时在我的心中闪现。

1980 年春天，我回上海开会。开完会，我回到家中。在诸多的事务中，我最想做的便是去龙华华侨新村拜访林同济先生。

我独自漫步从浦东路 729 号走到龙华。

在复旦时，我就听说他因为一句艾克顿的话："权力具有腐蚀的力量。绝对的权力绝对地腐蚀。"而被打成右派。在空前浩劫的十年中，我不断风闻他的情况。听说，他光着脚在复旦外文系的小楼里洗刷厕所，又听说他因为讲授了《哈姆雷特》和《科利奥兰纳斯》而被揪斗了十多次。这位身材矮小的羸弱的老人能吃得消么？每每念及于此，我总为之怆然。我隐隐地为他——一个孑然一身的老人担忧着。

我找到了 4 号楼，楼门前种着翡翠般的冬青和黄灿灿的迎春花。在他称之为"苟全性命的小巢"的 3 室门边贴着一张字条，上面说，因患有心脏病，医嘱上午不会客。我因为远道而来，同时我太想见他了，我斗胆敲响了门。门开了，是先生自己来开的。

"林先生，我是你的学生。"

"哪一届的？"

"你 63、64 连续教了两年的那个班。"

他想起来了。他也全然不管门边的字条，把我让进了客厅。

林同济先生

自从 1965 年离开复旦后，十五年未见了。握着他那宽厚、温暖的手，我不由得眼睛里噙满了泪水，一股凄怆之情涌上心头。

我说："我是在香港《大公报》上读到你发表的诗词，才知道先生仍然健在。"

他回过头，对坐在一边的夫人慨然地说："他们都不知道我林同济还在不在世呢。"

他还是那么精神，和 60 年代初期在复旦英国语言文学系给我们讲授英美散文和诗歌时一样，矮小的身材里似乎仍然蕴涵着无穷的力量，虽然一晃眼七十四岁了。

我想起了在复旦新教学大楼上课的他。他穿一身对襟的绸面棉袄，西装裤的裤线总是笔挺的，一双黄皮鞋，围一条黄褐色的羊毛围巾；虽然矮小，但仪表堂堂，给人一种强大的心智的感染力。他说过，阿克顿也是很矮的，但他以他的思想让所有高大的人显得渺小。我觉得他也有这样的气势。他上课时具有一种镇服的气势。这就是一种精神的力量。

那时，他一接我们班，第一课便是带我们到系图书馆去，用他的话说，就是"到禁城去"。解放前他在上海办过一座图书馆。他明白图书馆对学生的作用。他讲英语，念英语散文，抑扬顿挫，铿锵有力，又不失典雅，极具感染力，简直到了美仑美奂的地步。至今仍然记得他在朗读林肯总统的《葛底斯堡演说》中的"我们要使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永远不会从地球上消亡"时那种不可抵挡的气势。一次，他选了一篇查尔斯·兰姆的散文《旧瓷器》讲。他把围巾叠好放在讲台上，拿起讲

义朗读起来“：我真希望我们并不怎么富裕的美好的旧日时光能再回来。我并不是说我想贫穷；但是在那不穷不富的状态中，我们曾经快乐得多。”

朗读解释完毕，他弓一下身子，睿智的眼睛在镜片后面对我们笑一笑，说“：读这样的文章，是不是像喝了一碗鸡汤？”

何止是鸡汤！在他的教导下，我领略了英国散文的隽永。我曾经试图写过一篇英文散文《读书的快乐》，贴在教室后面的墙上。有一次，上完课，同学向林先生介绍，他还走到墙前读了。我记得他在我的一篇英文作文上批道，继续努力“；必会有可以期待的成就”。

在三年级时，我根据《青春之歌》写了一个英文的独幕剧，描写林道静在参加革命前的一段经历。我是用活页的练习本纸在 Underwood打字机上打的。英文剧写好后，我请林先生修改。林先生很快就修改完了，第二个星期上课时就带来了。那完全是胆大妄为，但林先生改动的地方不多。

这一切仿佛还是昨天一样，又仿佛发生在非常迢遥的过去，恍如隔世，中间横隔浩劫的十年。

林先生在客厅对我说，他应英国伯明翰大学莎士比亚学院的邀请，八月间要到莎士比亚故乡——艾冯河畔斯特拉特福去，参加第十九届国际莎士比亚年会，然后，应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大学柏克利分校的邀请去作《莎士比亚在中国》的演讲。

从他的言谈中可以感受到他的兴奋，这是在沉默、无闻了几十年重又受到世人的重视之后的感动和兴奋。

他说，他希望建立一个上海莎士比亚图书馆，这次到英美还要去奔走筹划。办图书馆是他一生的爱好。在解放前，他在上海沪西就办过海光图书馆。办一座莎士比亚专门的图书馆，集莎士比亚的剧本与诗歌以及历代世人对他的评论于一室，无论对于一般的英语学习的读者或者对于专门的研究者，都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在中国，还没有一座专门的外国作家或剧作家的图书馆。

我觉得，办莎士比亚图书馆并不在于图书馆本身，而在于一种教育。正如卡莱尔说的，英国可以没有印度帝国，但不能没有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已经成为英国文化，乃至人类文化中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学习它，研究它，无疑有助于中国文化的发展。

在移译莎剧的问题上，林先生有他自己的观点。他说，如何把莎剧的独到语言尽可能地移植到译本中来，这是莎译者所面临的关键难题。译者有特别责任对剧文中每一形象词语，仔细体会，认真处理。如果等闲使用“意译法”来塞责，那就不仅犯了修辞上偷工减料的过失，乃更是冒着破坏全剧内容有机组成的危险的。

他特别注意莎翁诗剧翻译的上口问题，应是可朗诵，可琅琅上口的。译者当用上口的语言来再现原有的诗情诗味。二者如果不得兼，译本最低度的造诣似乎亦当力求上口，力求可供演出之用。只想自觉默阅的散文，却不免有负莎剧原有的用意和本质。他跟我提到元曲，提到《桃花扇》，不妨试用元曲的语言来译莎士比亚。

他对我说，诗剧是特别适用于表达英雄时代的气息的。今日的新中国正提供了培植诗剧的沃土，理应当会见到一种相应的诗剧之诞生！他的这个思想在 1977 年 9 月的一篇文章中也表述过。在四人帮仅仅粉碎一年之后，他就搁置了个人的痛苦，对中国的前途如此乐观。1980 年，他跟我重申了这一思想。

在当了右派和在文革的 10 年中，他以英译中和中译英诗歌而自娱，排遣孤独。在我看来，他的中译英的诗要比他的英译中的诗歌要好。我在《外国语》读到他的唐宋诗词选译，其对于中国诗理解的深度，英语语言运用的娴熟，达到很高的境界。如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又如，司空曙的《江村即事》。

其实，先生的真正的兴趣在于政治科学，在于比较文化，他在加大柏克利分校是作为政治学者训练的。1949 年后他转向莎士比亚研究，是不得已而为之。他是十年浩劫之后，在中国最早提出应该结束干部终生制，实行干部退休制度的政治学者之一。他在美国讲学，除了讲莎士比亚在中国外，他还讲《中国的第二次解放——当代中国的思想与文学》和《中国思想的精髓》，表明他对中国，特别是当代中国的关注。我在以后得到了加大柏克利分校东亚研究所出版的他的讲演集。

编者杰勒米·T·蒂埃尔(Jeremy T. Paltiel)在引言中指出，这些演讲集中代表了一个具有非凡全面知识的人的思想。这些用毫无暇疵的优雅的英

语写作的讲演表明林教授对于西方文化和哲学以及对他自己本土的传统的深刻熟悉和了解。他说，这些演讲超越了学术的讨论，而表现林教授对时事和他的国家命运的关切。他说，这些讲演是他与他所经历的变化随遇而安的一种抽象化的表证。就这一意义而言，这些讲演比它们表面上所要表达的东西包含更为深刻得多的含义。我认为他讲到了要害。

首先，在讨论莎士比亚时，他提出了对人和对人性重视的思想。他谈到莎士比亚是作为人来谈的，所谓莎士比亚化，在他看来，就是人性化。“莎士比亚作为人”是林先生对莎士比亚理解的出发点。林先生特别强调莎士比亚的人性，人的幽默感，普遍性的怜悯。莎士比亚的价值就在于他讴歌了人的资质和价值。

其次，在1980年，他就敏锐地看出改革开放所具有的思想解放的本质，并将其界定为思想解放运动。他对中国的改革是有信心的。行前，他对人说，中国一定会成功，一定会胜利，他一定要把这个信心传达给美国朋友。

我最近重读了他的这篇讲稿，我对他在结尾处对外国舆论发出的忠告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因为他提到的问题正是经常困惑我们的问题。在柏克利，他希望外国记者和公众舆论要有耐心，希望他们在理解中国目前形势和意义时要有更多的灵活性(finesse)，同时对发展趋势和推动这种趋势的各种不同的力量作出正确的判断。这些，在为中国国内形势的发展提供一个适宜的国际环境和保持中美之间良好关系中，是十分重要的。他说，“我希望我们的朋友能体谅在目前的努力之中所包含的巨大的困难，同时能看到那指日可待的希望和好处。我劝诫你们不要以你们自己的固有的观念来作判断，而是在帮助引导和鼓励这些正在发展的健康的趋势方面表现出责任感。在这里，需要一种敏感性和平衡感，这就是我所谓的历史视野(historical perception)，这种历史视野正是真正的人类事务‘观察家’所应该具有的品质。”

林先生在这里提出美国观察中国事务的真正观察家所应具有的品质：理解中国事务的复杂性，有足够的耐心和灵活性，并能从历史的角度敏锐地注意到中国发生的一切所具有的象征意义。历史视野说到底就是一种发展的眼光。而这正是有些美国观察中国问题的学者所缺乏的。

行前，他对人说，中国要靠自己，但美国也有责任“帮助”，这帮助不是钱财，不是机器，而是不要“性急”，不要硬把中国拖进美国的模式，套进美国的框架。中国有自己的路，要放手让中国走自己的路，要相信中国会走出自己的路。

林先生关于中国思想的阐述有其十分独特的地方。他曾经在课堂上给我们发挥讲过“天地良心”。他说，中国人讲究“天”与“地”，人站在天地之中，面对自己的良心。无异，天与地在中国人看来，就是西方人所谓的上帝。这是中国人的意识，或者说集体无意识，或者说集体良知。他说，我们中国人，包括任何农夫，都会说“天地良心”。最后的归属是人的良知。

1987年我到哈佛大学，见到了林先生的弟弟林同奇。林同奇一家待我非常好，有时请我到他在剑桥镇的家包饺子吃。林同奇告诉我，林同济先生在出国前见到了一位中央领导人，这位领导人握着他的手说：“你尽管去讲，讲错了也不要紧，不揪你小辫子。”我从林同奇处，加深了我对先生的理解。在1957年当他被打成右派分子后，他打电话给人说：“If China go to dogs，I will go to dogs.（如果中国完蛋，我也完蛋。）”他敏锐地领悟到这场运动会给中国发展带来的打击。他不为自己，而为中国的前途感到忧虑和痛苦。他是一位热忱的爱国者。

在加州的39天日子里，他始终忙于讲学，在柏克利，于11月6日，11日和18日做了三次演讲。长期被埋没，一旦出头，犹如出土文物，其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不料心脏病猝发，20日病逝于美国。当我从香港的报纸上得知这一消息时，为他的逝世而扼腕痛惜。

我们已无法目睹林同济在新教学大楼时纵论莎士比亚的丰采了，无法聆听他从先秦的先哲，道、释、儒，一路讲到中国认同的思想了。在漫长的岁月中，他被搁在一边，仅仅是一个三级教授，无从发挥他的专长。他本来是可以为我们这个民族做更多的事的。这难道不是我们应该为之感到悲哀的么？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美国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　吴　思）

党史研究中的反思

● 何 方

我的一本《党史笔记——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近日写完了。这可算个人了却了一点心愿，但并不意味着自己反思的终结，也没能减轻反思的沉重。因此，只要一息尚存，还要反思下去。至于感到沉重，是因为反思来反思去，自己和许多人从小就为之奋斗的民主宪政还没有成为现实。

孙中山把建国分成三步走：军政、训政、宪政。可惜他老人家归天太早，三步走都留给了后人。国民党实行军政三十多年，最后以离开大陆宣告结束。共产党经过二十七年的奋斗，为军政划上了圆满句号。从新中国成立起，按照毛主席的说法，我们就进入了训政时期，到现在已经五十又五年了，但看来还没有“训”出什么结果。因为有了宪法并不等于有了宪政。谁也不敢说，中国现在已建成自由民主的法制社会。同时谁也不能否认，中国仍然是人治色彩浓重的社会。而且谁也说不准，我们的训政时期还要延续到何时。是中国人生来太笨，还是“训”的不够得法？这就很值得研究和反思。

近些年来，在一些老干部和老知识分子中流行着一种被称为“两头真”的现象。蔡仲德把他老丈人冯友兰的一生归结为三个阶段：“早年实现自我，中间失去自我，晚年又回归自我。”后来李普、李慎之等在悼念胡绳的文章中，也把这三段论套在了胡绳身上。其实，岂只胡绳，可说这是许多老干部、老知识分子中不同程度和有一定普遍性的现象。前不久，一位老领导张劲夫同志就对号入座，写了篇《我也是个“两头真”》的文章，发表在去年《炎黄春秋》第11期。这“两头真”的头一个“真”，是指当年干革命或做学问，都是真心实意、自觉自愿、勇往直前的。中间的“失”，主要指失去独立思考，受到束缚，只有盲目紧跟或被迫追随。后头的“真”，倒不一定是返璞归真，思想复原，而是说自认为思想得到解放，能有自己的想法，能提出自己的真实看法。当然，各人情况不同，看法也有差异，但只要求真，总是好现象。

拿我个人来说，近七十年前所表现出的那种为参加抗日救国和追求民主自由而不惜牺牲一切的精神与行为，确也是真心实意，没什么虚假的。后来，抗日救国的目标实现了，但自由民主不但遥遥无期，而且这一理念的合理合法都成了问题。于是和大家一起陷入了胡绳说的“惑而不解”状态。例如我们党一直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但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一篇文章中关于对报刊检查、言论自由的观点，我们是否完全认同，大概无人能作出确切的回答。可见，我们早已“惑”到不承认马克思若干主张的合理合法性。

邓小平说：“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这就是说，过去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竟然是在没有搞清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情况下进行的，这就有点“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的味道，犯错误、摔跟头也就势在难免了。我在建国后是一直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眼看着二次大战后世界经济文化出现了人类有史以来空前的大发展，国际化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我国却关起门来瞎折腾，大踏步倒退（经济总量占世界比重从建国初的4.7%降到1980年的2.5%），心里实在有点着急，但还得严守舆论一律。1979年以后，即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党确定以发展经济为中心，也允许对经济问题有一定探索，因而认识不断提

高，情况迅速变化。从计划经济，到计划调节为主（即“鸟笼经济”），再到市场经济，一路走来，虽然并不完全顺利，但经济一直保持快速增长，占世界比重已恢复到建国初期水平，国际地位也大为提高。那么，现在是否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已经完全搞清楚了？恐怕还不敢这么说。例如对那种说我们现在建设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际上呢？有人便说，我们在建设一个官僚资本主义或权贵资本主义。到底是什么？按说这就应当鼓励探索、允许争鸣，而不能只是空洞地讲坚持。

同样，我们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现在是否已经完全搞清楚了，恐怕也不能说。没搞清楚，就应该允许讨论和争鸣，否则还会是胡乔木讲延安整风后的情况：“党的理论水平越来越低，马克思主义的知识越来越低”，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还谈得上坚持呢？延安整风以来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还不值得很好总结一下吗？

我们经常说，要“以史为鉴”。确实，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教训，虽然辉煌，但也有沉痛，都极为丰富，如果能很好加以总结，就是一笔宝贵财富和锐利武器。全党和全国人民都应当参与这一总结和掌握这个武器，更不用说他们本来就有历史的知情权。而“以史为鉴”的史又必须是真实的历史，是不虚美、不隐恶，求真务实、秉笔直书的历史，而不是经过加工改造、隐恶扬善，弄虚作假的历史。如果许多历史问题不准谈，遍设禁区，严守舆论一律，那样编出来的史就不但无法“为鉴”，而且也不成其为史了。

我为什么在耄耋之年告别了五十多年的国际问题研究，而改行学起中共党史来了？除了杨尚昆说的“要给张闻天拨乱反正”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赞成在历史和现实中的造神造假。一些亲身经历和有目共睹的事竟被弄得面目全非。这就使人感到，讲了六七十年的实事求是，至今仍然存在说的和做的，内部谈的和对外讲的，往往不一致。大跃进、庐山会议、三年困难时期，那样的全党全国都在说和都得说假话更不必提了。这是个人崇拜的意识形态和特定领导体制的消极结果，而寻根究底，我个人以为和延安整风有关系。因为正是延安整风，为中国谋划出了这一行之百年有效的管理框架。现在的政治体制和舆论一律，以及委任制、等级制、保密制等配套措施，都和延安整风有关，也可以说这些是延安整风衍生来的。所以，正本清源，要谈建立民主法治社会，就必须认真反思历史，彻底批判个人崇拜。至于我提出的这些看法，只是个人改行后的学习笔记，写出来的目的也仅仅为了引起讨论和听取批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放弃了不重视发展生产力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路线，使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伟大变化，全世界对中国都得刮目相看。中国人不但站了起来，而且可以扬眉吐气。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开拓真正的盛世，使中国成为一个社会成熟、经得起任何大风大浪的强国，现在可以说是：一切俱备，只欠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的政治体制改革。

关于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92 岁的任仲夷老人说：“我想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敢于坚持真理和实事求是。”

构建和谐社会，有人用拆字法释为：人人有饭吃（人称口，禾为粮）和人人有发言权（人皆可言），也就是实现了平等和自由民主的社会。不讲平等、没有自由民主的社会，不可能和谐。

当年的中国共产党曾为自由民主而英勇奋斗，但愿在走了大段弯路后，我们都能做到“两头真”，把我们党把我们国家搞得好上加好。

（2005 年 5 月 4 日）

（作者系原国务院国际研究中心副总干事）

敬告读者

2004 年合订本已装订成册，请速汇款邮购。

2004 年精装	75 元；	简装 70 元
2003 年精装	75 元；	简装 70 元
2002 年精装	75 元；	简装 70 元
2001 年精装	75 元；	简装 无
2000 年精装	无 ；	简装 70 元
1999 年精装	75 元；	简装 无

注：以上均免收邮费

汇款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 69 号

收 款 人：炎黄春秋杂志社

邮政编码：100045 电话：010-68532048

陆定一谈文革经历

● 纪希晨

我翻阅历史资料，发现陆定一同志在1990年11月30日，同我谈他亲身经历的"文化大革命"的一番话。

现把记录原文照抄如下，供读者参阅。

1990年11月30日下午，我到北京医院看望原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同志。他这年85岁了，但头脑清晰，记忆力很好，仍然十分健谈。

谈起文化大革命的灾难，陆定一同志说：

1967年10月9日这天，我被捕了。连续三天，有九个人审讯我。动了刑，没有结果。就给我上手铐，刺进皮肉，很痛。接着又拷打，又上刑。

他们根本不问我，也不问彭、罗、陆、杨的关系，硬给我加上叛徒、特务、阶级异己分子的帽子，逼我招供。

我受不了酷刑，人都快要死了，就按他们要的"招供"！

从此，我就胡说八道。说什么假话，他们都爱听。他们爱听什么，我就说什么假话。不说怎么办？死不了，就得说假话。党内有些人就爱听假话。

口子一开，堵不住了。我就按他们要的，写了假口供。

接着，他们就把我送进监狱。

我的编号是68164号，即1968年1号要犯，64号。

从1968年到1978年，我住了11年监狱。还关了两年看守所，共13年。

1978年12月2日，才放我出来。

在监狱，受虐待，我生了气。想不通，生闷气，肚子里生起硬块，眼底开始出血。

把我送到同仁医院，用镜子一检查，医生说，你这病，要靠你自己治。你要自己消气，把硬块消化吸收。你不要生气，你要学会笑，大声地笑。

从医院回到秦城监狱，我就学笑。不笑也要笑，哈哈大笑，像演戏的大花脸那样，哈哈大笑。

监狱里，有一块门板，上下两部分。哨兵上上下下瞭望，干涉我，要我不要笑，禁止我笑。我说，我有笑的本事。

不让笑，怎么办？我就唱，大声地唱。又笑又唱，又唱又笑，经过半年多，用笑用唱的方法，果然治好了肚子里的硬块。

狱方天天要我写。这个人你认得吗？我说，不认得，不认得！不行！于是，只好写认得。写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认识的，认识后干了些什么。其实，这个人，我根本不认得。

在监狱期间，只过节日时才给我放放风。

关于二月提纲（1966年），毛主席最早要我当文革组长。我不干，就叫彭真当文革组长。主席在武汉，康生、彭真约我一块去，我们汇报了。

康生鬼得很。他说，他不知道二月提纲，是背着他干的，是彭真一个人的意见，就把彭真打倒。其实，讨论"提纲"，他完全同意，他没说一句不同意的话。

谈到文革发生的原因，陆定一说，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党不成熟。对革命战争，我们经过几十年的摸索，有一套经验，但对搞社会主义建设，却没有经验，很不成熟。明知办不到的事，硬要去办。

毛主席95岁诞辰时，我曾写过一篇文章，说我们党经过早年时期，经过反对陈独秀、反对王明的斗争。反王明路线是最困难的，一反反了十年，这是因为王明有共产国际的支持，直到1942年整风，才把王明路线反掉。

毛泽东主张调查研究，懂得国情，懂得实际。搞革命，一要马列知识，二要实际经验。

王明、博古都是极端的教条主义者。博古也是两个凡是，一是凡是马列主义书本的话都执行，二是凡是共产国际的话都执行。

毛泽东晚年骄傲了，听不进别人的话。

他同群众关系也变了，不是从实际出发，不为群众服务。

（作者系人民日报社高级记者）

为胡适辩诬

——对“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和“问题与主义”的再认识

● 杜 光

在四十多年前的学习唯物主义、批判唯心主义的运动中，理论界曾把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作为杜威实验主义的中国标本，大申讨伐。存留在人们记忆中的，有两点最为突出：一，“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是中国式的实验主义和实用主义，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唯心主义先验论；二，胡适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中提出这个口号，是为了抵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当年对胡适的批判，完全是背离实际的诛心之论。但近几年读到一些文章，还是重复四十多年前的观点，有的把“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看作是主观随意地对待问题的思想方法，有的甚至语带讥讽；有的仍指摘《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是为了反对在中国传播社会主义。看来，至今仍原封不动地照搬四十多年前的观点者还大有人在，很有必要对这两个问题进行再思考再认识，还胡适以本来面目。

（一）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说法，并非出自《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而是见于《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胡适在该文的第八章结论中说：“他们用的方法，总括起来只是两点：(1)大胆的假设，(2)小心的求证。假设不大胆，不能有所发明。证据不充足，不能使人信仰。”他认为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是针对宋儒的“格物”方法提出来的。假设就是归纳法，求证就是演绎法。他举出钱大昕用大量例子(胡适列出15个)来证明汉字语音“古无舌头舌上之分”的假设，指出：“演绎的结果若能充分满意，那个假设的通则便成了一条已证实的定理。”“凡是科学上能有所发明的人，一定是富于假设的能力的人。”

胡适这个结论写于1920年11月，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发表之后一年零四个月。所谓“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是他对清代学者治学方法的概括。精于训诂考据之学的乾嘉学派，治学十分严谨。钱穆在《中国近百年学术史》中曾谈到乾嘉学派巨子阮元的治学方法：“其法先罗列古训，宁繁勿漏，继乃为之统整，加以条贯。”阮元把这种方法概括为“实事求是”。他在《研经室集自序》里说：“余之说经，推明古经，实事求是而已，非敢立异也。”所以，后来“实事求是”一词，便常同训诂校勘、诠释经典联系在一起，成为证经解经的基本方法。如陈垣就曾指出，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欲实事求是，非考证不可。”胡适所概括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就是阮元、陈垣说的“实事求是”。

《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虽然没有提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口号，但对这种归纳、演绎的研究方法，确实作过类似的表述：“凡是有价值的思想，都是从这个那个具体的问题下手的。先研究了问题的种种方面的种种事实，看看究竟病在何处，这是思想的第一步功夫。然后根据于一生经验学问，提出种种解决的方法，提出种种医病的丹方，这是思想的第二步功夫。然后用一生的经验学问，加上想象的能力，推想每一种假定的解决法，该有什么样的效果，是否真能解决眼前这个困难问题。推想的结果，拣定一种假定的解决，作为我的主张，这是思想的第三步功夫。凡是有价值的主张，都是先经过这三步功夫来的。”

胡适在这里把研究过程分为三步：第一步是

胡 适

研究问题的种种方面和种种事实；第二步是提出各种解决方法；第三步是从中找出较好的解决方法，作为自己的主张。这种认识方法无疑来源于杜威的实验主义。胡适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发表前几个月的1919年春间曾作过一次讲演，题目就叫《实验主义》。在这次讲演中，他介绍杜威的认识思想五步曲：1、对问题发生疑难；2、探究疑难之点竟在何处；3、提出种种假定的解决方法；4、决定哪一些假设是最适合的解决方法；5、通过实践加以证明。胡适认为，在这五步曲中：“从第一步到第二步，是偏向归纳法的，……从第三步到第五步，是偏向演绎法的。”“最重要的就是第三步。第一步和第二步的功夫只是要引起这第三步的种种假设；以下第四、第五两步只是把第三步的假设演绎出来，加上评判，加上证验，以定那种假设是否适用的解决法。这第三步的假设是承上启下的关键，是归纳法和演绎法的关头。”

胡适的认识三步曲和他所介绍的杜威五步曲之间的渊源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我们一定要把“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看作胡适本人的实验主义方法的话，那么，三步曲和五步曲便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诠释；“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可以说是这三步曲、五步曲的概括。三步曲的前两步和五步曲的前三步是“大胆假设”，三步曲的第三步和五步曲的后两步便是“小心求证”。可见，假设绝对不是毫无根据地随心所欲，而是以研究事实的方方面面为前提的。胡适在给罗尔纲的一封信中曾说：“我近年教人，只有一句话：‘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一分证据只可说一分话，有三分证据，然后可说三分话。治史者可以作大胆的假设，然而决不可作无证据的概论也。”

前几年看到《北京大学校友通讯》第10期上载有胡适在《北大二七级同学录》上写给1931年毕业学生的临别赠言。他在这个赠言中写道：“如果你们不敢十分自信，我这里有一件小小法宝，送给你们带去做一件防身的工具。这件法宝只是四个字：‘拿证据来！’”这里还有一只小小锦囊，装着这件小小法宝的用法：“没有证据，只可悬而不断；证据不够，只可假设，不可武断；必须等到证实之后，方才可以算作定论。”重证据是胡适实验主义的最大特色。不论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还是“实事求是”的治学方法，都把证据放在第一位。这种科学的治学方法具有鲜明的唯物主义特点，哪里是什么“唯心主义先验论”！也许正因为这样，西方的一些学者才把胡适的实验主义宗师杜威称为“美国的马克思”、“当时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见于《上海社会科学报》2002年7月25日《杜威：为了理解的纪念》一文，作者厦门大学陈亚军）

（二）

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主要是针对当时的安福系首领王揖唐等人而发的。胡适斥责这些无耻政客不去解决当时面临许多应该赶紧解决的问题，如解散议会(王揖唐担任段祺瑞政府的安福国会的议长)、南北议和等，却组织什么民生主义研究会，以社会主义家自居，大谈社会主义。胡适正是针对这种状况，论述空谈“好听的主义”、“进口的主义”、“纸上的主义”的危险。他认为一切学说和主义都是“研究问题的一种工具”，可以用作解决具体问题的“参考资料”；“不要挂在嘴上做招牌，不要叫一

知半解的人拾了这些半生不熟的主义,去做口头禅。”他指出:像王揖唐这样的人“都可自称是社会主义家,都可用这一个抽象名词来吓人。这不是‘主义’的大缺点和大危险吗?”

要了解胡适这些话的确切涵义,需要先明白社会主义当时在中国的实际情况。20 世纪初,在日本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大量社会主义著作经由留日学生传入中国。许多知识分子,包括流亡在日本的孙中山、梁启超等人,都以社会主义者自居。辛亥革命后报刊上不断涌现很多讨论社会主义的文章,但在各种社会主义的观点中,占主流地位的却是无政府主义思想。俄国十月革命后,随着苏维埃政权的巩固,许多激进分子转而接受以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为主要内容的苏俄式社会主义,但在社会主义者中间仍占少数。多数以社会主义者自许的是主张改良或持各种各样改革观点的人,其中不乏自诩为社会主义者而令人齿冷的投机政客。恽代英在《少年中国》第 2 卷第 1 号上发表的《社会主义论》中,就曾对这一时期的社会主义作过描述:“其实,所谓社会主义这个名词,本体便向来没有什么精确的界说,高到安那其布尔什维克,低到安福系王揖唐所称道,都有些可以合于通行所谓社会主义的派别与意义叙述出来。”可见,那个时期的社会主义,包含着非常庞大而复杂的内容。并不像我们这几十年来所认为的那样“定于一尊”。看来,胡适主张少谈的“主义”,指的就是这些五花八门、包罗万象的社会主义。断定《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就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未免有些武断。

有意思的是,为了回答蓝知非的《问题与主义》和李大钊的《再论问题与主义》,胡适又写了《三论问题与主义》。文中他作了这样一段叙述:“多研究些具体的问题,少谈些抽象的主义。一切主义,一切学理,都应该研究,但是只可认作一些假设的见解,不可认作天经地义的信条;只可认作参考印证的材料,不可奉为金科玉律的宗教;只可用作启发心思的工具,切不可用作蒙蔽聪明、停止思想的绝对真理。”

这一段论述,可以说是八十多年前的那场关于“问题与主义”的争论中最有价值的总结。胡适明确提出“一切主义,一切学理,都应该研究。”这实际上已经否定了所谓反对社会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断语。更为意义深远的是他主张的“三可三不可”,完全适用于“一切主义,一切学理”,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我们几十年来的一大教训,不正是把马克思主义、甚至斯大林模式的假马克思主义奉为“天经地义的信条”、“金科玉律的宗教”和“蒙蔽聪明、停止思想的绝对真理”吗?甚至在当前的报刊上,我们难道不是在在都可看到这种遗风吗?不能不承认,胡适的这一告诫,今天仍然有它的积极意义。

在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和李大钊随后发表的给胡适的信《再论问题与主义》之间,确实存在着原则性的分歧。这表现在胡适从实用主义改良主义出发,把问题与主义对立起来,认为改造社会应当从具体问题入手,一个一个地解决,而把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主张,斥为“自欺欺人的梦话”。这种观点同苏俄式的社会主义当然是对立的。所以李大钊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中指出:“问题与主义有不能十分分离的关系。”“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他进而指出:“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解决了的希望。”两种观点对照,可知是两种不同改革观点的正常讨论。一种认为只有从一个个具体问题的解决入手,才能改造整个社会;一种认为只有从根本上改变整个社会,才能求得具体问题的解决。应当承认,这两种改革观各自都有一定的真理性,把这种不同观点的讨论提高到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之间,甚至是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斗争的高度是十分不应该,也是非常不恰当的。

四十多年前批判胡适思想的运动,使胡适蒙上了一层莫须有的污垢,在人们的观念里留下了一个被扭曲的形象。近几年来,学术思想界对胡适的评价逐渐趋于实事求是,但当年的批判所造成的不良影响,却至今尚未消除。希望本文所引证的材料和粗浅的分析,能澄清在“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和“问题与主义”这两个问题上的混乱认识,并有助于对胡适做出正确的评价。

(作者系中央党校教授)

(责任编辑 吴 思)

中国的生态危机

● 应克复

贫水大国

我国的淡水资源按人均占有量在全世界排109位。人均占有量只有世界人均水平的1/4，约为2200立方米，被联合国列为13个贫水国之一。而且，水资源分布极不平衡，大部分集中在长江流域和长江以南地区。有16个省市自治区人均淡水资源量低于严重缺水线，宁夏、河北等6省市自治区低于500立方米。因此，许多地区的人均年占有量比全国平均值低得多。

全国实际可能利用的水资源量为8000亿至9000亿立方米，目前估算用水总量为7000亿至8000亿立方米，即已接近可利用水量的上限。

全国600多座城市中，有400多座城市缺水，其中100多座城市严重缺水，日缺水1600万吨。我国尚有3.6亿农村人口喝不上符合卫生标准的水。每年因缺水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2000亿元。全国每年因缺水少产粮食700—800亿公斤。

据2003年国家环保总局统计，全国污水废水排放量为460亿吨，其中工业废水占46.2%(水利部提供的数据是，污水废水排放总量680亿立方米，工业废水占2/3)，超过环境容量的80%以上。七大江河水系，40.9%是"丧失水功能"的劣五类水质；75%的湖泊出现不同程度的富营养化；"三湖"水质均为劣五类，不可农业用，不可工业用，更不可作饮用水源。

黄河不再咆哮

中华母亲河黄河，水资源已十分贫乏，河道萎缩，断流加剧。1972年4月，黄河在山东境内第一次出现断流，这是黄河漫长历史上的第一次。1990年到1998年，黄河年年断流。1997年断流更是多达7次，计226天，断流河段达700多公里，300多天无水入海。仅给山东一省造成的经济损失就达135亿元。专家指出，如不采取及时而有力的措施，黄河就会变成一条奇怪的内陆河，既不注入大海，也不注入湖泊。

在水资源短缺的情况下，为了生产和生活只能从地下采水，致使华北地区的地下水超采，水位正在大幅度下降，并使地面下沉，海水倒灌，前景严峻。

黄河源区在干涸

巴颜喀拉山是黄河、长江发源的象征。黄河源区第一县的玛多是三江源的核心区：长江总水量的25%、黄河总水量的49%、澜沧江总水量的15%都出自三江源地区。玛多境内拥有大小湖泊4077个，黄河在其境内绵延200多公里，有着"千湖之县"、"中华水塔"的称誉。现在的玛多只剩1000多个湖泊，面积大于0.06平方公里的湖泊仅261个，也就是说，90%以上的湖泊已经干涸。上世纪90年代与80年代相比，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年平均流量分别减少了24%、27%和13%。位于黄河上游的龙羊峡水库其发电量仅达设计量的一半。

扎陵湖和鄂陵湖是黄河源地区最大的一对"姊妹湖"，两湖间有20多公里黄河水道相连。由于上游扎陵湖水位下降，自1999年6月起两

湖间曾出现5次断流。鄂陵湖往下120公里河段的所有支流早已全部干涸。黄河源头将下移至120公里外的热曲河。80年代热曲河水深及胸腹，21世纪初仅及膝盖了，照此速度发展，20年后的热曲河极有可能干涸。

20世纪80年代玛多地区一年有300多个雨雪天，每星期都下雨。由于过渡放牧，牛羊如蝗虫般地扑向草场，使草场迅速退化、沙化，空气湿度越来越低，云层越来越薄，降雨只集中在某几天，之后便是旷日持久的晴天烈日。降水量急剧下降，蒸发量却与日俱增，达到降水量的17倍。湖泊被蒸发了；加之全球性的气候变暖，连千年的雪山也被"蒸发"了，再也看不到连绵的雪峰。

现在的玛多，没有水，没有草，草场退化、沙化，沙尘暴频繁，牛羊数几年间锐减。这个80年代初的全国首富县，现在成了青海省的重点扶助县。数千名无家可归的生态难民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家园。

长江在挣扎

与憔悴枯槁的黄河相比，长江则变得喜怒无常，放荡不羁。继1996年特大洪水之后，1998年长江又一次发生特大洪水，这是建国以来长江洪水灾害造成损失最大的一次。严重的水土流失使长江流域塘堰的总库容被泥沙淤积了一半以上，中小水库淤积了库容的1/4-1/6。长江干流河道的不断淤积，造成荆江河段的悬河。每到汛期，滚滚洪水全靠大坝挟持，洪水水位高出两岸达数米到十几米。

长江流域另一个突出问题是水体污染严重。2001年废水污水排放总量为220亿吨，使得干流沿线形成600公里的污染带，60%的水体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环保部门对381个断面水质评价结果显示，只有53%断面达到三类以上水质，其中南京、上海、武汉、重庆，攀枝花等5城市江段近岸水域污染尤为突出，沿江城市500多个主要取水口不同程度受到污染。由于水质恶化，上海等26座城市已成为"水质型缺水"城市。水利部太湖流域管理局局长孙继昌忧心忡忡地说："太湖流域不缺水，缺的是好水，多的是污水！""江南水乡没水喝"已较为普遍。

专家指出，长江面临六大危机，如森林覆盖率严重下降，泥沙含量急剧增加，水质严重恶化，物种生存受到威胁等，如不再加以保护，"10年内长江就可能变成第二条黄河"。

污染最为严重的还不是长江。2001年我国七大水系污染由重到轻的顺序是：海河、辽河、淮河、黄河、松花江、长江和珠江。淮河已成了全流域污染的脏河、臭河。"50年代淘米洗菜，60年代洗衣灌溉、70年代水质变坏，80年代鱼虾绝代，90年代身心受害。"这首民谣唱出了淮河儿女心中的隐痛。

五大湖重病缠身

我国的五大湖——鄱阳湖、洞庭湖、太湖、洪泽湖、巢湖也是重病缠身。重病之一是湖面湖容急剧萎缩。由于大规模围湖造田与水土流失，洞庭湖由建国初期的4350平方公里缩小至2840平方公里，鄱阳湖由5100平方公里缩小至3900平方公里。又由于流失的泥沙淤积湖底，使湖底淤高，湖容量大减。仅洞庭湖其面积和湖容都减少了50%以上。湖面萎缩与湖底增高大大降低了蓄水与泄洪的功能，致使1998年爆发特大洪灾，江西境内870多座圩堤溃决，159万人被洪水围困，无家可归。"人断水出路，水断人生路"，这是洪灾给人们的教训。大灾后人们不得不退田还湖，还其湖泊的历史原貌。

重病之二是水质严重污染。由于接纳过量的氮、磷等营养物质，导致水质富营养化。巢湖接纳的废水量为五大淡水湖之首。西半湖已呈重度富营养状态，严重地污染了该地区的合肥等市的饮用水。2003年巢湖的水体已超过三类水质标准，严重富营养化导致蓝藻大爆发，堵塞水厂取水口，供水不足使工厂停产半停产，出现了湖边居民无水喝的尴尬。20世纪70年代，我国34个重点湖泊中富营养化仅占5%，到90年代，中国东部湖泊全部处于富营养化状态。2002年8个大型淡水湖泊水库有6个处于富营养状态。湖泊水质的急剧恶化，自然是由于人口剧增、大量工业废水、城镇生活污水的排放以及农业生产中农药、化肥流失等因素所致。

海洋的呼救

称为“ 海上赤魔 ”的赤潮对沿海居民构成另一种威胁。

近年来,我国海域赤潮发生频率提高,面积不断扩大。据《中国海洋环境质量公报》披露:2000 年,全国海域共发现赤潮 28 次,面积 1 万平方公里;2002 年 79 次,面积 1 万余平方公里;2003 年激增至 119 次,面积 1.45 万平方公里,直接经济损失 4281 万元。

东海为我国赤潮高发区。上世纪 90 年代前,东海区每年发生赤潮 20 起左右,近年来年均发生 40 起左右。2003 年发生 70 多起,创历史新高。

浙江舟山海区更是触目惊心。2000 年发生了 10 次,面积 2000 至 3000 平方公里。2003 年发生了 46 次,面积达 7000 平方公里。就毒性来说,2002 年之前没有出现有毒赤潮,2002 年开始出现有毒赤潮。现在,浙江省近岸海域基本无一类海水,四类、劣四类水质占整个近岸海域面积的 81%,污染程度居沿海省市第二位。

赤潮是向人类的一种警告。赤潮频仍表明陆上及海上入海排污在逐年增加。海上污染 80%来自陆地。以东海为例,2003 年人们向东海倾倒了 4245 万立方米的疏浚物。其中,上海海区的倾倒量占 55%以上。这些未加任何处理的疏浚物,含有大量的铜、铅、锌、砷、镉、铬和油类等,使长江口一带海域无机氮和无机磷全部超标。

渤海在“死海”边缘上徘徊

经国家海洋局检测,渤海的环境污染已经到了临界点。水体中的无机盐、活性磷酸盐、铜、氮、锌、石油等全部超标。海底泥中,重金属竟超过国家标准的 2000 倍。渤海产卵场污染面积达到 100%。专家警告,如果再不采取果断措施遏制污染,渤海在 10 年内将变成“死海”。那时,即便不向渤海排入一滴污水,单靠其与外界水体交换恢复清洁,至少也需要 200 年。至于积沉在海底的污染物,将存在更长的时间。

1980 年以来,渤海赤潮频发(已达 300 余次),周期越来越短,面积越来越大,持续时间最长的达 72 天,而且已从无毒赤潮向有毒赤潮转化。工业废水、生活污水和养殖污水向渤海的过量排放,导致海水越来越富营养化和赤潮灾害的加剧。

渤海的海产资源濒临枯竭。享有“鱼仓”美誉的渤海近年来几乎已无鱼可捕。一些渔民每次出海辛苦 20 多小时,捕捞上来的常常是几十斤“皮虾”。20 年间,对虾产量锐减九成。比目鱼、黄花鱼、鲈鱼、鱿鱼和蛤蜊等水产品群带已经消失。消失的原因是狂捕滥捞。1960 年,沿海省市机动渔船总数为 550 艘,1970 年增加到 3500 艘,到 2001 年骤增至 9 万余艘。一些渔民甚至使用立体状地毯式的拉网,上自水面,下至海底的水生物无一漏网,就连刚刚出生的“子孙鱼”也难逃厄运。水生物失去了生存繁殖的空间,渤海几乎成为“空海”。

耕地告急

我国耕地面积仅占世界的 7%。国土资源部显示,2003 年我国耕地面积为 18.5 亿亩,比 7 年前的 1996 年减少了 1 亿亩,年平均减少 1429 万亩。现人均占有耕地仅 1.43 亩,为世界人均水平的 32%。2003 年,全国 31 个省市区中,人均耕地低于 0.8 亩警戒线的已有 6 个。预测表明,到 2030 年,我国人均耕地占有量将减少 1/4。

耕地面积很有限,多数耕地质量又较差。现有耕地质量较好的一等耕地面积仅占耕地总面积的 41.33%;质量中等的耕地面积约占 34.55%;质量差的耕地面积约占 20.47%;不宜继续耕种的耕地约占 3.65%。可见,中等以下的耕地面积共占耕地总面积的 58.67%。此外,全国耕地分布在山地、丘陵、高原地区占 69.27%,水资源占全国总量的 80%以上的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仅占全国耕地的 38%,水资源不足全国的 20%的淮河流域及其以北地区,却占全国耕地的 62%。可见,我国 60%以上的耕地无水源保障。

耕地的水土流失严重。我国水土流失面积达 356 万平方公里(2002 年),占国土面积的 37%。同时,每年还新增 1 万平方公里的水土流

失面积。另外，土地污染日益严重。专家指出，我国过量使用化肥和农药已到极限。占世界7%的耕地面积却使用了占世界近30%的氮肥。化肥、农药被农作物吸收仅30%，70%散发于大气、渗入到土壤与江河湖泊与地下的水体之中，使耕地土质逐年下降，并对至少13个省份的居民及水生物造成生存与健康威胁。

耕地的浪费也令人痛心。90年代以来，全国城镇普遍、大面积地圈地运动使大片优质农田变为建设用地，各种名目的开发区有40%是开而不发，造成大量土地闲置。人口的膨胀与城市化使城市用地成培增加。1986年至1996年间全国31个特大城市占地规模由3270平方公里扩大到4910平方公里，增长了50.2%。

土地荒漠化、沙化令人忧

我国国土大面积荒漠化日趋严重。我国现有荒漠化土地267.4万多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27.9%，而且每年仍在增加1万多平方公里。我国18个省区的471个县、近4亿人口的耕地和家园正受到不同程度的荒漠化威胁。

我国西北湿地(包括新疆全境、青海、甘肃、宁夏的大部分和陕西西北部)在中国湿地中占有较大比重，而且多分布在江河源区、绿洲、河滩和内陆湖滨等生态敏感地带。由于过度种植、放牧等因素，现正在迅速退化。主要表现为，河流断流，湖泊萎缩，湿地面积减少；湿地水质咸化；旱化湿地向沙漠发展。新疆玛纳斯湖周围曾是富庶之地，随着石河子大规模开垦，湖泊水量锐减，现已消亡，周围地区的经济也随之衰败。内蒙古的居延海干涸后，享有盛名的居延绿洲随之消逝，不仅水生动植物死亡，湖畔80万亩胡杨林也惨遭厄运。20世纪50年代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大面积开发，在塔里木河上游大量截水导致罗布泊干涸。我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青海湖正在重复着罗布泊的命运。青海湖水位逐年下降，湖面不断缩小，附近的沙漠面积，年均以10.12平方公里的速度增长，尤其是湖西岸沙丘是近10多年才形成的风沙堆积，并成为该区域沙漠化最快地区。

我国沙漠和沙化总面积已达174.3平方公里，每年还在以3436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展，一年等于损失一个大县的面积。沙区治理速度远远赶不上沙化的速度，“生态难民”有增无减。令人忧虑的是南疆两大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和库木塔格沙漠已多处“握手”相连。一旦两大沙漠全面合拢，若羌县(绿洲)的5万多群众将受到生存的威胁。

沙尘暴肆疟

频繁而日趋加剧的沙尘暴已成为我国北方严重的自然灾害。

建国至2001年的52年间，共发生沙尘暴88次，平均每年1.7次，尤以1952年在甘肃、1979年在新疆、1983年在西北五省区、1986年在新疆发生的强沙尘暴为甚，特别是1993年5月5日发生自西北、掠及北方72个县110万平方公里地域特强沙暴，其强度、范围、灾损都是两千多年历史记载中所没有的。进入2000年后，沙尘暴急剧增加，当年，强和特强的沙尘暴就达9次，为近50年之最；2001年出现12次沙尘天气，其中沙尘暴6次；2002年入春后仍是沙尘天气不止，3月19日至21日发生连续几天横扫大半个中国、远及日、韩的特强沙尘天气。这表明，沙尘暴的发生频数与趋势都在直线上升。

我国沙尘暴可分四大源区：一是甘肃河西走廊及内蒙古阿拉善盟，二是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周边地区，三是内蒙古阴山北坡及浑善达克沙地毗邻地区，四是蒙陕宁长城沿线。人类的过垦过牧，滥樵滥采，使这些地区湿地干涸，水源减少，土地荒漠化与沙化，是沙尘暴猖獗的根本原因。中国目前受沙尘暴袭击和污染的省会城市已达20多个。北京2000年出现22次沙尘天气，2001年10余次，2002年入春后又发生数次沙尘天气。人们忧虑，北京是否会成为“庞贝城”?

城市中弥漫着污染的空气

2004年9月“中国城市论坛北京峰会”上，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院长俞孔坚将“神舟”五号宇宙飞船上拍回来的照片展示在大家

面前，说“：我们北边的俄罗斯是绿色的，南边的东南亚是绿色的，只有我们的国土是枯黄一片。我希望这张祖国母亲的影像，能唤起一个期待复兴的民族的忧患意识！”

我国600多座城市中，大气环境质量符合国家一级标准的城市不到1%。2003年对340个城市的监测中，空气质量达到二级标准的城市有142个，占41.7%；达到三级标准的城市108个，占31.8%；劣于三级标准的城市有91个，占26.5%。也就是说，空气质量属于三级与劣于三级的城市占58.3%。在340个城市中，有64个城市位于二氧化硫污染控制区。

全球污染最严重的10个城市中，我国占一半。在这些城市中，颗粒物和二氧化硫浓度已经超过世界卫生组织及国家标准的2——5倍。

联合国开发署2002年报告称，我国每年空气污染导致1500万人患支气管病，2.3万人患呼吸道疾病，1.3万人死于心脏病。

我国1/3的国土被酸雨侵害，主要分布在长江以南、青藏高原以东和四川盆地，波及面积达100多万平方公里。2003年，在监测的487个市、县中，出现酸雨(PH≤5.6)的城市有265个，占54.4%。未出现酸雨的城市的比例下降，酸雨频率超过40%的城市比例上升了7.2个百分点。表明全国酸雨污染呈加重趋势。

能源需求面临着严峻挑战

改革开放20多年，工业化进程突飞猛进，但走的是传统的工业化道路，即“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之路；“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坏、后保护”之路，资源的损耗和环境的破坏十分严重。

从1990年到2001年，中国石油消耗量增长100%，天然气增长92%，钢增长143%，铜增长189%，铅增长380%，锌增长11%，十种有色金属增长276%。这样的消耗速度迅速地耗尽了国内资源。中国人口众多，占世界21%，地大而物不博，石油储量仅占世界1.8%，天然气占0.7%，铁矿石不足9%，铜矿不足5%，铝土矿不足2%。这些有限的资源难以支撑起今后的经济发展。

以能源而言，中国工程院院士郑健超指出，按目前经济高增长、能源高消耗的情景设计，在未来20年中我国能源需求面临巨大缺口。他以以下一组数字形象地来说明这个缺口：要增加26座兖州煤矿，6个大庆油田，8个天然气西气东输工程，4.3个左右的三峡水电站的装机容量，20个大亚湾核电站和400个大型火电站，还要用20年的时间建起美国用50年时间增容起来的电网容量。到2020年我国的能源需求将达到31亿吨标准煤，居世界第二，占当年全球的13.2%。目前我国能源消耗强度仍较高，约为世界经合组织国家均值的4.6倍。

能源与资源的不足将严重制约我国经济增长，今后的经济增长将会愈来愈依赖国外资源的进口。到2010年，我国的石油对外依存度将达到57%，铁矿石将达到57%，铜将达到7%，铝将达到80%。

中国各类资源人均占有量不同程度低于世界人均水平，但却是世界上资源消耗与污染物排放量最大的国家之一。是世界上耗水量的第一大国（占世界用水总量的15.4%），能源消耗居世界第二位，污水排放量居世界第二位(相当于美国的3倍)，二氧化碳排放量居世界第二位，不久可能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

10余年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年增长率在7%——9%之间)，不少人为此而沾沾自喜。孰不知，我国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是以牺牲环境、破坏生态为代价的。如果从国民生产总值中扣除因破坏环境与生态所造成的损失的价值(在这些损失中有的在以后的修复与补偿中即使投入很巨大的物力与人力也是难以复原的)，那么，高速经济增长实际上是怎样的一种结果呢？以下的一些数字回答了这个问题。1990年环境污染损失的经济价值为367亿元左右，约占当年GNP的2.1%；1992年环境污染损失为1096.5亿元，占当年GNP的4.5%；1993年的污染损失为1085.1亿元，占当年GNP的3.16%。据1997年世界银行统计，中国每年仅空气与水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540亿美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6%。如果将所有污染对经济所造成的损失汇总起来，每年污染所造成的损失是GDP的7%左右。这一数字，正好接近这些年经济增长所创造的价值（《瞭望》2004年40期）。也就是

说，我们千方百计所创造的经济增长奇迹实际上被污染所造成的损失无情地抵消了。

环境污染严重威胁着人类的健康

大气污染，水体污染，土壤污染，以及食品污染，对人类健康的威胁日见严重。

癌症的发病率愈来愈高，过去的年代它是一种老年性疾病，现在患者年轻化了，十几岁、二十几岁患此病者已不少见。过去多见于城市，现在农村也普及起来了。四川沱江流域的简阳市简城镇民旺村，上世纪70年代是远近闻名的“长寿村”，如今，却成了远近闻名的“癌症村”了。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原副院长王建璋教授指出：“人类的癌症大约80%——90%都是由环境引起的。”致力于恶性肿瘤技术攻关的专家都感到，不断发展的医疗技术对于癌症的高发仍无力回天，问题还是要从改变人们的生存环境寻找出路。

2002年SARS（非典）袭击我国，26省市区发现此病及疑似此病患者计5000多例，以北京等大中城市为甚。SARS病毒的凶猛我们已领教过了。变异的环境会产生变异的物质，变异的物质孕育出了人类的新天敌。专家们认为，由于大自然生态平衡的破坏，一些微生物在外界环境改变的条件下，不得不通过基因变异，原来不致病的微生物成了致病的毒性基因，原来只在动物中存在的病毒成了能在人群中传播的病毒，SARS这种新的冠状病毒，以前从未在人体中发现过，但在许多动物身上是早已存在的。对野生动物的滥捕滥杀以及环境的污染也是SARS快速蔓延的重要因素。

由于环境的毒化，人体血液中正常的白血球数已由20世纪70年代的7000——8000降到80年代的5000左右，20世纪末降至4000左右。男性精子数正在急剧减少，1940年，男子平均每毫升精液中有精子1.13亿个，1990年下降到7700万个。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男子的精液数量平均比50年代出生的减少25%，年递减2%。照此下去，70年后，人类将丧失生育能力。

上述多方面丰富翔实的资料说明：

我国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是严重的，是全方位的，无论是江河、湖泊、海洋的水体，还是大气、土壤，已遭到并且还在进一步地遭到污染与破坏，我们赖以生存所必须的水、空气、土地等自然资源已十分有限。

环境与生态状况的恶化已经可以用“危机”的概念来加以表述了。本文目的旨在唤起全民族的危机意识，把抗御生存危机作为全民族的紧要任务。

（作者系江苏省社科院研究员）

（责任编辑　吴　思）

书屋 2005年第6期目录

话到嘴边	关于汉字文化的对话	王　蒙　孟　华
阡陌纵横	孙中山与革命知识分子	霍红伟
	陈省身的“强国”信念	王　昊
尘影斑驳	民国外交家陆征祥	石定乐
	蔡元培辞离北大以后	张晓唯
	“丁在君这个人”	黄　波
另类解读	愁如大海酒边生	
	——读张恨水与郁达夫的旧体诗词	伍立杨
	最是东坡惊人心	张宗子
西书养神	舌头的诡计与权力	季广茂
	思想史的花边	
	——读《从结构到解构：法国20世纪思想主潮》	王洁群
	《红笑》风波	陈建军
艺术长廊	慈禧与京剧	蒋晗玉
女性立场	并将遗事辨丁香	
	——读《顾太清、奕绘诗词合集》	桑　农
	苏雪林的两种姿态	厉　梅
	还有吴曙天	散　木
湖湘人物	沈从文的“自己”	伍　国
	间世异人资耀华	张远山
	丁玲与周扬	秦林芳
释疑解惑	答客问：“草根红学”解密	邓遂夫
教育论坛	教育公平与职业教育	李　樱

邮发代号：42-150　月刊　每月6日出版　定价：5.00元
地　址：长沙市韶山北路443号《书屋》杂志　邮编：410007
电　话：0731-5791300　5563097　传真：0731-5790197

竹入义胜假扮田中特使内幕

● 刘建平

1972 年，以中美、中日关系的改善为标志，国际政治格局由美苏对立向多极化制约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动；故而 1997 年的 25 周年纪念在中、美、日三国都是不被遗忘的节目——特别是在一个时期以来摩擦不断的背景之下。但同为重要的亲历者，美国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再次接受了人们的热烈敬意，而曾有“和式基辛格”之称的日本原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却向新闻界吐露了他“假扮特使”的重要内情。

“我并没有打算欺骗周总理……”

这句话是竹入义胜在周恩来总理去世后的一次访华中向邓颖超“表示歉意”时的辩白。1997 年 8 月 27 日的《朝日新闻》登载了该报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 25 周年采访团采访竹入的有关详细报道。竹入说：

能够在 72 年这样的历史事件中参与斡旋真是政治家之非常幸运，但那时空口无凭去扮演特使，现在想起来也还冷汗湿身。当时中国方面的期望紧迫，还有议论说“像美中恢复交往那样，日中间的和式基辛格也有必要”。然而，我约见大平正芳外相、夜访田中角荣首相府邸，都受到冷遇，没有获得政府的任何保证。田中称其内阁刚刚成立且台湾派很强硬，因此没精力也无心去处理日中问题；甚至连写一句“竹入系本人密友”的请求也拒绝了。

考虑到不带着日本方面的意见去北京将无言以对，无奈便与同党正木良朋一起私自拼凑，写下了“维持日台条约、容认日美安保条约”等政府的一般主张计 20 条。7 月 25 日从东京出发，到北京后交给廖承志的就是这件私撰的方案，当时很担心受到喝斥。然而，一切都很顺利。与周总理第一次会谈时，当我听到“放弃战争赔偿要求”的表示，简直头都晕了。第二次会谈时，周总理保证说：“如果美国对中日关系正常化表示不满，我去给尼克松、基辛格打电话。”第三次会谈，周总理宣读了经毛泽东主席批准的“联合声明草案”，其中没有触及日美安保条约。我记下正文 8 条和默契 3 项，这便是史称的“竹入笔记”。

“什么话，地地道道的日本人！”

竹入的访华行动受到公明党的支持母体创价学会的强烈反对，认为“没有必要为田中内阁充当走卒”，并有“小心被逐出教门”的危言；但竹入不为所动，似有义无反顾之气概……他接着说：

我避开记者逃跑似的回到日本，第二天即 8 月 4 日便去首相官邸报告。田中、大平态度大变，表示：果如此就可以去北京。田中看了记录，又向我确认“无一字一句之差”。“竹入君，你可是日本人啊。”“什么话，地地道道的日本人！”“那好，我肯定去中国。”

在田中首相访华期间，虽然也出现了说“添了麻烦”之类令人担心的场面，但大致是在我所带回的中国方案的基础上形成了《联合声明》。关于日中关系正常化谈判有种种回忆录行世，最近仍然有“田中的密使”、“访华前与田中、大平详细磋商作成草案”之类的记述。我想尽可能

的让人了解实情，对中日友协的有关干部也作了说明，但他们表示"难以置信"。我是直到告诉邓颖超真相——"当年我带来的不是田中的方案，而是本人的私货"——并表示歉意之后，才从长期的愧疚中解脱出来的。

听其言，观其行

竹入开口自认其伪，无疑为研究中日关系史提供了极重要的材料。然而另一方面也不得不指出：所谓"和式基辛格"、"田中密使"的说法之所以在政界和学术界流传，其谬种当是竹入本人播撒的。中日签署联合声明以后不久，1972年10月5、6日的《公明新闻》登载了竹入的言论，自称"将日本政府的想法整理成大约20条，以约定田中访华为见面礼，我于1972年7月25日访问了中国。甚至拟就了日中联合声明草案才回来"；显然，"特使"的说法在这里已经呼之欲出了。而在中国，连当时参与会谈的人都认为竹入是"田中特使"，那至少可以肯定：竹入本人曾经作过闪烁其辞的表示。即便在上述《朝日新闻》的采访中，他一方面说当面向邓颖超道过歉，一方面还在作"中国方面把我误认为首相特使"之类自相矛盾的遁词。

竹入让人误以为他是特使，当然有利于提高他本人及其领导的公明党在中日两国的身价。因为中国政府只会对具有"基辛格"身份的人介绍关于中日关系谈判的设想乃至提出联合声明草案；对于日本政府来说，只有详细了解到中方条件的人才有价值。然而，日本政坛朝野间的斗争也是复杂的。当政府方面拿到竹入手中的中方草案后便撇开他拟出日方草案，并派员送达北京与中国政府进行初步协商。竹入对于自民党这种垄断中日复交工作的做法极为不满。据当时中日关系的重要亲历者田川诚一1972年9月14日的日记记载，竹入一怒之下向新闻界透露了他与周恩来会谈的部分内容。这固然可以理解为他是无奈才公开表示自己是为中日关系正常化作出了特殊贡献的人以求在日本国民中间赢得政治声望，也可以理解为因苦劳之后未获政府的相应回报而表现出的失态；但确是为了国内政治斗争而置国际信用于不顾的行为。

就中国方面来说，因为建国后一直推行"人民外交"，所以格外重视日本在野党在推动中日关系上的作用。1971年6月，竹入率公明党代表团访华，因与中日友协达成了以"一个中国"、"日蒋条约非法"、"反对美国驻兵台湾"、"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为内容的联合声明而受到中国政府的赞赏。9月，竹入在作了谴责"美日反动派"的讲话后遇刺受伤，周恩来、郭沫若等致电慰问，如此竹入更受到中国政府的信任。但正如竹入自己在纪念周恩来逝世15周年的文章中所指出的，他们这次访问的目的是"为使我党在选举战中获得进展"。当1972年来华交涉中日关系时，他则更失其左派风度而现出"地地道道的日本人"本色了。早在此一年之前他就讲过："我认为日本对中国负有赔偿责任。但由于我们今后为实现一个和平国家作出的不懈努力，可望中国方面在具体的赔偿问题上能有好意的表示。"在以"田中特使"的身份访华时，他不仅要求中方当面确认放弃赔偿要求，而且企图使中国在台湾问题上让步；中国政府在这一原则问题上没有动摇。但对于中国外交的教训是，竹入在一般言论上支持中国，但具体到涉及国家利益的谈判问题上则是"地地道道的日本人"了；而且他拿着自撰的文件以让中国外交人员误以为他是田中特使的方式，最终获得了中方的谈判方案并密报给田中角荣，结果日方有备而来，在谈判中就台湾问题、赔偿问题等着实跟中国胡搅蛮缠一番，直令周恩来总理也感到"简直不能忍受"，称日方的要求"是对我们的侮辱"，造成了即使中国放弃赔偿也看来是互有妥协的事实。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朝日新闻》也称这次采访报道"无疑将有益于探索从'友好与合作'向'摩擦与竞争'转变时代的日中关系"。我们应该对新的材料保持高度的敏感性以求对中日关系史作出深入实质的研究，而不能目迷于日本朝野某个时期的或友好或正义的主张。原外务省的官员证实：当年，田中、大平是抱定"如果中方提出赔偿请求就立即归国"的想法飞来北京的，似乎虽有竹入传言也未曾轻信。而在今天，希望中国放弃赔偿的竹入也来强调"日

本方面进一步树立正确的历史认识”的重要性了。在台湾问题上,日本政府也越来越表示出对所谓和平的关心。人们似乎可以自问:对于过去的侵略战争,从内心不愿承担赔偿责任的人能有怎样的“正确认识”呢?对于中国的台湾问题,根本不愿从正面承认的日本政客能唱出动听的中日友好吗?最近,日本政府既有令人警惕的“日美合作防卫范围包括台湾海峡”论,又有池田前外相“发展日中美三角关系”、桥本前首相“建立日中部长级安保对话制度”和“日本自卫队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应该加强交流”等等不易应对的合作姿态。这提醒人们:桥本前首相虽然在访华时回顾了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但日本谋求政治大国地位并由促使他国承认其自卫队为国际间对等的武装力量进而向军事大国发展的欲望已经不再受到克制了,甚至台湾也有被拉入日中关系或日中美复杂互动格局之中的危险。 (责任编辑 杨继绳)

书 名	作者或主编	定价	邮费
改变那个世纪的人和事 全套四册		67.20	8.00
之一 我的回忆	孙中山		
之二 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蔡元培		
之三 梁漱溟与毛泽东	汪东林		
之四 亲历一九五七	徐铸成		
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委员大辞典	中共党史出版社	285.00	20.00
林彪的这一生	少 华 游 胡	28.00	5.00
从陈独秀到毛泽东	冯建辉	22.00	5.00
庐山会议实录	李 锐	18.00	5.00
邓小平年谱	中央文献研究室	76.00	8.00
陈独秀风雨人生	朱 洪	28.00	5.00
扛起地狱的闸门	丁 群	21.00	5.00
梁漱溟问答录	汪东林	25.00	5.00
陋室漫笔	靳树鹏	21.80	5.00
刘少奇蒙难始末	图 们 祝东力	17.00	5.00
人民公社兴亡录	宋海庆	36.00	6.00
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	邓 野	29.80	5.00
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	吴 思	23.80	5.00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	戴 煌	28.80	5.00
第二次宣言	王小平	28.00	5.00
周扬与冯雪峰	徐庆全	28.00	5.00
红色第一家族	马社香	30.00	5.00
走出个人崇拜——一个年代的反思	冯建辉	16.50	5.00
断桅扬帆——蒙冤25年的公安局长	丁兆甲	26.00	5.00
特别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受审实录	图 们 肖思科	28.00	5.00
25年——1978–2002中国大陆四分之一世纪巨变的民间观察	王 安	26.80	5.00
抗战时期的蒋介石	江 涛	40.00	6.00
抗战时期的国民党军队	宋 波	40.00	6.00
侵华日军主要将帅的最后结局	朱晓艳 班惠英	40.00	6.00
食无禁忌	(美)巴里·西尔斯 比尔·劳伦	19.00	5.00
党史札记(一集)	龚育之	28.00	5.00
党史札记(二集)	龚育之	35.00	6.00

代购代邮

历史是一面镜子。读史可解惑,可益智。本社对读者函询较多的有关图书,开展代购、代邮服务。

《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委员大辞典》(1921-2003)本书系大型政治性资料图书,如实反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至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共1600余人的简历,为国内外读者了解建党八十余年来中共中央历任领导成员的有关情况提供翔实的资料。本书的编纂,注重严肃性和权威性,资料来源可靠,收录内容准确,编纂体例规范。

《陈独秀风雨人生》 陈独秀离开人世已经60多年了。每到春天紫色的蚕豆花开放之际,人们自然会想起因误食此花而病发的陈独秀,想到了当年不能左右自己命运的“老头子”的风雨人生。本书以30万字的篇幅,描述了这位中共领袖的曲折人生道路,并追述恢复其历史本来面目的历史大背景。

《改变那个世纪的人和事》 在刚过去的20世纪,那些让人记忆的历史太多太多,但本丛书让亲历者来讲述,就多了一份真实和一份况味。在这里你可以与徐铸成、于光远、蔡元培、陈独秀、朱德、杨振宁、林语堂、蒋梦麟等名家相遇,体味历史,重温记忆。

《食无禁忌》 本书的英文原名是《健康区》,讲的是如何搭配不同食物的比例,以达到激素平衡,从而进入“健康区”。美国斯坦福大学游泳队请本书作者制订菜谱,结果,1992年一举夺得八枚奥运金牌。据作者说,他推荐的食谱以1982年诺贝尔医学奖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对防治心脏病和癌症大有益处。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 编:100045
收款人:炎黄春秋杂志社

(注:邮购三本书以上,可按总书价的10%付邮费)

《大公报》在抗日战争中的迁移

● 郑连根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60 周年。八年抗战是一场全民族的动员，自然，报业在抗日战争中也同全国人民一道经受了苦难，付出了牺牲，做出了贡献。《大公报》在抗战中的六次迁移应该是极具代表性的——《大公报》是当年最具影响力的民营报纸，它在抗战中的六次迁移极其艰苦卓绝。

《大公报》最初的报馆在天津。东北沦陷之后，《大公报》的总编辑张季鸾敏锐地感到：占领东北后，日本肯定要进攻北平和天津，平津不保是迟早的事，必须未雨绸缪。到了 1936 年，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位创始人统一认识，决定在上海创办《大公报》，以接应天津《大公报》。这一年 4 月 1 日，上海《大公报》创刊，地点设在上海法租界。张季鸾发表社论说，《大公报》天津和上海两地发行，不是扩张事业，而是形势所迫。

1937 年 7 月 7 日卢沟桥事变之后，《大公报》于 7 月 9 日、7 月 10 日连续发表社论《卢沟桥事件》及《卢沟桥善后问题》，批评宋哲元对日妥协政策，坚决主张抗日，呼吁国民党北方当局"迅速决大计，上与中央连成一片，下与民众结成一体"；"否则退让复退让，畸形复畸形，士气何堪再用，地方成何体制！"7 月 28 日，日军进攻天津，天津告急。因对外交通断绝，天津《大公报》只能在市内发行。8 月 1 日，天津沦陷，8 月 4 日，天津《大公报》宣布停刊。《暂行停刊启事》写道："天津本报，决与中华民国在津合法统治同其运命，义不受任何非法统治之威胁。"

张季鸾

占领天津之后，日军又进攻上海。胡政之和张季鸾感到，上海亦非久留之地，"沪版必将继津版而牺牲"。他们决定沿长江西进，创办汉口《大公报》。上海"八一三"抗战爆发第二天，胡政之便电令南京办事处曹谷冰和天津《大公报》员工，分头火速赶往湖北，筹备汉口《大公报》。张季鸾提出要亲自去武汉创办汉口版《大公报》。至 9 月 18 日，汉口《大公报》创刊。于右任先生写来祝词："当我忠勇将士为国家之独立与民族之生存浴血苦战，以抗暴敌之际，诸君为国服务，于汉市分社发行新刊，举全国作战之心，壮前方杀敌之气，至佩至佩！"

1937 年 12 月 13 日，日军攻占了南京，南京大屠杀事件随即发生，日军犯下了滔天罪行。攻占南京的当天，日军便沿长江西进，直逼武汉。这个时候，上海成了孤岛。占领南京后，日本通知上海公共租界，要求所有的中文报纸发行前必须送审。此前，租界曾警告中文报纸必须立论慎重，不要刺激日军，但各报我行我素，照常发表激烈言论。上海《大公报》更是精心发表抗战文章，连续刊登范长江

率战地记者冒死采来的通讯。但此刻,日军态度强硬,租界唯日军是从。当晚,胡政之把王芸生、张琴南、李子宽召到办公室,大家一致赞同,宁可停刊,也决不接受日本人的检查!12 月 14 日,上海《大公报》发表了王芸生的两篇社论,宣布停刊,随后向武汉转移。在题为《暂别上海读者》的社论中,王芸生写道:“昨天又来‘通知’说:‘自十二月十五日须送小样检查,而不经检查的新闻一概不准登载。’我们是奉中华民国正朔的,自然不受异族干涉。我们是中华子孙,服膺祖宗的明训,我们的报及我们的人义不受辱,我们在不受干涉不受辱的前提下,昨日敌人的‘通知’使我们决定与上海读者暂时告别。”另一篇社论《不投降论》更是表达了大公报人炽热的爱国情怀:“我们是报人,生平深怀文章报国之志。在平时,我们对国家无所赞襄,对同胞无所贡献,深感惭愧。到今天,我们所能自勉,兼为同胞勉者,惟有这三个字——不投降。”

上海《大公报》停刊后,虽然有汉口版,但日军直逼武汉,汉口亦非久留之地,再度迁移在所难免。胡政之决定建立香港《大公报》,但是,香港版的创建并不顺利,由于英国当局的刁难,香港版《大公报》到 1938 年八一三抗战周年纪念日才创刊。胡政之在创刊号上说:“这一年的严重外患,毁坏了我们国家人民多少事业,本报是民族事业的渺小一分子,当然亦不能例外。然所幸者,不独心不死,人亦未死,虽然备历艰危,而一支秃笔却始终在手不放。”这个声明,再次表明了《大公报》同人“文章报国”的决心。

1938 年中秋,武汉大会战打响,蒋介石命令武汉报刊立即撤离。武汉《大公报》对撤离早有准备。1938 年除夕,曹谷冰就奉命到重庆筹备渝馆,经过三个月紧张工作,建馆事宜就绪。一旦武汉有事,《大公报》可以立即西迁。

1938 年冬,张季鸾在重庆新丰街创建了重庆《大公报》。新丰街处于重庆闹市区,数月后,日军以国民党军委为目标,大规模轰炸重庆闹市,《大公报》工厂被毁,不得不借用兄弟报刊的编辑部办公,并委托他人代印报纸。恰在此时,张季鸾病重,“笔政”转交王芸生。胡政之不得不从香港飞来山城,分担重庆《大公报》的行政事务。胡政之争分夺秒,在近郊李子坝选定新址,投入大量人力财力,重建重庆《大公报》。李子坝上接浮图关,下临嘉陵江。胡政之让人在离报社不远的半山腰凿两个防空洞,一个安排印报机,一个供员工防空。空袭中,只要把版排好,送入防空洞打版上机,就可保证出报。这种设计果然奏效,1940 年,日军倾其航空力量,对以重庆为中心的大西南,进行连续半年的狂轰滥炸,李子坝经理部办公楼被炸毁,印刷厂第二车间被破坏,但在半山腰防空洞里的印刷机却始终没有停转,重庆《大公报》的出版一天也没有间断。

随着日军的步步推进,胡政之断定香港版亦不可保,便在桂林星子岩租下 37 亩荒地,决计创办桂林《大公报》。1941 年春,桂林《大公报》问世,这已经是《大公报》的第六家报馆了。数月后,《大公报》的发行量竟跃居两广、湖南、贵州之首。与此同时,日军攻占九龙,香港《大公报》发表最后的社论,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与读者共勉,宣布停刊。但是,胡政之却被困在了香港,处境十分危险。离港之时,胡政之做了最坏的打算,他在棉袍里藏了三颗圆形铜扣,若被日军抓获,则当即吞服自杀,宁死也不受日军侮辱。幸运的是,胡政之后来乘舢板渡海,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回到了桂林。

1944 年,日军攻陷桂林,桂林《大公报》停刊,大公报人与难民一道,或爬上罐头车,或乘船,或徒步跋涉,最终撤入重庆。

在整个抗战中,《大公报》历尽艰辛,从北至南,从东到西,六迁其址。但是,《大公报》始终抱定一个念头:宁可停刊另觅新社址,也决不在日寇的刺刀下出一天报。

在抗战中,南京、上海、北平等城市的许多报馆都迁移了社址。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报业一方面要做好分内工作:报道战事进展,宣传团结抗战,鼓舞全民士气;另一方面,各家报馆还要安排迁移事宜,在战火纷飞之中,转移人员、运送设备决不是简单之事。所幸,即便在最艰苦的日子,中国的报业也没有中断一天。靠着那一代报人强烈的爱国心、事业心和艰苦卓绝的努力,中国的新闻事业才没有被日军摧毁。这同样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值此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60 周年之际,我们理应向当年的优秀报人致以崇高的敬意。

(责任编辑 吴 思)

日寇集中营真实故事

活人靶赵培宪——

·张耀杰

侵华日军设在山西太原的集中营，位于太原小东门街北巷的一所大院子里。这里曾经是阎锡山炮兵部队所在地，1941 年中条山战役之后，被改造成为被叫做太原工程队的集中营，由侵华日军的山西派遣军司令部直接管理。

太原集中营起初主要用于关押国民党和八路军的战俘，后来又被用来转移贩卖来自周边地区的战俘和劳工。

据史料记载，1941 年至 1942 年，敌后抗日战场出现了极其困难的局面。日军集中大部分的在华兵力，对敌后战场进行“扫荡”、“蚕食”、“清乡”和“治安强化运动”，给敌后根据地带来空前灾难。

1941 年 10 月，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人口只剩下 1300 多万人。抗日根据地的县城，只剩下涉县、黎城、平顺、范县、观城和阜平。八路军也由 1940 年的 40 万人，减少到 1941 年的 30 万人。

1942 年 5 月 24 日，日军集结 3 万人的部队，向太行山区的八路军总部所在地进行大扫荡。25 日，一万多名日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对八路军总部和中共北方局转移人员所在地十字岭，展开铁壁合围。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在率领警卫部队突围时英勇牺牲。

太原三分区政委孙雨亭，就是在 25 日的突围过程中被捕的，与他同时被捕的还有中共北方局统战部部长张友清等 200 多人。

在临时战俘营的审讯中，孙雨亭化名李成才，自称是驮粮食的马夫。张友清化名吴乃人，自称是马夫班长。

据孙雨亭在《战斗在太原日军集中营的党支部》一文中回忆，他和战友们是 1942 年 6 月 5 日被送进太原集中营的。7 月 23 日，日军把关押在集中营的 1000 多名八路军官兵集合起来，从中选取 500 人到所谓的“教化队”接受教化。年纪较小的孙雨亭，是被选取的 500 人中的一个。

几天后，“教化队”举行隆重的开学典礼，日军山西派遣军司令部的花谷少将到场训话：“你们是八路军，是红萝卜，红皮白心，良心大大的好，过去受了八路军的骗，从今天起，你们就是学生了，不是俘虏了，要好好学习，三个月毕业。毕业后，愿回家的回家，还可以当官做事。我们的官是大大的有。”

“教化队”的生活比工程队要好，可以吃饱饭，偶尔还能吃上白面和肉汤。在日军的威胁利诱下，一些意志不坚定的八路军战俘叛变投敌。

面对这种情况，孙雨亭联合原北方局青委彭梦庚、原 120 师 358 旅战火剧社社长张治等人，秘密成立地下党

支部，在难友中间针锋相对地开展工作，既保护了党内的高级领导干部，也保守了八路军的军事秘密。

就在孙雨亭等人在"教化队"开展地下工作的同时，太原集中营上演了极其惨烈的另一幕。

1942 年，日本国内送来一批新兵，其中有 340 人补充到驻太原的第 13 大队。

为了使这些新兵尽快变成杀人机器，大队长安尾正纲大佐遵照旅团长的训令，决定将教育检阅课中的假标刺杀，改为"实的刺杀"。太原集中营中的八路军俘虏，被选定为训练对象，训练地点在小东门外的赛马场。这里靠近东山，本是乱坟遍地的荒野，极易隐蔽。

检阅课进行了两次。第一次是在 1942 年 7 月 26 日，有 220 多名八路军战俘被集体屠杀。

几天后，第 13 大队又进行第二次检阅课。面对敌人的刺刀，50 名抗大女学员昂首挺胸，双眼圆睁，齐声高呼"中国人民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悲壮的呐喊响彻云霄，在场的日本新兵一下子被惊呆了。就在这时候，一名八路军战俘乘着混乱挣脱绳索，跳下土崖拼命向东山逃去。

日军发觉后派出士兵追击，并放出军犬进行搜索，最终也没有找到这场惨案中惟一的幸存者。他的名字叫赵培宪。

赵培宪脱险归队后，在 1942 年 8 月 21 日的《新华日报》华北版上发表文章，对日军残酷虐杀俘虏的丑行，予以控诉和揭露："我们的同志被成群结队的抽出去了，名义上说是修路，实际上给敌寇新兵做了练习刺枪的'活肉靶子'。7 月 26 日轮到了我们，下午三点半'戊'字号 80 个俘虏，被分成四批，从太原小东门向一个坟场的树林里走去。很快来了 100 多个全副武装的法西斯匪兵。把第一批二十个革命同志剥去上衣，背捆起双手，排成一字形，灭绝人性的法西斯匪徒们对着那些手足不能动弹的俘虏端起刺刀，'呀呀'地吼叫冲杀过去。我们是英勇的革命战士，继承八路军的光荣传统，不绝地怒骂，有的高呼口号，快到第三批了，我是第三批的第一个，衣服已经剥去，敌人用一根已牺牲的同志的裤带，背捆了我的手。敌人踢着我，叫我跪下，这时，我想：'不能像绵羊一样，被宰割啊，应该在临死之前和他们斗争啊！'第二批剩下的仅少数几个人了，他们由怒骂、呼喊，变成呻吟，无声地躺在血泊里了。当敌寇的刺刀刺在靠近我面前的同志的胸膛里未拔出以前，在这万分紧急的时候，我挣脱了绳索，跳过沟，一直背着敌人飞跑……"

已经改称"十八集团军"的八路军，以野战政治部的名义发出通知，追悼在太原集中营中惨遭杀害的烈士。《晋察冀日报》也为此事发表社论，控诉敌寇屠杀俘虏的罪行。消息公开后，引起世界各国的广泛重视，日军最高军事当局不得不停止这种训练，并对这场大屠杀的责任者，以泄密失职罪交付军事法庭。

1956 年，在太原审判日本战犯时，直接参与屠杀活动的住冈义一被送上军事法庭。他当年的职务是日军独立步兵第十三大队第四小队少尉小队长兼机关枪教育队新兵教官。据住冈义一交待："1942 年 7 月 26 日清晨，大队长安尾正纲大佐召集辅佐官会议。参加的有我和山本大尉等人，根据陆军独立混成第四旅团少将旅团长津田守弥的密令，大队长宣布，这次受检课中的假靶刺杀训练，改为活靶刺杀训练，以中国俘虏为对象。我很同意这个决定。……我身为教官，在检阅官面前，一定要做出成绩来，显露一下自己的才干。于是我命令一班接一班地继续下去。我还掏出手枪，对那些奄奄一息的人们，瞄准他们的脑袋，使他们脑浆迸裂。"

当时被用作活人靶的战俘，大部分是驻晋日军第一军在太行区"扫荡"时俘虏的八路军干部和抗大学员。日军知道其中有我党的高级干部，但是一直查不出来，认为这些战俘是抗日危险分子，已经不可教化，于是就以这种惨无人道的方式把他们给杀害了。

赵培宪和孙雨亭先后归队后，一直战斗在抗日战争第一线。作为率领部队直接攻占云南边陲的南下干部，他们后来都留在云南任职。1958 年以前，赵培宪曾任云南蒙自地委第二书记。

（责任编辑　吴　思）

书生司令马耀南

● 徐明远

在卢沟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烈士馆里，按时间顺序记载着：1939年7月22日，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司令员马耀南在桓台牛旺庄战斗中牺牲。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寇南攻上海，北入山东，中华民族面临危亡之秋。以长山中学校长马耀南为首的进步师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了黑铁山起义，组建了鲁北地区第一支人民抗日武装。这支人民的军队，在战斗中成长，由百十人的中学师生，迅速发展到有工农商学兵各界人士参加的五千人的队伍，并正式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马耀南被任命为司令员，霍士廉为政治委员。

一、赤诚爱国　探索光明

马耀南出生于山东省长山县（今邹平）的一个农民兼手工业的家庭。父亲为私塾教师，母亲也知书达理。他自幼就受到家庭中关于忠孝节义的传统教育。少年时代，目睹德国入侵山东，占领青岛，在山东土地上筑路开矿，为所欲为。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当局屈从帝国主义摆布，同意日本取代德国在山东的权利，年仅17岁的马耀南义愤填膺。他在日记中写下了“我们要把帝国主义赶出去，我们要做真正的中国人”的豪情壮志。他进入山东省立济南第一中学后，积极参加爱国反帝活动。他同进步同学组织了“反日会”和反对日本侵略的游行，并组织同学到商埠宣传抵制日货和查封日货。在省立一中期间，他还参加了山东早期的共产党人邓恩铭、王尽美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活动，接受到一些共产主义的启蒙教育。马耀南后来考入天津北洋大学读机械工程专业。在大学里，他是一位思想活跃、社会活动能力强的学生。他很快成为大学学生会负责人，并成为天津市学生联合会的负责人之一。为此，他有机会结识了天津市政府负责社团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张友渔。交往之中，张友渔着意从思想上给马耀南一些进步指引。当时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中国革命军正在南方顺利进行北伐。马耀南满怀革命激情参加了国民党，并很快成为天津市党部的领导成员。由于蒋介石1927年发动“四一二”政变，屠杀共产党人，使北伐受挫，革命夭折。马耀南参加国民党的初衷受到致命的打击，对国民党的倒行逆施到了忍无可忍的境地。在他1930年出席国民党的三大期间，又目睹亲历了国民党内贿赂拉票的腐败行径。他当机立断，宣布退出国民党。他回到天津，积极参加倒蒋活动。蒋介石便宣布马耀南“亲共反蒋”并通令缉捕。马耀南为逃避通缉，先是跑到河北永清县中学教书，嗣后，又被聘到南通大学任教。1933年，他受家乡长山县各界联名邀请，回到故乡出任长山中学校长。他立志为国家培育有用人才，走教育救国之路。在他出任长山中学校长后，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办学方针。他把挂了多少年的那块“学校重地、闲人免进”的牌子摘掉，一方面欢迎民众到学校参观，另方面还带领学生走出校门，或扫街或修路，加强同民众的联系。

二、乱世寻航　决心跟着共产党

有两件大事开阔了马耀南的视野。一件是中国工农红军进行的震惊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他经过了解和研究，认为共产党能够经历如此艰苦卓绝的磨难和有如此坚强的意志，是因为崇高的信念使然。他由衷钦佩，认为是一个大有希望的政党。另一件是1936年西安事变中，共产党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胸怀坦荡，不计前嫌，劝张、杨二将军释放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马耀南由此认为，共产党具有力挽狂澜的谋略。在紧要关头，具此高深的战略眼光和本领，是国家和民族的希望所在。

1937 年卢沟桥事变不久，北平和天津相继失守，日寇从南北两方进攻。马耀南决心投笔从戎，抗日救国。他在当年 8 月 15 日的日记中写道："上海炮火异常凶猛，全国已入血战状态。自顾尚在此安逸消闲，能不愧死！自即日起，当特别振奋，求有所报命国家，获取较大代价之牺牲，方不愧生世间。"正在此时，国民党方面也摆出了一副抗日的面孔，想利用马耀南在当地的影响，扩大国民党的势力范围。于是，宣布恢复马耀南的国民党党籍，声称同马共同抗日。马耀南当即表示："国民党要我，可我不要它！"

中共山东省委派往胶东开展工作的林一山同志来到了长山中学。林一山曾在长山中学任教。他此行是有意绕路长山同马耀南建立联系的。林一山见到马耀南，两人对时局进行了深谈，看法完全一致。林一山还根据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时局的宣言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向马耀南讲述了全国抗日的途径和前景。马听后感到十分振奋，并从中断定林就是一位共产党人。于是，马耀南便执意要求林一山留在长山组织武装共同抗日。林一山当即介绍马加入了中华民族抗日先锋队，并答应尽快另派人到长山同马合作。

中共山东省委派遣地下党员姚仲明、红军干部廖容标和地下党员赵明新三人先后到长山中学，并建立起以姚仲明为组长的党小组。从此，在古老的长山城中，以长山中学为中心的抗日救亡活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三、筹划抗日　连挫特顽

姚仲明、廖容标和赵明新到达长山，马耀南安排他们三人为长山中学的教员。马耀南对姚仲明他们三人表示："你们就放手干吧，国民党县党部和县政府来找麻烦由我顶着。"

在马耀南的策划下，以长山中学为基地，办起了"民众夜校"。由马耀南任校长。名为夜校，实则从各乡调集进步青年接受游击战的训练，为组建抗日队伍培训骨干。国民党方面听到消息后，渲染"长山中学被赤化了"。县长周某亲自到学校见马耀南。由于马耀南在地方上的崇高威望，周县长见了他也不得不装出一副笑脸说："马校长，听说长山中学办起了'民众夜校'，把全县的小学教师都调集来受训。马校长是不是有点超越长山中学的职责了？"马耀南当即严肃地回答："我们办的是民众夜校。任何民众都可以来学习，教育还分什么界限?孔老夫子也说'有教无类'嘛！我倒要问周县长，民众上夜校，长知识不应该吗？中学办夜校又犯了哪一条法规呢？"周县长被问的语塞，哼哼唧唧，一时难答，但又吞吞吐吐地说出："听说，有人讲的不是什么知识，是共产党的统一战线。还讲什么游击战知识。这不是在搞赤化吗？"马耀南对周说："现在国共合作，致力于全国共同抗战。不讲游击战，日本人来了怎么打？我们讲联合各界民众一致抗日，这不仅是共产党的统一战线，蒋委员长不是也号召'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都有守土抗战之责？'照周县长说的，连蒋委员长不是也在宣传赤化吗？"周某被马耀南堵的无言以对，只好说："那就请马校长好自为之吧。"

不久，周县长又拿出了一招，勒令长山中学立即停办。马耀南也不示弱，他质问停办理由。周某用"面临日军到来，不再办学"去搪塞。针对周县长和县教育科长期贪污教育经费这一弱点，马校长提出召开县参议会，审议并公布历年县教育经费，然后停办长中。马校长这一招还真灵，周县长闻之，像老鼠见猫一样，恐出丑闻，便立即收回停办学校的成命。

四、铁山举义　初战告捷

1937 年 12 月 24 日，日军飞机轰炸了长山城，炸弹落在了长山中学和县政府附近。国民党县政府和县武装大队随之南逃，社会一片混乱。长山中学的党组织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把师生拉到长山九区的卫固一带进行抗日，并打出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的番号。会议还决定由马耀南任司令，廖容标任副司令，姚仲明任政委。会后党组织把这些决定向马耀南做了通报。马耀南表示完全同意，认为是到正式组建队伍的时候了。次日，他们分头行动。姚、廖带领师生去卫固，马耀南赴二区和八区联络人员和筹备粮款。姚仲明和廖容标带着百人师生到达卫固黑铁山下的太平庄住了下来。第二天在村小学集合全体师生，姚仲明宣读了《告同胞书》，宣布建立中国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又过了一天，马耀南从二区赶到了太平庄。姚仲明、廖容标和赵明新赶紧迎上前去同马耀南握手，他们在这里汇合了。四人虽然只有三天未见，却如三秋。马耀南急切地问学生情况如何，姚仲明说："廖容标同志已把学生编了队，情绪都很高。当前面临的大问题有二。一是吃饭问题，学生百人，给养无来源。二是

武器，全队只有三支枪，赤手空拳难打鬼子。”马耀南即拿出了他带来的三支手枪。一支给了廖容标，一支给了赵明新。廖、赵拿到手枪当然如获至宝。然后，马耀南又拿出筹来的500元大洋。他说“先解决学生的吃饭问题。饭一天不吃也不行。”姚仲明和赵明新接过500元大洋，高兴地说“这500大洋可是我们五军的最大财富啊！我们可不能轻易花掉。”接着，姚仲明和赵明新请求马耀南出面，动员九区的地方名流募捐粮食、给养和钱财，先解燃眉之急。第二天，赵明新便召集来20多名当地乡绅、商家和大户开会。马耀南先向他们讲了当前的战局，然后说，长山中学的师生不甘当亡国奴，来到黑铁山，拉起队伍，准备抗日。但军队初建，没有财源，没有粮食。他请求当地乡亲大力支援。他说，国难当头，抗战救国，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粮出粮。他希望乡亲们慷慨解囊，并带动全区人民，大力支援五军，日后必以抗日杀敌报答。与会者纷纷表示，师生们为了救国，为了长山县乡亲们的安危，抛家舍业，到此建队抗日，深受感动。捐助钱粮是分内的事。从此，以卫固镇为首的各村，每天都有组织或自发地向五军送给养或粮食。卫固镇的商号还捐募了一百大洋。五军的给养供给暂时有了保证。

五军的旗号打出之后，就像一块巨大磁石，吸引着四面八方抗日救国的有志之士。他们纷纷向黑铁山聚集。原长山县政府所属的武装大队，与南逃的县政府失去联系，为求生存，也投奔了黑铁山。马耀南和姚仲明从团结各界人士联合抗战出发，当即表示欢迎。这样一来，五军编了三个中队，队伍近400人，有枪200余支。

刚过了1938年元旦，日军占领了长山城。为鼓舞军民斗志，打击日军的嚣张气焰，在马、姚的策划下，由廖容标率30名队员，化装成农民，夜袭长山城，且一举成功。守城的33名伪军被一网打尽，收缴步枪17支和一些弹药。此后不久，五军又在小清河上的陶唐口伏击了日军的一艘军船。日军地区司令松井山林中将为首的12名日军全部被击毙。两次胜利，鼓舞了五军士气和群众的抗日热情，同时也震动了山东的日寇。日寇除了发兵报复，把一个百十户人家的陶唐口村烧了个精光之外，就是寻机消灭五军。然而，五军在同日军的交火中，屡战屡胜，越战越强。日军的嚣张也不得不暂时收敛。为了扩大战果，联合更多的人抗日，1938年3月，马耀南召开了有邹平、长山、桓台、淄川、章丘五县代表参加的联合抗日会议。他在会上说，当前形势越来越清楚，要抗日救国，只有按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才能成功。纲领中要求团结一切愿意参与抗日的力量，不分党派，不分阶级，结成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一致对外。他认为，国难当头，中华民族有志儿女，有良心的中国人，都要一致抗日，各方面人马应以抗日为目标，团结联合，增强抗日力量。各界人士要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枪出枪，有粮出粮。在这民族危亡之际，不挺身而出等待何时？会议经过各方代表讨论，一致决定，各县新建武装都以五军为中心，统一编制，统一指挥，团结一致，联合抗击日军。

这次五县联合抗日会议，把鲁北地区的抗日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除与会的五县外，北至青城、高苑，西至历城，东及临淄、广饶等县的各类武装，也都陆续

由左至右依次为：马天民、马耀南、马晓云

向五军靠拢。至1938年4月，五军队伍扩大到5000人之众。经过统一编制，组建成七个支队，下辖30个中队。其中第一支队司令员马天民是马耀南的三弟，第七支队司令员马晓云是马耀南的二弟。因而，在抗日战争中鲁北地区人民皆称之为"一马三司令"，并广为流传着称颂马家三兄弟的歌谣："一马三司令，得了抗日病。齐心打日本，保卫老百姓。"

五、五军整编　耀南入党

1938年5月，五军攻克了邹平城。在马耀南主持下，邹平第一次选举了县长。五军各支队还几次攻打周村、张店、长山、桓台等城镇的日军据点，并不时沿胶济路炸火车，破坏铁路。在这一月，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山东省委改组为苏鲁豫皖边区省委，由郭洪涛任书记。边区省委决定，在鲁北地区建立清河特委，由霍士廉任书记，杨国夫任军事部长。边区省委还根据党中央指示精神，对山东各地起义部队进行整编，统一使用八路军支队的番号。对鲁北的抗日救国军第五军，则改编为八路军第三支队，并以新建的中共清河特委的干部为基础，参与三支队领导工作。由于部队来自四面八方，成分比较复杂，霍士廉和马耀南估计到，要正式编入八路军序列，可能不太顺利。果然，在改编会议上，五军的四支队队长张景南和三支队队长高竹筠先后表示反对。他们说，八路军的防区在陕西，五军是邹平、长山地区武装，只在本地守土抗战，不能接受八路军番号。经马耀南和杨国夫耐心讲道理，他们很勉强不再说话。随之，1938年6月16日在邹平城举行了五军整编大会。霍士廉宣布，山东抗日救国军第五军正式整编为八路军第三支队，司令员马耀南，政治委员霍士廉，副司令员杨国夫。下辖三个团一个营。全体指战员对整编热烈欢呼表示拥护。但是斗争未结束，张景南和高竹筠阳奉阴违，整编大会后不久，即同沈鸿烈勾结，并公开叛变，拉上队伍投向国民党顽固派。至7月末，他们探得八路军三支队大部队由杨国夫和霍士廉带到临淄，三支队司令部空虚，便在一天拂晓发起偷袭，叫嚣要把三支队司令部一锅端。在张景南指挥下，他们很快冲入司令部，马耀南司令在敌强我弱，面临危难的情况下，沉着镇静，指挥警卫人员坚守司令部，并英勇顽强，先后三次把冲入的敌人打退。最后是七团长马晓云及时带来援兵，方得解围。

马耀南身为司令，始终坚持平易近人与士兵同甘共苦。他待士兵一贯像兄长待兄弟，老师对学生一样关心爱护。原来长山中学的学生兵，仍然亲切地喊他马校长。部队到了缺水的山区，找到一点水，都要分着饮，马司令从不例外。有的山区群众吃的是"湾水"，也就是村边池塘里流聚的雨水。部队到那里，都要同群众一样吃"湾水"。有的战士不习惯，马司令就带头喝。马司令口腔生疮，吃煎饼难咬。司务长为他炒个鸡蛋，受到严厉的批评。最后，只好把鸡蛋给别的病号吃。

马司令善于对每次战斗进行总结，从中找出成功和失败的经验与教训。因而他由一介书生迅速锻炼成为一位机智勇敢、多谋善断、指挥得当的军事指挥员。在他经历和指挥的几十次大小战斗中，绝大多数他都是胜利者。

1938年10月，由边区省委书记郭洪涛和特委书记霍士廉介绍，马耀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六、壮烈殉国　功垂千秋

1939年6月初，日军纠结5000余人，配有各种炮10余门，汽车20余辆，突然包围了驻守在邹平县刘家井一带的三支队。敌人大兵压境，三支队处境十分险恶。在马耀南司令和杨国夫副司令的指挥下，我军上下同仇敌忾，顽强反击日军，并多次同日寇进行英勇悲壮的肉搏战。最后，毙伤日军井口司令以下日伪军共800余人，随之撤出战斗。当年7月21日，部队转移到桓台县牛旺庄，又遭日寇三面包围。我军经一昼夜英勇战斗，决定向东转移。并决定马司令先撤，杨副司令掩护、断后。22日当马司令一行骑马撤到紧靠牛旺庄东侧的大寨村时，突遭日军伏兵射击。马司令身负重伤落马，爬行到一墙脚，用手枪击毙数名日军。当一日军企图用刺刀杀害马司令时，马司令用最后一颗子弹把那敌人的手臂打断，并拖倒敌人用手枪击破敌人的脑壳，自己也因流血过多而壮烈殉国。年仅37岁。

为纪念马耀南司令为国捐躯，中共清河区委于1943年将清河区抗日中学命名为耀南中学。笔者有幸在此受业。1946年中共渤海区党委命名长山县为耀南县。

（作者系中国驻斐济前大使）

（责任编辑　吴　思）

我在新四军教导总队的学习生活

● 吕 炯

1938 年 8 月间，旌德地下党先后动员了 20 多位进步知识青年到皖南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教导队学习。到了军部教导队以后，我被分到第六队。队部发给我们每人一套军装、一副绑腿、一条薄薄的棉被、一支步枪和若干发子弹、一条米袋子和一双自己编的草鞋。这样，我们俨然就是一个革命军人了。

新四军教导总队是一所"抗大"式的新型干部学校，专门训练军队和地方党的干部。教导队为什么不采用"抗大"分校的名称呢？这是由于当时军部所在地——泾县云岭是处在国民党统治区。国民党不准我们办"抗大"式的干部学校，不准我们发展抗日力量，故只能以教导总队名义办校。总队长是军部副参谋长周子昆兼任，教育长冯达飞，政治处主任余立金，训练处处长薛暮桥，队列处正副处长朱毅、张元寿。总队共有两个大队，一大队为军事队，二大队为政治队。一、二、三、四、五队为一大队，六、七、八、九队为二大队，八队为女生队，九队是高干队。每个队队部有队长、政治指导员、通讯员、司号员等，并建立了党支部。支部和党员都不公开，支部书记不设专职，由政治指导员兼任。每个队有三个排，每排有三个班，12 人编为一班。排长以上干部都是红军干部，班长由学员担任。五、六两个队都驻在中村董家祠堂，我在六队学习。六队队长是张闯初，政治指导员是高歌，各个队设有军人俱乐部，六队俱乐部主任是学员庞文熙（大学生），另设学习委员、文娱委员、墙报委员、宣传委员、组织委员、生活委员，开展各种活动。

教导队的学员，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从前线部队中抽调来的红军战士和少数干部；另一部分是从浙江、上海、江苏、安徽等地来的青年学生，还有少数华侨进步青年，全总队共有学员约一千二百多人。进了教导队以后，我们一开始就过着军事化、战斗化的生活，要求很严格，纪律性很强。不管白天、黑夜，每个学员都要持枪轮流站岗、放哨（每晚总队部都给各队规定有口令），队部派岗、换岗都以点香来计时。一根香点完了，换一班岗。我们睡的是地铺，吃的是大锅饭，可是每个学员革命热情是很高的，精神上是愉快的。我们六队学员中，还有两名外国人，一名是泰国人，另一名是新加坡人。他们都会说中国话，只是不太流利，和我们同

1939 年春，周恩来到皖南新四军军部传达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后同军部人员合影。前排左起：9 为袁国平，10 为李一氓，11 为周恩来，13 为陈毅，14 为周子昆，15 为粟裕，16 为希伯（波兰人），17 为叶挺，19 为项英，20 为邓子恢，21 为朱克靖，22 为赖传珠

样过着严格的军事生活。

教导队的校训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字。教导队教学方针、教学计划、课程设置和延安“抗大”一样。课程有六门:周子昆讲“抗日游击战争”,王淑明讲“社会发展史”,薛暮桥讲“政治经济学”,张语寰讲“统一战线”,彭柏山讲“民运工作”,还有哲学课,讲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讲得通俗易懂。专职教员还有夏征农、杨采衡、陶白等。军事课除了在课堂听课外,每天还要到大操场进行操练。军事课,杨采衡讲“班、排、连战斗、战术”,还要进行实地操练,如学打靶、刺杀、射击、投弹和实弹演习等,有时还要进行军事演习,夜间有时进行紧急集合。对于一名革命军人来说,武器就是我们的生命,队部规定我们每周要擦一次枪,我们学员都会擦、会拆、会装、会使用。

军事化的生活,锻炼和培养了我们每个学员的坚强意志和实际作战能力。敌机经常来云岭军部驻地空袭、骚扰,我们除在驻地挖了防空洞外,白天经常到附近山上、树林里上课。行军时为了使敌机发现不了我们,避免飞机扫射、轰炸,我们头上戴着用柳枝扎的伪装。上课没有凳子,我们就用稻草编个草垫子席地而坐。教导队学员的生活是艰苦的,学员每人每月发给三元津贴费作为零用,买点生活日用品。国民党第三战区有时扣发我们的军饷,学员就领不到津贴费。学员每人每天的伙食费只有一角三分,由于管理排长善于安排,伙食不仅吃得不错,有时每月还可以吃一次“伙食尾子”(即结余的伙食费分给每个学员)。尽管学习条件差,困难很多,我们都能坚持学习,劲头很大,把学习、训练当作一项革命任务来完成。

我们还经常到云岭陈家祠堂(也是军部大会堂),听军部首长作报告和参加联欢晚会。每个星期六下午,军部都要举行一次联欢晚会。在大会主席台上站着的军部首长有叶挺军长、项英副军长、张云逸参谋长、周子昆副参谋长、袁国平主任、邓子恢副主任、冯达飞教育长,还有林植夫(敌工部长)、朱镜我(宣教部长)等。军部首长经常给我们作报告的有叶挺军长、项英副军长、袁国平主任等。支队首长从前方来军部开会时,也经常给我们作专题报告,如陈毅司令员、粟裕副司令员讲前线抗战形势和我军前线战士与日伪军作战的英雄事迹,讲得生动感人,使我们受到很大的教育和鼓舞,至今还有深刻的印象。

有一天上午9时许,我们正在大操场上操,突然见到叶挺军长和美国著名进步女记者艾·史沫特莱从远处向我们走来。我们全体肃立,向叶挺军长和艾·史沫特莱女士行了一个军礼,表示热烈欢迎!艾·史沫特莱对我们说:“新四军教导队是一支革命的部队,我要把教导队的活动写一本书,告诉美国人民,使美国人民了解支持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说完,给我们全体学员照了相。

说起联欢会,就想到音乐家、军歌作曲者何士德手持指挥棒指挥我们唱《新四军军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大刀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在太行山上》、《延安颂》、《黄河大合唱》等革命歌曲的情景。还有任光和安娥演唱的讽刺滑稽剧《王老五卖梨膏糖》,不断引起全场战士们的哄堂大笑和热烈鼓掌的情景。

学习期间,特别荣幸的是我们见到敬爱的周恩来副主席。周副主席于1939年2月来到皖南军部视察。消息传开后,全队都沸腾起来。军直各单位原来没有挂孙中山像,周恩来副主席来到军部以后,就指出要挂孙中山像。因为当时是处在国共合作时期,这就说明我们是拥护国民政府的,坚持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讲统一战线是真诚的,联合抗日是坚决的。

1939年2月的一天,在军部召开的联欢晚会上,我们见到了周恩来副主席,他上身穿着浅蓝色的军装,下身穿的是马裤,腰间束着武装带,精神抖擞、神采奕奕,目光炯炯有神,态度和蔼可亲,平易近人,表现出一副革命政治家的风度,他频频向大家挥手致意。会场上歌声四起,啦啦队非常活跃,气氛十分热烈。

经过6个月的学习,我们提高了阶级觉悟和抗日热情,树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为中国革命奋斗到底的决心。

自1938年至1941年1月,教导队共举办了5期。先后培训了军队和地方干部共有四五千人,为前方部队和地方党输送了一大批各类干部,充实和加强了部队和地方党的骨干力量。这样就大大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教导队的训练工作,在党中央和东南局的领导下,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教导总队成立至今已60周年,“皖南事变”中虽然教导队的大批战友英勇牺牲了,但突出敌人重围的战士们继续坚持战斗,新四军又不断发展、壮大起来,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为解放全中国做出了不朽的贡献。建国以后,这些干部都成为我党、我军的高级干部,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以及改革、开放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也是当年新四军教导总队所作出的革命的历史贡献! (责任编辑 吴 思)

韩国光州518事件25周年祭

● 詹小洪

一、“518”事件来龙去脉

1980年5月18日，韩国爆发了震惊世界的“光州事件”，迄今25周年了。笔者在本文中根据在韩国搜集到的资料和实地考察所得，力图首先再现这个历史过程。

1979年10月26日朴正熙被部下情报部长金载圭刺杀，由崔圭夏任代总统，韩国出现了一个短暂的“汉城之春”。但好景不长，实权还是掌握在军人手中。11月24日，140名民主运动人士因要求民主而被逮捕及拷问。12月12日，又一位军界强人全斗焕发动了“肃军政变”，继续实行独裁统治。不久，金大中等民主人士发表了《促进民主化国民宣言》，要求全斗焕下台。1980年4月中旬，全国爆发了工人及学生示威浪潮，要求民主。5月初全斗焕政府公布了戒严令，宣布在汉城取消一切政治活动，禁止集会游行。但民众示威浪潮随之更扩大，要求撤销戒严令和全斗焕下台。5月15日，约10万名大学生在汉城集会，向军政府示威。5月16日光州也有3万名学生与市民示威。5月17日，全斗焕宣布《紧急戒严令》，进一步扩大戒严范围至全国，禁止一切政治活动，关闭大学校园，禁止召开国会，禁止批评国家元首，还拘捕了金大中、金泳三等民主运动领袖和学生。

1980年5月18日凌晨，全斗焕调数万军队组成戒严军分六路包围了韩国全罗南道（相当于中国的省）首府光州市，甚至动用飞机空运军队。当日上午10点，在光州民主运动大本营的全罗南道国立大学，戒严军与学生发生了第一次冲突，军队打死学生数人、逮捕多人。激动的光州学生和市民奋起抗争，聚集于全罗南道道厅（相当于我们国家的省政府）前广场，拉开了“光州518抗争”序幕。一句“到道厅去”成了当年最激荡光州市民的口号。学生与市民以道厅为中心，到光州火车站、高速巴士总站等地阻拦戒严军进城。军队向人群开火。5月20日晚，20万人在道厅集会、示威。市民组织了200多辆出租车、公共巴士突破戒严军封锁线到道厅助威。戒严军切断了光州与外界的联系，担心失控，21日凌晨向示威人群开火，造成54人死亡。21日，多达30万的老百姓来到道厅，广场及周围的锦南街、忠壮路都挤得水泄不通。一个青年站在戒严军的坦克上，挥舞着国旗，高呼“光州万岁”，市民围在一起高唱国歌，军队射杀了这位热血青年。愤怒的市民成立了“民众抗争本部”，进行长达一周的有组织有系统的对抗活动：

组织市民军，与戒严军武装对抗。他们从警察局和军队那里抢夺了部分武器，与军队开展了街垒战，占领了道厅。市民军迫使戒严军一度撤回到郊外。整个抗争期间，还训练市民使用枪械。由于有武装冲突，所以后来也有历史学家称作“518暴动”或“518起义”。

成立市民收拾对策委员会。与政府当局谈判：让死难者家属认领抗争者尸体、戒严军释放被捕的民众并撤出道厅及市中心、市民军交出武器。

组织救援、发动募捐、提供后勤保障。为抗争人士提供食物及日常补给。医生、护士全力抢救受伤者，连娼妓都为伤者献血。

23、24、25日连续三天晚上数万市民在道厅广场召开“守护民主市民大会”，决心与军政府对抗到最后一刻。

突破军政府新闻封锁，向全国说明光州事件真相。政府控制的光州各媒体不仅不客观报道事件的进展，还歪曲事实。市民纵火焚烧几家电台和报社，并自己编发了《民主市民会报》，向全国发

布光州抗争消息，如实地揭露戒严军的暴行。

市民占领道厅开展全方位抗争以来，僵局持续了不到一周，美国的态度使局势出现了剧变。向来以支持民主自由运动祖师爷自居的山姆大叔，可没有支持韩国大学生的民主运动。据韩国学者说，全斗焕调军队到光州就得到了美国的默许。因为，根据50年代签订的韩美同盟，韩国军队的指挥权在驻韩美军司令部手中。27日，美国国务院发表了“不能坐视南韩的无秩序和混乱”声明，正式容许全斗焕军政府军事镇压抗争者。数千名军人开着坦克进入市区，尽管有市民卧路阻挡，但坦克仍然肆无忌惮地压过他们入城。戒严军占领了道厅，枪杀了最后一批不肯撤出道厅主楼的20多名学生和市民。光州“518”运动以被残酷镇压而告终。这使本来反美情绪就很重的韩国民众更增加了对美国的仇恨。

值得一提的是，韩国教会在整个“518”运动中起了积极的作用。正是5月18日这一天，学生们在天主教会大楼前举行了首次静坐示威。整个抗争期间，天主教会设立了广播站，向全国揭露了戒严军滥杀无辜的暴行，颂扬了市民们的正义行动。光州事件被镇压后，持续报道“光州五月事件”。光州基督教医院、红十字会医院等教会医院组织了对受伤者最及时的救助。

据官方报道，光州事件造成了191人死亡，122名重伤，730名轻伤。直接经济损失为2200万美元。但间接损失无法统计，导致了韩国战争结束后，政府实施经济增长计划以来的第一个负增长年。

光州518事件平息后，全斗焕政府在全国疯狂地镇压民主运动，白色恐怖笼罩着韩国。5月28日逮捕了几千名参与民主运动的市民，并以“光州事件的幕后操纵者”的罪名判处金大中死刑。1980——1983年，有700多名新闻工作者因要求新闻自由而被政府勒令退休。1980-1986年，每年都有相当多的大学生因政治诉求被开除。

“518”运动的正名。“518”运动被镇压后，摄于政府高压，韩国新闻媒体只得选择沉默。政府在提到这个事件时，只轻描淡写说是“光州事件”或“光州暴乱”。韩国争得1988年汉城奥运会举办权，大大推进了民主化进程，为“518”正名迎来了曙光。这时，反对党的改宪运动如火如荼，特别是1987年6月，百万人走上汉城街头要求改宪。军队已经无法再压制民主运动。韩国军政府在内外压力下，也为了改变世人对自己的政治形象，被迫接受宪改方案，采用总统直接选举制，独裁统治在韩国终结。全斗焕下台后，紧接着，1988年，光州“518”事件很快就被国会重提。1993年第一位非军人总统，金泳三上台，承诺为518运动死难者建立国家公墓。1997年，他签署“518”运动特殊法令，正式为“518”运动正名，为死难者家属支付赔偿金。对镇压“518”事件的元凶两位前总统全斗焕、卢泰愚以内乱罪课以重刑。不过后来又对他们实行了赦免。

可以说，是光州“518”运动敲响了韩国军人独裁统治的丧钟，加速了民主政治的到来。

二、“518”运动对韩国社会的深远影响

我是1979年上大学的，那时我国与韩国尚未建交，中央电视台每天的新闻联播中有限几分钟的国际新闻，很多时间都是用来报道和播放韩国（那时我们称之为南朝鲜）大学生反美示威而与防暴警察对峙的消息和画面。一直到1980年5月，终于听到韩国军政府动用数万大军镇压了赤手空拳的学生的消息。那以后，我一直对韩国学生运动在推进韩国政治民主化过程中的作用有着浓厚的兴趣，弄清“518”运动的来龙去脉一直是我的愿望。一个偶然的机会，笔者于2003年至2004年来到光州这座韩国人引以自豪的“民主之城”的朝鲜大学讲学一年，在这期间，得以寻访“518”事件发生地，多次上“518”国家公墓凭吊死难烈士，与当年518运动的参加者、现在我的同事、朝鲜大学的教授们座谈“518”运动的意义。感觉到，“518”犹如一个咒语，在光州乃至整个韩国国民心中留下了深重的创伤，至今还难说完全平复。

光州城有许多地方以“518”命名：如“518”民主广场（就是全罗南道道厅门前的广场）、“518”纪念公园、“518”自由公园、“518”陵园、“518”公墓等。“518”公墓是1997年落成的，那时才得以将分葬在几处的烈士遗体归葬一处。每年的“518”这天，韩国总统都要来这里发表讲演，缅怀长眠此地的烈士们对韩国政治民主化的贡

献。2004 年 5 月 18 日下午，两个学生驾车陪我到达墓地，公墓坐落在光州的东南角，占地数百亩。最引人注目的是其主体建筑，位于墓地中央的是“518”民众抗争追思塔。下面数百座坟墓的碑文上写着死难者的姓名、生卒年月。大多数是 1960 年前后出生的大学生，死时仅 20 岁上下。公墓内还有一座“遗影奉安所”，供奉着“518”事件中死难者的遗像灵位。更使人震憾的是公墓内还有一个资料馆，周而复始不停地播放着“518 真相”的录像片，长达一个多小时。几乎是原汁原味地再现了那段血淋淋、惨不忍睹的历史。可惜我一句也听不懂解说词。因为这些录像中不时有英语、日语的解说，显然是当时在现场的外国记者摄录下来的。那天的公墓现场，被数不清的花圈、挽联覆盖着。前来悼念的人络绎不绝。2004 年 5 月 18 日上午卢武铉总统来发表了重要的讲演。笔者目睹了许多死难者亲属跪在坟头悲痛欲绝的惨景。听一个韩国朋友说，从市中心通往墓地的一条主路被称作“眼泪之路”，每年来此扫墓的市民们没有不痛哭流泪的。

韩国国家公墓里的“遗影奉安所”

每年的“518”前一周，整个韩国都在纪念“518”运动：电视有专门报道，报纸有专栏。大学校园内满是五一八主题的各种报告会。光州市中心的道厅门前广场（现在叫“518”民主广场）连续几天有纪念“518”运动的大型晚会。整个锦南大街（正对道厅，是光州最繁华的大街）都布置成当年“518”的场景。马路的两边挂满了当年的照片：有随着坦克开进城的头戴钢盔的士兵、有士兵闯进当年学生运动中心全南大学搜捕学生会领袖的恐怖、有市民支援学生的场面，有市民军与戒严军对峙的场面。大街上扔满了被践踏的小幅美国星条旗，市民以示抗议在 1980 年“518”事件中，美国充当独裁军政府帮凶，镇压了这次学生民主运动。

当年“518”运动的参加者很多今天已经是韩国政坛的核心人物。近几年，韩国政坛有个“386 世代”的说法。“3”指的是他们的岁数，这个群体大都三四十岁年龄；“8”指的是 20 世纪 80 年代，正是这个群体的人上大学时期韩国独裁统治转向民主政治的动荡年代。“6”指的是 20 世纪 60 年代，他们是这个时期出生的。“386”人士大多积极参加了当年的“518”运动。他们思想左倾、主张社会正义，代表社会进步的力量，而与亲美的保守势力针锋相对。卢武铉说“386 一代人是改革的核心力量”。在 2003 年卢武铉上台时，总统的参谋班子（指青瓦台的秘书们）大多数是“386”世代人。而卢武铉总统、李海瓒总理及政府很多部长在“518”运动时期多是激进民主运动的律师、劳工运动专家、民主运动领袖人物。他们当年正是为被捕入狱的学生（后来的“386”世代人）辩护而名声大噪，或与“386”世代人有师生之情。他们上台后重用“386”人士也很正常。不过，金融危机后，韩国经济一直不太景气，保守派批评道，这与金大中、卢武铉两届左翼政府重用“386”世代人不无关系，他们只会玩政治，不会弄经济。攻击他们这些运动圈人士，只会搞革命，不会搞建设。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　吴　思）

纳粹德国"崛起"如何成为灾难

● 黄 钟

1945 年 4 月 30 日，56 岁的希特勒自杀。5 月 7 日，存在了十二年四个月的第三帝国，签下了无条件投降书。5 月 8 日午夜，鏖战了五年八个月零七天的欧洲迎来了和平。炮火和轰炸停止了，但欧洲已是断垣残壁。这对六十年后热爱自由和和平的人来说，依然是一场挥之不去的梦魇。

"阿道夫·希特勒是世界历史上可怕的人物。"一位当代的德国历史学家如是说。然而纳粹德国给世界带来六十年前的那场浩劫，却不仅仅是因为希特勒品性的缘故。

1933 年 1 月 30 日，兴登堡任命希特勒为德国总理。纳粹党从在野党一跃而成了德国主要的执政党。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是在危机中执掌大权的。1939 年 9 月 1 日入侵波兰的时候，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使得二十年前惨败的德国，又重新崛起成为欧洲大国。

可以说，刚刚上台的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面对的是一个经济凋敝的德国。可等到战后，纳粹德国的名将古德里安在回忆录里依然可以大言不惭地说，德国在希特勒独裁之下获得了一些卓越成就，其中一项就是"失业现象消灭了"。如果不因人废言，平心而论，这位战犯的话并不是简单的自吹自擂。希特勒的执政经历表明，独裁统治可不是任何时候对任何人都面目可狰。

1933 年希特勒刚上台时，德国经济几乎陷于停顿状态，失业人数高达 600 万，如果加上 400 万临时工，算上家属，德国 6600 万人口中，几乎一半在饥饿和贫困线上挣扎。1933 年 2 月 1 日，也就是希特勒上台的第三天，他就在广播电台发表《告德意志国民书》，声称政府要"拯救德意志的农民，维持给养和生存基础！拯救德意志的工人，向失业展开一场大规模的全面进攻！"这不仅仅是新官上任三把火似的政治口号。事实上，通过纳粹当局的努力，到 1938 年德国失业率仅 1.3%，而同时美国失业率为 1.89%，英国为 8.1%，比利时为 8.7%，荷兰为 9.9%。用纳粹党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创造了"消灭失业的经济奇迹"。

在着力解决就业问题的同时，纳粹德国也高度重视社会福利政策。希特勒在 1930 年就说过，"用警察、机关枪和橡皮棒，不能持久地单独维持统治"。这不仅是他的思想，也是他的实践。希特勒上台后大力推行社会保险制度，增加和提高国民的社会福利，扩大了职工的有薪休假制度，劳动阵线在疗养胜地鲁根岛等地，修建了一批疗养院和旅馆，建造"力量来自欢乐"旅游船。仅 1937 年 1 年内，全德约有 1000 万人参加力量来自欢乐的休假旅游；"一时间纳粹报刊、电台和电影广为宣传过去只有资产阶级才能享受的休假旅游，现在纳粹德国的工人也成为可能。"德国还通过劳动美化活动来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和劳动环境。1938 年夏天，希特勒甚至声称，德国要实现"每个德意志职工拥有一辆小汽车"。纳粹的政治牛皮不完全是吹的。就经济发展而言，从 1932 年到 1937 年，国民生产增长了 102%，国民收入也增加了一倍。纳粹创造了德国经济恢复的奇迹。

这一切无疑使人们在心理上得到一种满足，从而"把对法西斯制度发泄道德愤怒的政治活动余地，减少到最低程度"。民众生活的改善，加上媒体的大肆宣传和对其他声音和信息源的封锁，使得人们产生社会地位提高的错觉，涣散了民众内部对法西斯统治的抵抗情绪和抵制力量，

而且广大下层民众也对它在政治上持顺从和支持态度。

一个始终笼罩在战败国阴影中的民族，自然有理由为身边看得见摸得着的成就自豪。就连体育，包括 1936 年柏林奥运会都成为了德国政治宣传的工具。希特勒亲自担任柏林奥委会大会总裁。他下令用 16 吨铜铸了一座奥林匹克巨钟，建造了一座高达 70 米的希特勒钟塔，建了一座能容纳 10 万人的运动场，建了一个可容纳 2 万名观众的游泳池，并修建了比洛杉矶奥运会还要豪华的奥运村，而且大肆宣传德国的“繁荣与昌盛”。为了开好 1936 年柏林奥运会，希特勒不但允许一些德国犹太人优秀运动员代表德国参加竞赛，甚至还任命犹太人沃尔夫冈·菲尔斯特纳尔负责管理奥林匹克村。1936 年 8 月 1 日，在德国柏林举行第 11 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上，希特勒宣布开幕。会场上飘扬着纳粹旗帜，德国运动员通过主席台时，行纳粹礼，高呼“万岁——希特勒！”德国第一次通过电视播放了奥运会比赛盛况。当时，希特勒完全有理由称这是历史上最盛大的一次奥运会。在这次奥运会上，德国获金牌 33 枚、银牌 26 枚、铜牌 30 枚，拿了世界第一。体育政治和体育民族主义的狂热，被希特勒发挥得淋漓尽致。希特勒为自己塑造了一个和平政治家的形象，而很多人也为他所蒙蔽。这一年，他在一份秘密备忘录里要求：“德国军队必须在四年内具有作战的能力。德国的经济必须在四年内具有进行战争的能力。”

希特勒在战前的另一个成就，就是通过不流血的外交征服，一步步使德国从一个战败国成为了“正常”国家。根据 1919 年 6 月 28 日的凡尔赛和约，德国一共丧失了拥有 7325000 人口的 73485 平方公里的国土，从 1920 年 3 月 21 日起，德国国防军减少到 10 万人，而且只能用于维护德国内部秩序和执行边防警察任务。凡尔赛和约禁止实行义务兵役制，不准有任何空军武器。当然，这是一个地位低下的战败国，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正常国家。

1933 年希特勒上台后就立即秘密重整军备。1935 年，德国实行陆军普遍征兵制，并正式成立空军，接着又大造军舰和潜艇。国际联盟对德国破坏凡尔赛和约的行为只是口头上抗议，没有谁准备用武力制止希特勒的扩军备战。1936 年，希特勒派兵占领了“凡尔赛和约”和“洛迦诺公约”明确规定的“非军事地带”莱茵兰。开始他宣称这次占领“纯属象征性质”，还提出要跟邻国签订为期二十五年的互不侵犯条约。1938 年 3 月，奥地利“回归”德国。半年后，希特勒又要求有 350 万人口的苏台德地区回归德国。希特勒说这是他对欧洲提出的“最后一个领土要求”。古德里安说：“萨尔地区的收回，军事自主权的建立，莱茵河地区的占领，奥地利的合并——这些事情都能够得到全德国人民的拥护，甚至于外国也都不乏表示同情的人。”到入侵波兰时，希特勒仅用短短的几年时间，就使德国的空军力量已经超过英国，陆军力量也超过法国，成为欧洲军力最强大的国家。德国再次成为欧洲强国。

战前，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使德国在战败的阴影中迅速崛起，而这是以不流血的方式实现的。

希特勒

1939 年 3 月 15 日，德军占领布拉格。1939 年 4 月 20 日，希特勒五十大寿，德国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典礼。所有各兵种的军旗都集中起来组成了一个“军旗营”，这么多的军旗都向希特勒前倾致敬。古德里安就说：“他的事业到这个时候可以说已经登峰造极。他是不是懂得持盈保泰，适可而止的道理呢？当时的情况已具极度的爆炸性。”但希特勒没有“止”。一如古德里安所说：“在捷克被占之后，梅默尔也被兼并了。这个时候的德国，已拥有强有力的地位。似乎以后任何的国际问题，都可以用外交手段和平解决。可是希特勒却似乎从来不考虑这个问题。”希特勒不想止步，德国这时却没有人和力量能够迫使他止步。

作为个人，希特勒是个素食者，不喝酒，不抽烟。就连古德里安也说：“从个人方面来说，他的生活方式是很高尚纯洁，很值得人敬佩的。”但希特勒不是普通人，而是大权垄断在手的绝对领袖，是否素食，是否喝酒抽烟，都是细枝末节。他可以不喜欢在个人生活上过多花纳税人的钱或者其他什么的，但他不怕多流纳税人的血。

1938 年 11 月 10 日，希特勒对记者声称，他这么多年来谈论和平是“迫不得已”：“我只有不断地重申德国的和平愿望与计划才能一点一点地为德国人民赢回自由，使他们获得下一阶段必不可少的武器。”希特勒的目标不仅仅是废除凡尔赛和约，尽管古德里安将军从苏台德地区回到柏林的时候，“心里还满以为会有一个长期的和平”。不过，就像他在回忆录里说的那样：“不幸得很，我完全预料错误”。希特勒在把德国和欧洲往深渊里拖。但是，这时的德国自己已经不能遏制希特勒的疯狂，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在德国已经建立起了让德国人俯首帖耳的极权体制。

“元首永远是正确的。元首的意志就是法律。”希特勒和古代独裁者一样，他不仅要控制国家、土地和人民的肉体，还要控制人民的精神和思想。纳粹让孩子从小就接受纳粹精神的培育，成立了“少年队”、“希特勒青年团”、“德国少女联盟”等组织，把所有的孩子按照不同年龄都囊括进去，组织起来了，从而培养出符合纳粹精神的新人。第三帝国的指导性口号是：“元首命令，我们紧跟！”德国人民必须听希特勒的话，跟纳粹党走。要做到这一点，仅仅靠教育宣传是不够的，还必须有严密的组织保证。就思想文化控制而言，有着纳粹党和政府的两大系统。比如，1934 年 1 月设立了纳粹党世界观学习教育监察处，负责监管党员的思想教育和培训。1933 年 3 月，德国政府成立国民教育与宣传部。戈培尔出任德国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部长。他强调，大众传媒绝对是纳粹党的工具，任务是向民众解释纳粹党的政策和措施，并用纳粹主义思想改造德国人民。他声称宣传者的背后应该竖着一把剑。纳粹当局迫害和驱逐“制造和传播非德意志精神”的文化人一点也不客气。1938 年 8 月，德国政府公布了第一批被革除国籍、成为不受法律保护者的名单。到 1938 年底，共有 84 批、大约 5000 名科学文化人士被迫流亡国外。

戈培尔有句讲宣传工作的名言：“即使是一个简单的谎话，一旦你开始说了，就要说到底。”可是谎言毕竟是谎言。为了维护谎言，除了继续说谎之外，密探、监狱和死刑，总是纳粹极权政治的孪生兄弟。可以说希特勒的监控体系卓有成效。比如党卫队保安处和盖世太保建立了周详的档案系统，为每一个可能的敌人设立案卷。德国的犹太人和那些无论是思想或者行动上否定纳粹主义的人，无论你是共产党人还是社会民主党人，或者是和平主义者、自由主义者，都不能不生活在纳粹的密探、警察和集中营的恐怖之下。比如，大学生里的志愿情报员会定期上交听课笔记，这样一来，大学老师的政治态度，也就在党卫队保安处和盖世太保的掌握之中了。如此环境，老师上课自然也就会倾向于跟纳粹党和希特勒保持一致了。而希特勒的镇压体系也从来没有吃白饭。据估计，1933-1938 年，纳粹人民法庭和特别法庭共判处 34 万人长达 100 万年的监禁；1939-1945 年，纳粹军事法庭判处国防军官兵二万五千人死刑。在集中营被杀害的估计有 1100 万人（包括占领区），另外遭受残酷摧残的大约 1800 万人。

在这样的监控和镇压体系之下，所有的反抗和异议活动都面临致命的危险。在纳粹德国，甚至连国家的经济部长、军事经济全权总代表沙赫特的电话，也遭到女管家——盖世太保的志愿情

报员的窃听。这样一来,一小撮的反对者不断被发现和被清除,反过来,希特勒极权政治的严酷性使得反对和异议的人士总是只有一小撮或者极个别,并显得孤立无援。于是乎,对希特勒统治所表现出来的狂热,最后很难分清是出于恐惧,还是出于真心。这个国家在独裁者和纳粹党面前只会大声说是,在世界面前大声说不。对于政坛的氛围,古德里安在回忆录里就说:“我曾经参加过无数次的汇报和会议,深知很少有几个人是敢于和他(希特勒)对立的,而这些人在今天仍能活着的也就更少了。有些人只敢在走廊上交头接耳的谈话,以表示他们的反对,或是鼓励旁人去送死……”

1938 年之后,纳粹德国政府内阁就再也没有开过一次会议。部长都是在希特勒的命令下单独工作。甚至连部长也常常是从报纸广播中才知道“德国政府”做出了什么决定,或者颁布了什么法令。在政府机构之外,设置了一个与政府机构平行的纳粹党的机构。希特勒的口号是:“政府并不控制党,而党却控制政府。”就连后来成为战争罪犯的古德里安在回忆录里也说:“于是就发生了一种不正常的现象,行政权转到了党的手里,一切实权操在党委的手中。”党老爷成了实权派。国会形同虚设,由于议员开会只是高唱国歌《德意志高于一切》和纳粹党党歌《霍尔斯特·威塞尔之歌》,此外没有任何发言辩论,被称为“昂贵的合唱团”。授权法案的规定,使得希特勒的命令具有和法律平等的权力。

当然,纳粹德国也没有执政党和在野党之间的相互制约了。用纳粹的话来说,就是“国内不再有党争”。希特勒在 1933 年 7 月 14 日颁布《禁止组织新政党法》,不仅取缔了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而且解散了包括天主教中央党和民族人民党在内的一切政党,而且纳粹党是“德国唯一的政党”。这年 12 月 1 日颁布的党和国家统一法,确立了纳粹党在德国至高无上的地位。既然没有了在野党,也就无所谓执政党了,纳粹成为了德国一党专政的统治党。希特勒在 1934 年 9 月的纳粹党党代会上说:“党是指挥国家的。不是国家指挥我们,而是我们指挥国家。”1937 年 1 月 25 日颁布的《文职人员法》规定,今后政府官员必须由纳粹党员担任,思想上真正信仰民族社会主义,无条件支持纳粹的政治目标,政府官员必须同党的干部一样宣誓效忠希特勒。1939 年后,纳粹党籍成为当官的先决条件。希特勒在德国实现了党国一体。

与此同时,不断强大起来的德国军队也成了纳粹党的军队,成了希特勒的军队。德国国防军被党化,成了希特勒的私家军。军队不是忠于国家,而是忠于纳粹党,忠于希特勒。1932 年 2 月,国防部部长兼国防军总司令勃洛姆贝格下令军人一律佩带万字标志的军鹰徽。1934 年 8 月,他安排全体德国国防军官兵宣誓:“我在上帝面前作此神圣的宣誓:我将无条件地服从德国国家和人民的元首、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阿道夫·希特勒;作为一个勇敢的军人,愿意在任何时候为实行此誓言不惜牺牲生命。”1944 年 3 月,那赫赫有名的沙漠之狐隆美尔和一些积极的陆军元帅又在给希特勒的第二份效忠书上亲自签名。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损失了二百万士兵,但其中只有十位将军。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却是另一番表现。英国历史学家戴维·欧文这样写道:“实事求是地说,有数以百计的将军就是由于他们盲目地服从自己的誓言,不顾显然无望的局势而在战斗中送命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希特勒挑起了战争。希特勒掌握着德国的方向盘,就是开向悬崖,德国也无人能够阻止。除了去世、谋杀、政变,没有什么东西能够使希特勒下台。纳粹德国没有改弦易辙的内部机制。希特勒想要大炮不要黄油,他可以使德国人都不要黄油而只要大炮。这种制度是一条道走到黑的制度。这样一个国家,就是想不疯狂,也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当然,德国发动战争之初的流血征服,也确实让多数德国人兴奋了一阵子。德国军队只花了五个星期的工夫,就开进了夙敌法国的首都巴黎,比俾斯麦打败法国拿破仑三世、进逼巴黎的时间还要短。1940 年 6 月 22 日,法国签署了投降书。在同一节火车车厢里,1918 年 11 月 11 日,德国曾签署了战败的停战协定。在现在的德国看来,这自然是“洗刷凡尔赛耻辱”的成就。希特勒被当成“所有时代的最伟大的统帅”而得到德国人的欢呼。再想想看,自从 1939 年 9 月战争爆发,直到 1942 年 11 月英美军队在北非的阿拉

曼战役中大败德军之前，英国军队可是战无不败。在长达三年的时间里，希特勒的德国是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在一般民众的眼里，这都是德国扬眉吐气的有力证据。

但是，德国紧接着就是大难临头。1943 年 2 月，德军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惨败。这成了战争的转折点。从此德国军队开始全线退却，可它依然在大谈“最终胜利”。真是开弓没有回头箭。最后，希特勒重复了威廉二世的悲剧。希特勒发动战争非但没有拓展德国的“生存空间”，而且丧失了领土，德国还被一分而二。当然，希特勒本人最后一刻也没有屈服，可 1945 年德国的城市却躺在一片瓦砾之下。英国工党政府在给下议院的一份报告中称，柏林的瓦砾即使每天清除 100 吨，也要 30 年才能清除干净。而根据《纽约先驱论坛报》的报道，拥有 43 万人的德国杜塞尔多夫市这年冬天定量供应的衣服，只有 26 套男装，15 套童装，33 件成人外衣和两条毛巾。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德国的历史告诉世人，国家的崛起，也有可能变成独裁者冒险的本钱。崛起如利器。如果不是驾驭得当，就会害人害己。德国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出现两次这样的悲剧。从 1871 年 1 月 18 日俾斯麦在凡尔赛宣布德意志帝国的诞生，在不到五十年的时间里，1914 年的德国已经成为欧洲军事和经济最强大的国家。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苦心经营获得的是崩溃、废墟和死亡，它不但没有得到“阳光下的地盘”，倒是丢掉了东普鲁士和阿尔萨斯、洛林。1930 年 4 月 3 日，德国的一份报纸就这样写道：“战前德国曾有 540858 平方公里疆土……如今已减到 472082 平方公里。”希特勒重复了威廉二世的悲剧。纳粹德国的崛起，成了一种危险，一种具有世界影响的危险。鲜花结出了苦果。除了国际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之外，仅就德国内部而言，缺乏有效制约希特勒滥用国力的机制，是德国崛起成了世界性祸害的重要原因。德国的历史表明，国家需要发展，但为了发展崛起不能不择手段。否则，富强一旦成了简单的无条件追求，那不但是一种国内危险，也是一种世界性的危险。（责任编辑 吴 思）

来信照登

炎黄春秋杂志社：

贵刊 2005 年第 6 期 11 页《对陈独秀接受朱家骅赠款事释疑》一文中 12 页第三自然段，在认定“朱家骅确是相对最为适当的人物”之后的第 7 行末：“朱致陈三信中，有二信称张国焘为‘同志’，一信称张国焘为‘先生’，似也有意表明此项赠款系为官方所赠也。”全文都说陈独秀接受朱家骅赠款之事，怎么突然跑出一个“张国焘同志”和“张国焘先生”呢？是作者笔误还是编者之错？或本就是张冠李戴？把朱给张国焘赠款的信栽到陈独秀名下？希望澄清为盼。

厦门读者黄佳章

黄佳章先生：

由“炎黄”转来你的信，收到了。你大概没有看过《中共党史研究》上那篇长文，赠款三次均是张国焘送去的，有档案在，与书刊记载价值不同。郑学稼说，钱是由郑代陈独秀退回的，看来不是事实了。郑此人说起来太长，是否真加入过托派组织，我不知道，但三十年代与四十年代初，左翼均把郑看成托派。为何我要说张国焘更能显出是官方呢？因张系中共公开叛徒，其领工薪单位又是蒋方之军统，其国民党身份反比朱家骅更明显，或者说至少一样。当然，张国焘又是陈独秀学生，由张携去赠款，正是公私两及。朱家骅三信中，两信称张为同志，一次称为先生，有原件在，无误。朱称张为“同志”，正是表明张国焘已是国民党官方人物了。这是生活救济，算不上收买，所以并不影响对陈的科学评价，鄙见如此。

（我的文字为求短，未说明三次赠款均是由张国焘送去的，甚歉，对来信同志也甚谢。）

曾彦修

2005 年 6 月 18 日

“秦家店”的奠基者商鞅

● 尹振环

承蒙《炎黄春秋》刊出拙文一谈、再谈“秦家店”后，看来得接着谈它的指导理论及其奠基者。下面先谈商鞅。

一、商鞅变法为秦开帝业

商鞅出身贵族（卫国庶出公子），有奇才，在魏国不得志，闻秦孝公求贤，于是携李悝的《法经》入秦，说服秦孝公，于公元前356年进行了第一次变法：（1）编民为十伍，严行连坐法。“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2）下令每户有二男而不分家者，加倍征收赋税。（3）重赏军功。（4）禁止私斗。（5）奖励农耕。（6）抑商抑末。凡从事工商等末业怠而贫者，全部收编为官奴隶。（7）废世卿世禄，王室宗族无军功的不能列入簿籍享受特权，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荣。变法十年，秦国大治。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

前350年进行第二次变法：（1）除井田，开阡陌，实行“授田制”。（2）迁都位于秦国中心地点的咸阳。（3）并全国乡、邑为三十一县（或四十一），加强君国对地方的控制指挥。（4）统一度量衡。（5）男子成年必须另立门户，否则增户赋。（6）革除戎狄风俗。（7）明法令，禁游说，焚毁《诗》、《书》。变法的结果是被东方诸国看不起的秦国，“天子致伯”、“诸侯毕贺”，拓地千里，国势大震。一跃为一流强国。用今天的话说，变法极大加强了国家对社会各阶层和各方面的控制；政治、军事、经济、思想、文化、教育、舆论，一律纳入国家掌控之中；军力、战斗力、生产力大大增强。秦孝公死，秦惠公杀商鞅（他为太子时曾被惩罚），但商鞅之法未变，其著作《商君书》仍然指导着秦惠公及以后的历代秦王，为百年之后秦始皇灭六国，一天下，建立“秦家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所以要了解“秦家店”，首先就得具体分析它的指导理论《商君书》。

二、残酷战争条件下的产物

读《商君书》，常感不快，有血淋淋、极残忍之感。但是放到当时特定的惨烈战争历史条件下，又理解了为什么被当时的国君看重。秦孝公时，东边有强国六，淮、泗之间还有十多个小国，周王室徒有“王”名，诸侯想方设法内修其政，外争兼并。当时之秦被排除在“中国诸侯会盟”之外，视之为“夷翟”，三晋夺取了秦的河西大片疆土，用秦孝公的话说：“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秦孝公以及之后数十年的兼并战争的规模及其惨烈的程度无以复加。试举两例。

其一，按照周礼，战争是征讨不义，讨伐那些贼贤害民，暴内凌外的罪国。如“入罪人之国”，不毁害庄稼，不伐树木，不烧房屋，不杀投降的人，还“不重伤（杀已受伤之人），不擒二毛（黑白发相间），不推人于险，不鼓不成列（不进攻未列成阵的敌人）。”而到了春秋后期以来，战争完全是为了大吞小，强凌弱，扩土广民。照《墨子·非攻（下）》的文字，受伐的国家，井被填塞，树被砍伐，禾被收割，粮食、车、马被掠夺，城廓被毁，祖庙被焚，人不分男女老小，逃不脱都当俘虏，为奴隶。而在被敌人围城的时候，痛苦更不堪

言。《墨子》所载的守城法是:城下比较不重要的地方,每五十步置壮男十人,壮女二十人,老小十人。城上守兵每一步一人。城下重要的地方每五百步置壮男一千人,壮女二千人,老小一千人。男兵六分用弩,四分用矛戟盾等器械,女兵和老少兵全用矛。这已不是"全民皆兵",而是"无人不兵"了。民间粮食、布帛、金钱、牛马畜产一切可用的物品,都借给公家使用。人们既要作战死伤,又要忍饿破产。有时甚至饥困到"易子而食,拆骸以炊"的地步。人民怕在战败后被俘充当奴隶,只得忍受这样的痛苦来守城。商鞅晚于墨子,但曾经生活在卫国、魏国的他,无疑有过这样的经历。

其二,据《史记》记载,战国时数十万人、乃至上百万人的战争越来越多。秦将白起,为将二十五年间,斩敌八十九万。长平一役,白起计杀赵降卒四十余万人。哪里还有"不重伤、不擒二毛"呢?也许这些数字有水分,但它起码说明了战争规模何等之大,交战双方需要动员何等多之兵员,何等多为之服务的后勤人员与行政人员。正是战争频繁、残酷,新军事哲学《孙子兵法》首先诞生了;接着《孙膑兵法》、《吴起兵法》等等先后出世。"兵以诈立"、"兵者诡道也",再也没有什么"不鼓不成列",而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出奇制胜。此情此景使"吾从周"的孔、孟之道,岂能不四处碰壁?这才有了毛泽东的"孔学名高实秕糠"的名句。新军事哲学催生了新政治哲学。《商君书》即其中之一。由于商鞅同时著有兵书二十七篇(已佚),所以他的政书往往也"出奇制胜",只刚不柔。并且公开挑明:与孔孟之旧政治哲学彻底决裂。所以《商君书》是战争体制下的刚强政治哲学。

三、"务在弱民""本在制民"

《商君书》有出自商鞅之手的,有记录商鞅的言论、政令、奏文的,也有商鞅后学者的文字,还有个别其它文字掺入。但无疑皆属商鞅思想。《商君书》的思想核心是弱民。下面先抄几段纲领式的文字。

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朴则强(人民朴实国就强);淫则弱(人民放肆,国弱)。弱则轨(人民朴实,就遵法不越轨);淫则越志(人民放肆就任意行动)。弱则有用(朴实则服从役使)。昔之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胜强敌者,必先胜其民者也;故胜民之本在制民,若冶于金、陶于土也。(《画策》)

民胜其政,国弱。政胜其民,兵强。(《说民》)

商 鞅

竟然公开提出要"弱民"、"胜民"、"制民"——如熔炉里的金属、陶匠手里的泥土,想让它成什么样就成什么样。真匪夷所思。但细想一下"愚民"岂不就是"弱民"?只不过愚民比弱民好听些罢了。

看来,"愚民"是由"愚士卒之耳目"发展而来。《孙子兵法·九地篇》说:"将军之事,静以幽,正以治。能愚士卒之耳目。"后来《老子》把它用到为政上:"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老子》对于如何愚民,极少提及,而商鞅则提出了一系列的"弱民"方略。而且详加论述。许多变法如:严刑峻法,厉行连坐;不告奸者"腰斩",重赏告奸(相当斩一敌首,即赏爵一级,田一顷,宅九亩,庶子一人,并可以为吏。)"抟于农";遗贤去智等。商鞅坚定地认为:不弱

民，不愚民，无以胜强敌，无以制民。还需要说明：《孙子兵法》提出"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老子》主张"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商鞅根本就不提它，相反，他公开提出要"政作民之所恶"。如农战、严刑峻法等等就是"民所恶"。所以商鞅只刚不柔，使人有血淋淋之感。

四、"抟（团聚）于农"的奥妙

在个体农业经济占绝对优势的古代经济条件下，农是国家之命脉所在。所以把重农视为基本国策，奉为国强君尊的根本所在，这十分正确。而商鞅的"重农"，是从它利于战与利于统治的政治角度出发的。这里还是用《商君书》的话来说吧：

圣人知治国之至要，故令民归心于农。归心于农则民朴而可正也。纯则易使也，信（诚信）可以守战。壹则少诈而重居。壹则可以赏罚进也。壹则可以外用也。（《农战》）

所谓的"壹"，就是统一，也是聚集于农，这是商鞅的特殊用语。他说"国之所以兴，农战也"。将全国壹于农的好处，就在于"农朴"、"纯纯"、"诚信"、"易使"、"少诈"、"重居"（不愿迁徙），既利于守，也利于战，这里无不是从政治上考虑的。当然"农"还是国之财源、兵源的主力。也是君尊的社会基础。所以商鞅一而再、再而三的申述上述主张。

"治国者贵民壹。民壹则朴，朴则农，农则勤，勤则富。""朴则安其居恶出"（《壹言》）。

"民平则慎，慎则难变。""民慎而难变，则下不非上，中不苦官。""民不贵学问则愚，愚则无外交，无外交则[驯]"（《垦令》）。

为什么"抟于农"？因为"农朴"、"农静"、"农慎"。他们最能吃苦，享受着低得不能再低的生活，只要填满肚皮，活得下去就谢天谢地了。这就是"易勤"、"易劳"、"易力"、"易苦"。他们的茅屋、土地、老婆儿女，就是一个经济单位，这决定了他们"重居"、"安居"而"恶其出"。自给自足的经济决定了他们与外界与社会联系少，社会关系简单。简单的耕作，自然也就"不贵学"，"少学"，而"不贵学则愚"；"愚则驯"；"则易使"；"愚则易治也"。经济条件又决定了他们更爱乡土，更爱国，外敌入侵往往意味着他们的灭顶之灾，所以在战争中，他们"轻死""乐战"。这一切又决定了他们"难变"，极少去议论统治者的是非好坏——"下不非上、中不苦官"。比起东奔西跑、社会关系丰富的商人、习闻较广的读书人、伺弄技艺的手工业者、以及城市自由民，当然易于分而治之，更遵守法令（"畏令"），容易受骗、容易利用——"乐用易力"。这自然是极理想的"良民"。但是毕竟"民之内事，莫苦于农"，比农事更苦的是战。"民之外事，莫难于战"。因此必须"劫以刑，驱以赏"；"刑则必重而严，赏则必厚而信，并且赏以官爵"。民见赏之重，则尽力；见不战之辱，则忘死，只能拼命于耕和战。

同时为了"抟之于农战"，商鞅提出行政要全面干预社会生活，干预经济。如"使民无得擅徙"——不准自由迁移；又如"废逆旅"——禁开设旅馆，还有"壹山泽"，官家独占山泽之利，使厌农靠山泽吃饭的人"必农"。再有，要使"农民无所闻变见方"，听不到变革，看不到别的技艺，这样农无从离开故土，除了垦荒种地，别无它路。

无怪小拿破仑（路易·波拿巴）曾公开宣称："我的最忠实、最真诚的朋友，不在高楼大厦里，而是在茅舍中。"恩格斯说："作为政治力量的要素，农民至今在多数场合下，表现出自己的那种生根于农村生活孤僻的冷漠态度。广大居民中的这种冷漠态度，不仅是巴黎和罗马国会腐败情况的强有力的支柱，而且是俄罗斯专制主义的强有力支柱。"（《德法农民问题》）可见商鞅的"抟于农"的谋虑何等之早，又何等深遽。

五、"遗贤去智，治之数也"

前面已经谈到，在商鞅看来，农是国富君尊的社会基础。那么又有哪些人有碍国强君尊呢？《商君书》有多种说法。其一，《算地》列出的"五民"："诗书谈说之士"、"勇士"（行私勇之侠客）、"处士"、"技艺之民"、"商贾"。其二，《垦令》中的"五民"，又称之为"偏急"、"狠斗"、"怠惰"、"费资"、"谀恶"之民。其三，《画策》中的"五民"是"不战而荣，不作而食，无爵而尊，无禄而富，无官而长"。上两种"五民"并

没有笼统说他们是“姦(奸)民”,唯独对此“五民”特别指出:“此谓之姦民”。《商君书》一一分析了这“五民”是如何有碍国富民强的。读书人与游说者,他们游荡,“轻其君”;处士即隐士,不仅不为君上所用,而且总是“非其上”;“勇士”好斗,好仗义,“轻其禁”;手工业者不恋乡,容易迁徙;商人不事农耕,何等轻闲,而且其利数倍于农,他们也常常“议其上”。如果国家依靠扶持或任用这“五民”,人民就会向他们学习,土地就会荒废,兵力必定削弱。可见,“五民”的轻君、议上、非上、轻禁、易徙,无一不是与“农”相比较而得出的结论,他们不仅会导致田荒兵弱,而且还会使“君不尊”。后来韩非的“五蠹”就是由此发展而来的。

不过,《商君书》还是集中火力批“贤”、批“智”、批“儒”。《慎法》说:“世之所谓贤者,善正也。所以为善正也,党也。”什么“贤”?不过是为了结党营私罢了。《说民》说:“辩慧,乱之赞也。礼乐,淫佚之徵也(招致荒淫)。仁慈,过之母也。任誉(赞誉),奸之鼠也,八者成群,民胜其政,国弱。国无八者,政胜其民,上有以使守战,必兴至王。”为了战争,为了强国,必需限制乃至取缔、停止“辩慧、礼乐、慈仁”与相互的吹捧。同时《靳(饬)令》提出有十二种东西是不能让它们生根和发展的。即礼、乐;《诗》、《书》;修善;孝悌;诚信;贞廉;仁、义;非兵;羞战。有了这十二者,必定妨碍耕战,“君之治不胜其臣,官之治不胜其民”。不用十二者,国兴、国必多力,天下不敢犯。“兵出必取,取必能有之;按兵不攻,必富。”这些岂不是针对儒家、墨家,更是对商、周以来的政治道德的公开否定吗?尽管它是出于战争的需要。

同时,商鞅对于当时百家争鸣、游说之风也持否定态度。战国中期各学派的辩慧游说之风盛行,但在商鞅看来:“实无用”。它不利于国家法令的贯彻实行,而且扰乱思想,最后的结果是国贫兵弱。所以《商君书》不仅反对任用结党营私的“贤者”,而且公开反对“任善”。提出要“任奸”。所谓的“善”,指儒家的修身、道义,顾全“亲亲”、“尊尊”,不肯揭发别人的过错与罪恶以自利的人。所谓的“奸”,恰恰与此相反。《说民》说:“用善,则民亲其亲。任奸,则民亲其制。”“民胜法,国乱;法胜民,兵强。故曰:以良民治,必乱至削。以奸民治,必治至强。”如此坦率的言论,读了让人心寒,但细想又不得不承认这是“真理”!任用一些善良厚道的人,他就难以去告密请赏,卖友卖人卖亲;任用那些唯害是避、唯命是从、唯利是图之徒,容易告密,并充当走狗与打手,如此,“过”从何“匿”?民何胜“法”?所以说,以奸民治,必治至强。因此结论是:“遗贤去智,治之数也。”

《老子》提出的“不尚贤”,“智者不言,言者不智”,极少阐述它的道理,更无实施方案。到了《商君书》,已经理论化,而且已经有了一整套实施方案。显然,这一切是针对儒家、墨家及社会中有思想,有头脑,社会关系丰富,较最为积极活跃的阶层。战争时期对他们作一定的限制是必要的。但到了和平时期,“道已移,政不改”,遗贤去智,任奸不任善的后果岂不是阻碍社会前进,放任君王逐渐走向荒唐,直至灭亡吗?

六、六个一:壹农、壹战、壹言、壹赏、壹刑、壹教

商鞅词典里,“壹”被反反复复的强调。“国作壹一岁,十岁强;作壹十岁,百岁强。”“圣人治国也,审壹而已矣!”1、“壹农”。这是壹之于农。2、“壹战”。或“壹民于战”;“举国责之以兵”,造成人们无时不在谈论战争,“起居、饮食所歌者,战也”。使“民之见战也,如饿狼之见肉”,出征时,父送子,兄送弟,妻送夫,都说:“不斩敌首,不要回来!违反法律,背弃命令,你与我们都会死!”在争王争霸,战争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的时候,必须“壹之战”(《赏刑》)。3、《壹言》。可惜《壹言》这篇文章文义不全,文不符题,但是“遗贤去智”,“任奸不任善”,“言轨于法”,已经含有“壹言”之意。4、何谓“壹赏”?“利禄官爵抟出于兵,无有异施也”,凡是赏赐官爵,统统加于军功,不用在其它方面。无论智愚、贵贱,贤与不肖,凡用尽他们的智慧与力量,拚死为君上效力,建立军功的,必赏、重赏。战胜敌国后,用别国的财富进行赏赐,结果等于不用自己的财富赏赐,何乐不为?5、“壹刑”。“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

乱上制者，罪死不赦”（见《赏刑》）。6.“壹教”。说穿了，就是教化这件大事，不能由那些“博闻、辩慧、信廉、礼乐、修行、群党、任誉（行侠义）、清浊（清高）”之辈去进行，既然圣智、博闻、辩慧之士不可以教，自然官和吏就成了天下之师。他们以什么为教材？人主所制定的法令，即韩非后来所说的“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总之，“壹赏则无敌，壹刑则令行，壹教则下听上”（《赏刑》）。

对于“壹刑”，商鞅还有不少独创：第一，以前立过功，现在有了过，不能因此而减轻刑法；以前有善行，现在有过失，不能因此而亏法。忠臣孝子有过，也必须按现在犯法的轻重判罪。第二，商鞅主张官吏犯法更要重刑。不仅“罪死不赦”，而且“刑及三族”，并且连及他四周的官吏，有告发他“不行王法”的，不仅自己免罪，而且无论贵贱，便可接替他的官爵、土地和俸禄。第三，重刑，连其罪，一人有罪连及别人。绝不心软、手软。这样才能以刑止刑。第四，必须以刑为主，以赏为辅。“王者刑于九而赏出一”。“削国，赏九刑一”。第五，“行刑要重其轻者，轻者不生，则重者无从至矣”。或者说“刑用于将过”，有了犯罪的萌头，就得用刑。何人再敢犯重罪？第六，“赏施于告奸”，重赏告奸，加上连坐法，就是互相监视盯梢的天罗地网。第七，“刑人无国位，戮人无官位”。凡是受到惩罚的人和他的关联人，永远钉在耻辱柱上，不给他们以爵位官位。第八，“为法，必须明白易知”，要使“天下之吏之民无不知法”。这样“吏不敢非法待民，而万民皆知避就”。商鞅大搞“冀阙”（公布教令之门），就是用以公布法令的。

可见，法家所谓的“法”，即统一和强化国君的控制、统治，使人民出力出血，而非现代意义上的保障人民的权利也。

七、结语

诸子百家中，唯独商鞅最走红。商鞅思想立即付诸实施，结果是军国大治，战功赫赫。秦国“保崤函之固，以广雍州之地，东并河西，北收上郡，国富兵强，长雄诸侯，周室归籍，四方来贺，为战国霸君。六世而并诸侯，皆商君之谋也”（《新序》）。所以说商鞅奠定了“秦家店”的基业：为秦开帝业。但是，商鞅“内刻刀锯之刑，外深铁钺之诛。步过六尺者有罚，弃灰于道者被刑。一日临渭而论囚七百人，渭水尽赤，畜怨积仇，比于丘山。”自己落得“身死车裂，灭族无姓”的下场。到后来发展到“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钱之利二十倍于古……赭衣（囚服）半道，断狱岁以千万计”（《汉书·食货志》），秦王朝十五年而亡，不能不归咎于“商鞅为秦致亡道”。马基雅弗利说：“对于君王，作恶比行善有利。”聪明的君王要想维持他的政府的生存的话，就将“经常违背真理，违背人道，违背宗教。”（对于商鞅，还要加“违背信义”，如他设计欺旧交，虏魏公子印，为秦拓地。）“为了实现统一的这个最高目标，可以不择手段”。（《君王论》）马克思认为马基雅弗利“使政治的理论观点摆脱了道德”。《商君书》不仅摆脱了儒家的政治道德，也摆脱了《老子》等道家的政治道德。他的尊本抑末，发展为历代的轻商、轻工。“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在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上。任何新的生产力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轻商、轻工，时时加以抑制，加强自给自足的经济，阻碍分工的发展，它不是使人们交往发达起来，而是老死不相往来。否定奴隶制社会的是孕育在奴隶制社会的农奴、佃农，而不是奴隶；否定封建社会的是市民、工商者、手工业者、城市自由民，而不是农民、农奴。旧中国资产阶级少而弱，比欧洲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迟，这与商鞅的理论不无关系。还有商鞅的文化、教育、知识分子政策，样样归“壹”的主张，也给中国的发展以负面影响。刘备，这位“仁君”，死时不忘谆谆教导阿斗，常读“商、申、韩之书，增人意智”。其他羞谈商韩的帝王，何尝不会暗地里从商韩那里寻求启示呢？

（附记：1974 年 7 月，县文化馆破四旧，烧旧书，丁中岳先生让我深夜背了一麻包线装书回家，从薄本《商子》读起，得此文初稿。1976 年 2 月大改后，得二稿。一放放了三十年。今年得三稿。2004 年 11 月 6 日记）

（作者系贵州省委党校教授）

（责任编辑 吴 思）

李鸿章驾驭洋兵的手段

● 雷 颐

1862 年 4 月初到上海参与“协防”而后任江苏巡抚，可说是李鸿章摆脱曾国藩、真正“自立门户”的开始，李鸿章以后的“隆隆事业”实皆由此奠基。正是在上海，他开始与“洋人”打交道，渐渐以当时少有的“知洋务”者而闻名中外。在近代中国的政治格局中，列强的影响越来越深，因而能与洋人打交道、受到洋人重视者，自然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调停笼络”与“裁制控制”

就在他到上海的前一年，清廷的对外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变。

1860 年清政府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惨败于英、法侵略军，外国侵略者已将京师攻克，咸丰帝出逃热河；而太平天国声势仍然浩大，远无“肃清”、“剿灭”迹象。内外交困，走投无路的清政府在与外国人谈判的过程中认识到新的侵略者与传统异族的“入侵”完全不同，并非要推翻清朝的统治自己成为新的皇帝，而主要是为了通商谋利。所以开始感到“夷人不足虑”，而后进一步确定了“中外和好”、借洋人力量消灭太平军的战略。

当然，这种战略性的根本转变从提出到具体施行并不容易，必然要一个“磨合”过程。从上到下都会有种种不同反应，不同理解、乃至不同的执行策略。而且，在执行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向何“夷”借剿、合作到什么程度、以何种方式合作、指挥权由谁掌握、允许“夷兵”剿“贼”到什么程度等一系列具体问题。这些，中央政府没有也不可能有具体的方案，因此相关地方政府和各级官员便有较大的相机行事的权力和幅度极宽的“自由裁量权”。

对“借师助剿”最为积极的，当属与自己利益最为密切、以上海为中心的东南官绅。其实，在朝廷对外基本国策还没有发生转折时，与洋人打交道颇多的上海官绅就开始借用洋兵“协防”。1860 年时任两江总督何桂清等就提出用“抚夷助剿”的办法，但未被朝廷采纳，不过在沪筹办防务的苏松太道吴煦仍雇美国人华尔（F.T.Ward）组织了“洋枪队”，以中国勇丁杂西勇为各级头目而成。不久，时任苏松粮储道、“综理夷务”的杨坊还把自己的女儿嫁与华尔为妻。1862 年初，江苏巡抚薛焕把这支洋枪队定名为“常胜军”，派吴煦督带，杨坊会同华尔管带。华尔率“常胜军”在上海附近与太平军多次作战，由于武器先进，打了一些胜仗，为清廷立下汗马功劳。但 1862 年 9 月下旬，他在一次战斗中被太平军打死。华尔死后，清政府任命美国人白齐文（H.A.Burgevine）为管带。如此重要之事，地方官竟能不经中央政府同意，足见外力对近代中国的侵染之深，更足见地方利益、地方势力在晚清之崛起。

“借师助剿”政策遭到一些大臣的反对，曾国藩也不完全赞成。1862 年曾氏已任两江总督，手握重兵的他对朝廷的重大政策不便公然反对，于是在奏折中提出先靠自己的力量在重要地区消灭太平军后再商量“会师助剿”之事。很明显。这只是一种委婉的反对，既然重要地区的“贼”已被灭，自然没有“借夷”的必要了。他又提出“借夷”最多应只限于上海一地，因上海已是通商口岸，洋人利益颇多，而且上海无险可守，清军兵力又不够。他一再强调，借“夷”兵只能“会防”不能“会剿”，所以对部分江浙官绅此时吁请要借洋兵代为收复江宁、苏州、杭州一带极为反感，将其讥之为科举考试“借枪手顶替”，说他们“为此不择之呼吁，皆臣治军无状之咎”，表示臣“既以借助外国为深愧，尤以无兵会剿为大耻”。明

以"自责",暗中"反对"。李鸿章到上海后,曾国藩信中多次指示他与洋人打交道的原则和策略,可以看出曾氏深知与洋人打交道的重要与谨慎:"洋人缠嬲,极难处置,尊处只宜以两言决之,曰'会防上海则可,会剿他处则不可'。""阁下只认定会防不会剿五字,自非贼匪逼扑沪城,我与英法可毫无交涉也。"

到上海后,尚无与洋人打交道经验的李鸿章立即就必须直接面对洋人。为此,他一次次致书曾国藩,既表明心迹,又向曾讨教。他认为上海的官绅"媚夷","失之过弱";而一些反对者则"失之过刚",表示他的原则是"调济于刚柔之间"。他称赞曾国藩"会防不会剿"的观点,认为如果中国的官兵与洋兵同剿,"洋兵每任意欺凌,适自调派,湘淮各勇恐不能受此委曲"。他个人"只知有廷旨帅令,不能尽听洋人调度"。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西兵助剿,江南官绅皆附合之。鸿章商之大帅,定议不拒绝以伤和好,不忮求以存界限。"他进一步认为"目前之患在内寇,长久之虑在西人。堂堂华夏,积弱至此,岂一人一时所致!""我能自强,则彼族不敢妄生觊觎,否则后患不可思议也。"这种看法,当不为无见。对洋兵,他想在刚柔之间、笼络与控制之间走钢丝、搞平衡,但并不容易。

李鸿章刚到上海时,华尔拒不见他,给了他一个下马威。李鸿章在给曾国藩的信中自嘲说华尔"总是众中矫矫,虽至今不理发,并未至敝处一谒,与外国人何暇争此小过节耶?"这种自嘲排解,或许是旧时为官不能或缺的"素养"。但不久与华尔和"常胜军"有过几次接触后,在给曾的信中将其讥之为"蠢然一物",常胜军"弁目百数十人,均系外国流氓"。不过,"常胜军"的战斗力却着实让他吃惊,决意对其"全神笼络之",以为己用。但要完全由自己控制并不容易,经过一番接触,他感到"常胜军"人马精良却专恣跋扈、狂傲不驯,清朝官员根本不能过问,更无法钤制。而且,中国官员中只有经常与自己作对的吴煦、杨坊与他们关系密切,为其提供粮饷等是清军的数倍。因此,李鸿章感到"常胜军"固然对镇压太平军有用,但有可能对他本人权势及清政府造成威胁,所以一直伺机对其加以制抑,并想借此剥夺吴煦、杨坊的职务和兵权。华尔身亡,白齐文走马上任,终为李鸿章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会。

白齐文性情较华尔更加肆横,与吴煦、杨坊等渐有矛盾,吴、杨则以拖欠军饷对付他。1863年1月,白齐文从松江带卫队回到上海,到杨坊开的银号索要欠饷,被杨拒绝。结果,白将杨痛殴一番后,抢去饷银四万余元。李鸿章知情后以"不遵调遣,劫饷殴官"之罪名将白齐文革职。白自然不服,到北京控诉,得到美国公使和英国公使的支持,会同促请清政府将其复职。但清政府认为若将一省巡抚在职权范围内所作的正常决定强行撤销实无理由,于是将矛盾下推,发回上海再作处理,李鸿章坚持不许白复职。李鸿章在《白齐文滋事撤换片》中强调:"外国人性情乖戾,威令不行,本难驾驭。"但白齐文已自请加入中国国籍,已受朝廷的三品顶戴职衔,"违犯法令,应照中国之法治罪,以杜后患"。他说自己对"常胜军"是"曲意宠络,俾为我用",但又担忧:"惟常胜军人数过众,犷犴难制"。他提出要由中国官员会同管带。当然,他决不会同意仍由吴煦等人插手此事。在此显示出李鸿章权谋老辣的是,在这则因白齐文殴打杨坊而要将其严处的折片中,李鸿章竟提出还要严处吴煦、杨坊。因为白齐文的种种不是都与吴、杨有关。

李鸿章深谙软硬兼施之道,在提出处理白齐文、整顿"常胜军"的同时就又附上了《奏奖外国官弁片》,提出朝廷应奖励一些外国使领馆官员和军人,"以示我朝行赏论功,中外一体之至意"。意在平息外国对撤换白齐文的不满。

但想整顿"常胜军"、收回兵权并不容易,因为撤掉白齐文后,兵权落入英国人手中。英国方面对"常胜军"一直由美国人指挥始终不甚满意,早就在"常胜军"中安排一些英国人。为收回兵权,李鸿章在撤掉白齐文十几天后与英国驻华陆军司令士迪佛立(Sir Charles Staveley)作了一番艰难谈判。经过多次辩论,李鸿章已"舌敝唇焦"之后,双方终于同意"常胜军"由中英各派员会同接管,并签订了《统带常胜军协议》。此协议有十几条之多,但归纳起来无非以下几个主要问题。首先,在兵权归属问题上,英国放弃了独揽大权的要求,协议规定管带均应归中国抚台节制调遣,中、英两国都派正规军官会同管带,但中国放弃了英国管带如有过失照中国法律规章办理的要求。士迪佛立主张凡"常胜军"出去战斗必须先与英、法两国商定,此点被李断然否定,后改为如到百里以外作战则须预先与英、法两国商量,临近作战可自主决定。其次是兵额问题。英国希望"常

胜军”最少要五千人，而李鸿章一方面希望靠它消灭太平军，另一方面又怕它人数过多、既费银太多影响淮军费用又可能形成尾大不掉之势，留下隐患，所以力主大量裁减。最后双方妥协，同意以三千为度，若以后兵饷紧张可视情况继续裁减。第三，军费后勤方面规定其军饷在海关银号按月支取。在李鸿章的坚持下决定从简，并且规定购买军火须有江苏巡抚文书，管带官不准私购。第四，“常胜军”驻扎在松江城，但不得干预地方事务。第五，惩处兵勇须听中国会同管带意见。

根据协议，英国派军官戈登（Charles Gordon）出任管带，中国派李恒嵩会同管带。当然，实际是戈登独揽大权。

李鸿章在上朝廷的《整饬常胜军片》中表白说通过这些条款可以“渐收兵柄”，“以后办理稍有头绪”。他承认是看到了“常胜军”在镇压太平军过程中显示出的强大战斗力，又感到其“日益骄蹇，渐成尾大不掉之势”，所以才“筹思累月，久欲稍加裁抑。而事关中外交涉之端，未便轻于发难”，此次正好借白齐文事达到目的。他对洋兵的原则、态度是“于调停笼络之中仍寓裁制控驭之道”。

通观李鸿章处理此事的前前后后，不能不使人深感他的老谋深算、精于权术：步步为营，有进有退，撤掉了在上海经营已久的地方势力吴、杨，为安插“自己人”创造了条件；尽可能地裁抑了“常胜军”，使其当下能为己所用却又不会贻患今后；更重要的是，他使自己拥有了更大的发言权。真可谓一箭三雕！

谨防“太阿倒持”

1863年2月起，李鸿章率淮军伙同“常胜军”以上海为基地，向西进犯。太平军将士虽英勇抵抗，但终寡不敌众，太仓、昆山先后失陷。而后，淮军又北犯攻占江阴、无锡等地，再向西包围了苏州。守城太平军浴血奋战，所以苏州久攻不下。但对清军来说，形势仍然非常有利。

面对如此“大好形势”，李鸿章自然是抢功心切，生怕他人夺去攻下苏州这份指日可待“头功”，上朝廷的《驾驭西兵片》便活生生地反映出他的这种心态，当然同时也反映出他对“西兵”的态度。

先是与他一同围攻苏州的戈登认为苏州城太大，“常胜军”人数太少，要求再招洋兵，便可迅速攻下苏州。而李鸿章则唯恐“常胜军”因此人员充足可以单独攻下苏州，所以拒绝了戈登的要求。不过在戈登的再三要求下，李只得同意“常胜军”再招一百人，但却提出了非常苛刻的条件：无论是否攻克苏州，这一百名新招洋兵在一个月后必须辞退。而且，如果攻下苏州，“常胜军”须与淮军程学启部一同进驻，不仅如此，五天之后“常胜军”就要撤离苏州，回到昆山。

对此要求，戈登不能完全接受，于是搬出新近接替士迪佛立任英国驻华陆军司令的伯郎（Brown）出面与李鸿章交涉。伯郎新来气盛，甚至提出要亲率英军攻城。闻此消息，李又急又怒却又不敢对洋人明言，只得借故推脱，不与伯郎见面。这时听说伯郎要到京师，李鸿章生怕总理衙门听信伯郎的建议，于是急忙给朝廷上了此片阻止。此片意思可分四层：首先，他知道朝廷自然是希望快快拿下苏州，所以他给朝廷的说法是“常胜军”再招人马需费过巨，而更重要的是“专用西兵，易生后患”。而且，他解释说一时攻不下苏州是因一些准备没有作好，但现在的形势已“使贼大势不振，筋脉不舒，苏州一城早迟可复”。相反，如果没有作好各种准备，迅速攻下苏州反易被太平军反攻。总之，在他的解说中，对苏州城久攻不克毫不足虑。其次，他强调“常胜军”“战守实未可靠”，只是靠先进的洋枪洋炮而已。而他“与英官曲意联络”，也可得到英军洋枪洋炮的“济助”。此层意在告诉朝廷不必专靠“常胜军”。第三，退一步说，“常胜军”的助攻还可说是名正言顺，“功成之后或不致另开衅端”，对其要求我也可拒绝。然而“英酋”伯郎“之意欲为中国克复一二省城，难保非为通商要挟张本”。而且，英国人看到现在太平军已陷入困境，明明我们已不需要向其“求助”却偏偏要主动“助攻”苏州，其动机非常可疑。所以如同意伯郎率兵攻城，则“必有太阿倒持之忧”。对这个理由，清廷岂能不慎重考虑？最后，李鸿章则明言自己此片的目的：伯郎到总理衙门后，无论他怎样“饰词吓诈”，总理衙门的王公大臣们千万不要答应他的要求。最多只能同意“臣与戈登面议之语，止许戈登协攻，勿庸伯郎督剿”。如果实在无法阻止，“英提督必调兵助攻”，一定要先与他订立条约，即“克复后立即退出，由臣妥筹布置，不得别有要求”。

生怕“洋兵”抢自己的头功和“洋兵”攻城后拒不撤兵形成“太阿倒持”之局，确是李鸿章此时的两

大心病。攻占苏州，使他彻底解决这一问题。

苏州是江南重镇，清代是江苏省城。太平军占领苏州后，为太平天国苏福省省会，忠王李秀成长期精心经营苏州，想将其建为第二个天京，是太平军占领的最重要的城市之一。攻占苏州，当然是时任江苏巡抚李鸿章梦寐以求之事。

1863 年春李鸿章率淮军和‘常胜军”陆续攻下常熟、太仓、昆新、吴江、江阴等处后，于 11 月中旬兵临苏州城下，开始进攻苏州。由于屡攻不下，伤亡不小。

但在谭绍光领导之下守卫苏州城的太平军将领还有纳王郜永宽等‘四王”、“四大天将”，他们与主帅谭绍光一直不和。戈登通过奸细了解到这一情况、特别是知道纳王郜永宽还有投降之意后，便主张诱降纳王，兵不血刃攻克苏州。戈登的建议为李鸿章采纳，而且淮军攻城主将之一程学启本是太平军降将。经过一番秘密联络，郜永宽在 11 月 28 日派康王汪安钧潜入清军大营，与戈登、程学启开始投降谈判。几天后郜永宽在苏州城外阳澄湖亲自与戈登、程学启商议降约。双方约定郜谋杀谭绍光取其首级并献苏州城以降清，而戈登、程学启承诺保证郜及部下性命，并给副将以上一定官职，赏赐郜本人二品武职，戈登作担保人。12 月 4 日，郜永宽等八人乘在慕王府议事的机会刺杀谭绍光，并割下谭的首级。第二天，郜将谭的头颅送达程学启处，并大开城门迎接清军入城，清军诱降成功，终于“兵不血刃”拿下苏州。

然而，李鸿章不但没有履约保全投降者的性命，反而设计杀害了这八个降将。同时清军在城内大开杀戒，城内数万太平军守军在毫无戒备中被诛杀。李鸿章及清军的残忍、背信在这次杀降事件中暴露得淋漓尽致。这种血淋淋的无耻行为，却得到朝廷的认可，认为“所办并无不合”、“甚为允协”！以‘理学家”自诩的曾国藩竟也称赞这种背信弃义的行径，称‘此间近事，惟李少荃在苏州杀降王八人最快人意”、“殊为眼明手辣”。

不过，李鸿章背信杀降的这种无耻行径引起了戈登和外国人的强烈不满和愤怒，然而这反使行事老辣的李鸿章下决心以后彻底裁撤‘常胜军”。

苏州失守，标志太平天国苏南根据地已陷入绝境；几周后无锡陷落，几个月后重镇常州又于 1864 年 5 月被淮军会同‘常胜军”攻下。此时，生死搏斗已十好几年的双方胜负已可基本判定；另外，随着苏州‘杀降”事件和攻克常州过程中李鸿章与戈登的矛盾越来越尖锐，李鸿章终于感到‘常胜军”已成可以拆掉的‘过河之桥”，而且生性谨慎多疑的他认为此‘桥”必须及时拆除，如果不立即裁遣‘常胜军”，恐怕后患无穷。

对‘常胜军”，李鸿章一直采取利用、笼络、控制政策，与戈登一直矛盾不断，而李氏苏州的‘杀降”，使双方矛盾更加激化。

戈登听到李鸿章杀降的消息顿时勃然大怒，认为这是最无耻的背信弃义，而且自己还曾信誓旦旦为降将作保，于是提着洋枪要找李鸿章算账。李鸿章闻讯赶忙躲了起来，以后几天戈登一直在提枪找李，而李则躲避不见。由于左找右找都找不到李鸿章，戈

1896 年李鸿章（中）在英国

登只得忿忿然留下一份最后通牒，要求李鸿章下台，不然他就率"常胜军"进攻淮军，将所攻占的城池再交还太平军。然后，他就率"常胜军"返回昆山，同时给英国驻华公使布鲁斯（Bruce, Sir Frederick William Adolphus）写信，要求英国政府干预，迫使李鸿章下台。英国驻华陆军司令伯郎也从上海赶到昆山，与戈登商定"常胜军"由其节制，不再受李鸿章及中国政府的调遣，借此从中方夺回"常胜军"的控制权。上海的外国领事馆官员代表列强及所有外国侨民签署了一项严厉谴责李鸿章的决议，指其杀降是对人性的彻底背叛，并警告说此事很可能使列强不会再帮助清政府，并可能撤回帮清军打仗的洋兵洋将。

李鸿章没有想到，他的"杀降"居然会引起外国人如此强烈的反应，甚至有可能破坏难得的"中外和好"局面。他认为杀降纵有不妥充其量只是方法问题，而不知道戈登却认为这是原则问题。这种不同观念的背后是不同文化背景的冲突。慌了手脚的李鸿章于是一方面急忙向对中国政局影响颇深的英国人赫德（Robert Hart）和马格里（MaCartney, Sir Samuel Halliday）求援，请他们代为调解；另一方面在给朝廷的《骈诛八降酋片》中他则辩解说："戈登助剿苏城，近来颇为出力"；"不料成功之后，既索重赏仍生衅端。值此时事多艰，中外和好，臣断不敢稍涉鲁莽，致坏大局。惟洋人性情反覆，罔知事体，如臣构昧，恐难驾驭合宜。设英公使与总理衙门过于争执，惟有请旨将臣严议治罪以折服其心。"希望在这场"中外冲突"中得到朝廷的支持。十几天后，针对英方提出"常胜军"不归中国指挥的说法他又专门给朝廷上了《筹处常胜军片》，说现在他的兵力已经"可敷防剿，亦无须该军协助"，所以希望总理衙门"与英公使议定妥法，即让戈登告退须责令将该军带队外国兵弁一百数十名全行撤回，或由臣选派数人帮带。该军叠次购买外国炮位及现存外国军火全行交出，彼无所挟持，庶不敢背叛滋闹。盖常胜军所持只有炮火，此外实无他长。"总之，"英酋欲揽兵权以箝制地方，勇丁欲附洋弁以要挟厚饷，相为固结不解，操纵缓急颇有为难。"此片表明他实际上想解散"常胜军"。

李鸿章的这两手果然奏效。朝廷下旨不仅明确支持他的所作所为，认为"洋人不明事理"，而且指责戈登"意殊颇测"；"惟有据正理驳斥，以折其心"。得到朝廷的支持，李鸿章自可大松口气。另外，经过赫德等人的调解，英方认为维持与清政府的"和好"更符合自己的利益，因此主张将此事交总理衙门处理，制止了戈登的过激行为。而且，此时淮军人马已达五万，且其中三四万人装备了新式武器，而"常胜军"只有三千人，从实力上说也不是淮军对手，戈登只得作罢，仅要求李鸿章发一文告，说明此事与己无关。对此要求李鸿章立即答应，双方都有了"下台阶"，一场大风波总算平息。

但此事更坚定了李鸿章裁撤"常胜军"的想法，他多次感叹"常胜军"已成为"磨难星"，不但"月縻五六万金"，而且"随事要求，随时翻覆，鸿章百忍之而苦无一当也"。

攻下常州后，戈登认为太平军败局已定，淮军已渐西化并迅速强大而"常胜军"正在腐化涣散，于是主动要求遣散"常胜军"，早就想裁撤"常胜军"的李鸿章立即高兴地同意。不过，英国驻上海领事巴夏礼（Parkes, Sir Harry Smith）却认为这会削弱上海防卫，所以致信李鸿章坚决反对此事。而李也不示弱，回信反驳。终于在1863年5月31日解散了"常胜军"，其中一部分精锐部队和大部分武器装备被编为淮军，进一步提高了淮军的实力。

平心而论，李鸿章能屡打胜仗在很大程度是倚靠"常胜军"。从对"常胜军"的利用、处置，可以看到李鸿章"请神""送神"的现实、无情、老练和老辣。

对白齐文、戈登等人的"掌控自如"，使李鸿章对自己与洋人打交道的本事颇为自得，所以当乃师曾国藩对"天津教案"颇感棘手时，他几次去信建议说与洋人打交道要"参用痞子手段，不宜轻以一死塞责"。"鸿章前云痞子手段，我于尽情尽礼后，若再以无理相干，只有一拼而已"。这或许是他的经验之谈，不过，这种"痞子手段"纵有效于一时、一人、一事，终无法挽救晚清外交的屡屡重大失误。对一个王朝、国家来说，重要的是对国际形势、世界格局、时代潮流等宏观战略的正确判断，而不是"痞子手段"这种雕虫小技。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　吴　思）

本期：终审　徐　孔　　执行主编　吴　思　　审校　赵友慈